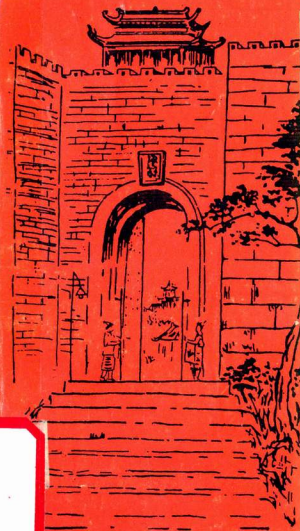


本辑主集 郑薇薇
责任编辑 张凤林 吴光夏 何 莉 郎振言
封面设计 孙 俊
宗建邦

重慶渝中區文史資料

第九輯



重慶渝中區文史資料

准印书号: No. 028803

工本费: 6.20 元

印刷: 重庆双碑印刷厂

政协重庆渝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 9 辑

K297.19/11-9 D

K297.19/2003-9

11-9

D

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

第九集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渝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十月



yz1205239

重庆渝中区图书馆藏

《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

第九辑

目 录

一、小平同志在重庆

1. 回忆小平同志在渝工作二、三事 张文澄(1)
2. 启蒙一课,受用终身 孙道存(5)
3. 和小平同志同乘小火车 陈建初(8)
4. 忆小平同志对工商界人士的关心和教导 吴昭辉(10)
5. 贺龙、邓小平同志创办八一小学 郭翠芳、尹志厚(11)
6. 八一保育院院史简介 袁振翔、代素芬(12)
7. 老师关怀,殷切期望 穰明德(14)
8. 十年风雨创业艰,人才辈出兴校园 窦怀理(17)
9. 在人民小学读书的日子里
 - (1)“小头领”——贺鹏飞 郭子慎(20)
 - (2)小小好朋友——邓朴方 郭子慎(20)
 - (3)绝不许沾染贵族子弟的恶习 赵峻岭、张国新(21)
 - (4)学校不培养特殊学生 赵峻岭、张国新(22)
10. 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杨耀健(24)
11. 记小平同志解放初期在重庆的几件事 魏仲云
 - (1)大溪别墅的灯光 (31)
 - (2)位尊不忘故人情 (32)
 - (3)抢救保护文物古迹 (35)
 - (4)不准压制民主 (38)

- (5)对一封匿名信的批示..... (40)
- (6)批评“五里腿”..... (42)
- (7)平息金融风波..... (44)
- (8)稳定物价、保障人民生活..... (48)

二、军政

- 1.大国外交的艰难一步..... 胡道修(52)
- 2.具有传奇色彩的邵子南..... 朱俊(58)
- 3.我对解放前南京国立政治大学的几段回忆... 薛祚光(63)

三、工商经济

- 1.重庆的典当行..... 赵锐涛(68)
- 2.合作五金制造厂入川始末..... 朱俊(71)
- 3.川菜之都渝中区..... 谢向全(74)

四、民族宗教

- 1.回忆旧日的天主教重庆教区主
教府——真原堂..... 陈仲伦(78)

五、文化教育

- 1.从川东联合县立甲种工业学校到四川省立
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吴光夏(81)
- 2.冯玉祥的职业教育歌..... 欧阳昭华(89)
- 3.抗战时期重庆城区的职业补习学校和训练班.....
..... 欧阳昭华(91)
- 4.抗战时期作家的贫困与援助贫病作家运动... 唐维华(96)
- 5.重庆文博事业六十年..... 胡昌健(102)

六、人物

- 1.晚清川东兵备道中的三个文化人..... 胡昌健(113)
- 2.章太炎在重庆..... 胡昌健(115)
- 3.“听、跟、走”的楷模杨受百..... 龙明桥(117)
- 4.“面粉大王”鲜伯良走上幸福路..... 龙明桥(121)

5.双惺相惜	厉慧森(126)
--------------	----------

七、方志

1.回顾重庆《抗建堂》	唐维华(128)
-------------------	----------

2.再谈《陪都跳伞塔》	唐维华(132)
-------------------	----------

回忆小平同志在渝工作二、三事

张文澄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49年11月我响应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号召,从武汉市报名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便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西南服务团进军重庆,当年12月4日到达重庆,与组织部长魏思文等同志住在大溪别墅《潜园》(现市卫生局所在地)。同月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1950年5月调任中共重庆第三区(现沙坪坝区)区委书记至1953年5月。在此期间,多次目睹小平同志的英姿,多次聆听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报告,受益良多。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中共川东区党委与重庆市委

1949年11月,在进军途中,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湘西常德宣布中共川东区党委与重庆市委一个机构、两个牌子。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西南一级机关进驻重庆市,立即着手政权建设。大约两、三日后,小平同志提出重庆是大工业城市,人口多、工业多、情况复杂,城市工作量大,建议中共川东区党委与重庆市委分开。川东区党委机关,原拟设在枇杷山《王园》,分开后去了南岸黄桷桠;重庆市委机关则从大溪别墅《潜园》,(因《潜园》太小,不够使用)搬进《王园》。此事被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知道后,向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陈锡联和第二书记张霖之同志说:“枇杷山最好开辟为公园,目前市委可暂住那里,反正要开辟成公园就是了。张霖之同志立即向市委全体成员传达了邓政委的这一指示,1959年冬,西南一级机关撤销后,市委迁中山四路,便

按照小平同志的原指示,将《王园》所属的枇杷山,建立成《枇杷山公园》,将部分办公用房分别拨给《市博物馆》和《市图书馆》。

关心地下党同志

1949年12月中旬的一天,进军干部与地下党同志举行会师会。会场在曙楼(原国民党市政府所在地,现儿科医院住院部)我担任会议司仪。会议开始前,小平同志来到休息室,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于江震同志汇报第一任重庆市委委员组成情况,并把名单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仔细看过名单后问:“名单中有无原地下党的同志”?于回答:“其中的张文澄是原四川地下党的。”小平同志点头认可。说:“好、好,不要忘了地下党的同志。”会议开始后,邓小平同志代表西南局宣布了市委委员名单,他们是: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任白戈、段君毅、万里、罗士高、王近山、刘明辉、李震、康乃尔、张文澄。并勉励大家搞好团结,努力工作。刘伯承、张际春(西南局副书记兼重庆军管会主任)、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关心上层统战对象的思想改造工作

1951年秋天,我受市委委派前往巴县,协助巴县县委搞农村土改工作。在一个月协助土改工作中,亲身感受到了小平同志对上层统战人士的关心和党的统战政策的强大感召力。当时西南地区有许多上层统战人士,西南军政委员会吸收了刘文辉、但懋辛、熊克武、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分别担任副主席、委员等职务。农村土改工作开始后,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西南统战部安排这批统战人士到巴县参观土改。这批人士住在南泉,凡是县委召开土改工作会议,每次都请他们列席,还组织他们下乡参加土改活动。这对他们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记得一天晚上县委在南泉公园召开土改小结会,我结合党的土改政策作工作小结。大约讲了三个小

时，刘文辉等统战人士都认真作记录。

据曹狄秋市长事后告诉我，刘文辉在向西南局统战部汇报时说参加土改，思想上震动很大，特别是听了张文澄的讲话，对土改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较深的了解。曹市长还问我“你对他们讲了些什么？”我开玩笑说：“臭骂了他们一顿”。实际上是我将青少年时知道的四川军阀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夺的惨情，结合小平同志对新区提出的土改政策，讲了土改的必要性和对各个阶层的具体政策，其中包含了统战政策讲事实、讲道理、说得他们口服心服，完成了市委交给我的任务。

关心城市民主改革政策

1951年上半年，城市的民主改革工作开始起步。对于这一新生事物，我们没有经验，于是便组织力量深入磁器口、小龙坎等街道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城市的民主改革情况复杂，人员成份难以确定，不能简单的照搬农村土改的那套。如商人就包括资本家、小企业主、小商小贩等等。民主改革对象不明确，政策吃不准。我们又认真学习西南局和市委有关文件，提出城市小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如开业医生），不算民主改革对象，而应类似农村的中农作为团结对象的设想，用三区区委名义，给重庆市委写报告，市委又把报告上报西南局，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同意”。并建议加上西南局批语，在《西南工作》上全文刊发，指导了整个城市民主改革工作。

举家入京

1952年7月，因工作需要，党中央调小平同志入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小平同志接中央通知后，不讲任何条件，毫不拖泥带水，很快安排好西南局工作，立即举家北上。由于去得快，以致到北京后，中央有关部门尚未为小平同志及其家属准备好住房，他们全家

只好住在招待所内。事后听市委书记张霖之和曹获秋市长讲，毛泽东主席对小平同志此举十分赞赏，大加表扬，认为他干脆果断，不讲价钱。由此可见，后来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人才难得”，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而当我耳闻目睹这一切时，在我心中树立了如何作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的楷模。同时，也更增添了对小平同志的敬仰之情。1953年5月，当市委决定把我从三区调到市委宣传部时，也以小平同志为榜样，不讲价钱，愉快听从党安排，未带一人一物离开了辛勤工作三年之久的三区。小平同志“举家北上”的史实，对后人特别是当代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形成讲原则、守纪律、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大有裨益。

第一等干河，北往鼓浪嶼工最勤，以內市湖，半根据张文澄口述
由蔡女里小，口番潮人看境此則其勤試干，鏡鑑何莉、孙俊整理
前知食人，察其區而董為生與內市湖與定，查區無影，查區無影
半將整區對人頭取，查區無影，半將整區對人頭取，查區無影
，出不為譯類，能則下案採察則其因，等其則小則小，其則小則小
，自財主出金小南無出對，將又美其委市時試南西其等其大又用錢
內中則村家則其則其，其則其若其則其不，其則其若其則其不
其市，其則其委市則其重其，其則其委市則其重其，其則其委市則其重其
其市則其委市則其重其，其則其委市則其重其，其則其委市則其重其
其市則其委市則其重其，其則其委市則其重其，其則其委市則其重其
其市則其委市則其重其，其則其委市則其重其，其則其委市則其重其

启蒙一课 受用终身

——深切怀念邓小平政委

孙道存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阶段,5月27日上海解放,在党中央“解放全中国”伟大号召下、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进步知识青年数万人响应号召,投笔从戎,献身革命。我当时正在上海大学读书,自愿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从学校走进军营,有幸聆听了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老实”,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水平最高、极富哲理,论述精辟、意义深远的一课,也是我步入人生旅途时启蒙一课,嵌入脑际,永世难忘。

西南服务团进军目标是云、贵、川,在“西南八千万人民需要你”口号鼓舞下,近一万八千名年青的知识分子投入这座革命熔炉,我和当时同学,都是幼稚的青年,盼望祖国富强,急于投身革命,向往光明幸福;但对革命真谛并不知晓,想的是革命定会一帆风顺,至于革命征程中艰难险阻,更是没有精神准备,我们呈递给二野司令部的“申请书”“论战书”上,充满着“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饱含激情的辞语,第二野战军首长们充分肯定并赞扬了我们的爱国热情,从老区抽调三千干部带队,针对这批有决心、有信心,但毫无实践经历的学生大军,由军机繁忙,戎马倥偬的二野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来讲这场政治报告。“淮海战役”刘邓大军威震神州,“百万雄狮渡大江”后,刘伯承、邓小平的英名更令反动派闻风丧胆;我们刚入军营的新战士,多么想瞻仰刘、邓首长风采,1949年8月,在原国民党国民大会堂,司令员刘伯承主持大会,邓小平同志身着一身洗旧了的军装,脚穿布鞋,用道地的四

川口音，宏亮又诙谐的语气，一直讲了几个钟头，这样战功赫赫、驰骋疆场多年，功高位显的高级将领，真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有那么高深的理论水平，讲话又那么慈祥生动，亲切、感人至深。听课时全场鸦雀无声，讲到激动处，经久不息的掌声。

邓政委的报告开宗明义，他首先从理论的高度，深刻全面地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涵义，他说：“革命队伍里，最讲究老实”，他告诫我们：“讲老实话、干老实事，做老实人”，他在肯定了我们革命激情同时，谆谆教导我们：“一个进步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只能算有了革命愿望和热情，到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还需要经过一系列革命实践的锤炼和考验”。他着重讲了“过关”问题，邓政委说：“古代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今天知识青年参军，也要‘过关斩将’，可以说大关三个，小关无数；三个大关是要过帝国主义关、封建主义关、社会主义关；至于具体小关么，那就无数了，象‘生死关’、‘家庭关’、‘生活关’、‘走路关’等等”。继后，他着重地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怎样过好“家庭关”、“生活关”、“走路关”。

我们在南京集中学习了邓政委的报告，经过反复深入讨论，这是我们投身革命后最好的一堂“启蒙课”。中央下达了“进军大西南”军令后，我们跟随第二野战军挥师南下，挺进大西南，被誉为“小长征”的铁流七千里开始了。从6月参军到解放重庆近半年征程中首先最难的“家庭关”过来了，当时祖国半壁河山尚未解放，福建、两广、西南与西北仍属蒋管区，大局未定，此一远征生死难卜，许多家长阻挠子女参军远走，而我们战士改名换姓者有之，深夜私奔者有之，有的战士拒绝了父兄为其在台湾、港、澳备好的房产和巨额存款，终于踏上了走向大西南征途，有的出身于官宦富商家庭，毅然投奔革命，如傅作义将军之女傅冬菊、国民党教育部长梅贻琦之女梅祖成、朱家骅之堂兄朱家骝，更多战士纷纷斩断绵绵儿女情，赤诚一片奔军营，这就是“过关斩将”精神；在过好“生活关”

中,抛弃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和富饶江南城市的优越生活,走向“蜀道难于上青天”的四川,走向“地无三尺平”的贵州,以及古代贬之为“充军”之地云南,这种被邓政委报告中提到的“大米反饥饿,小米扭秧歌”的反差,正是“过关斩将”精神驱使;在过好“走路关”上,从进军开始徒步 20 华里,到 40、60、80 华里,入川之后为了早日“解倒悬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早日解放重庆,更是日夜兼程,在武隆、酉阳翻越白马山,最高行军速度达到日夜 130 里,走向大西南的“七千里路云和月”中,战士平均穿破了 5-6 双军用胶鞋,“练出一双铁脚板,昂首阔步进重庆”,这真是“过关斩将”的威力。我们西南服务团第一分团在曹获秋同志率领下,接管重庆。参加重庆建立民主政权工作,邓政委“论老实”的“启蒙课”,在我们思想上奠定了原动力,注入了持久强劲的活力,增添了进军西南征途中的战斗力,也成为我们紧跟着党终身革命的免疫力。

四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广大的西南服务团战士,遍布西南云、贵、川及西藏高原,进军大西南,参加了伟大的解放战争;血洒大西南,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开拓大西南,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扎根大西南,奉献了毕生精力;闪光大西南,在各自岗位上,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过好了“权力关”、“金钱关”、“酒色关”、“人情关”,始终忠诚于人民,大家没辜负邓政委当年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噙着悲痛热泪默默念着:再也听不到邓政委那高亢、果断的声音了。我们手捧着《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同志,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湛理论,是您走完光辉一生旅程后传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改革开放春潮汹涌澎湃,华夏大地呈现出万紫千红的春天,中华腾飞指日可待,亿万炎黄子孙一定会实现您老生前遗愿。

和小平同志同乘小火车

陈建初

1951年,重庆解放才一年多,工业生产刚刚恢复和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在重庆举办一次西南工业展览会。目的是检阅西南地区的工业生产力量,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高潮,鼓动全西南人民为建设新西南而共同努力。地点定在大田湾。当时,我们一群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被调入筹备处,我被分配在保卫组工作。

当时,大田湾还是一片荒地,办公室、展览室和工作人员的宿舍都用楠竹、蔑席捆绑而成。来参加展出的公私厂矿企业有750多家,分成铁路、钢铁、机械、轻工、化工、纺织、矿业、电业8个馆,展品主要是图表、模型和部分实物。那时,最牵动人心的是铁路馆。

新中国刚成立,党和政府就决定立即动工修建成渝铁路。尽管当时财力、物力都十分困难,还是预定1951年9月1日从重庆通车到永川,为普及铁路常识,铁路馆在大田湾临时修了一条绕场一周的轻便铁路,将天府煤矿矿用小火车头和车厢调来,供人们参观和乘坐。

小平同志对展览会的工作自始至终十分关注,并应筹备处之约,为展览会题了词。原文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题词于1951年8月10日展览会正式开幕那天,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第一版上。

展览会开幕前的一天下午,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三点左右,我们得到通知:小平同志来了,我们纷纷赶到展览会大门口(现跳伞塔旁),只见邓小平同志在十多位同志陪同下,迈着矫健的步伐,

满脸含笑进场来了。

在此之前,我只有从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等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故事中,听到过小平同志的英名,而这天,我们却有幸在如此近的距离内亲眼看到了他。他身体健康,精力异常充沛。那时,小平同志才47岁。

那天,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逐馆观看,最后来到铁路馆,听罢介绍,迳直登上小火车。这时,我们一大群工作人员也跟着上了后面几节车厢。由于火车是绕着圆圈行驶,车速不快,我们清楚地看到:小平同志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一面指点着窗外的景物,一面讲述着什么……列车绕场一周,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但我们都无比的兴奋,都以同小平同志乘一列火车而感到万分荣幸,分外骄傲。

展览会原订展出50天,后应观众要求,延长到10月10日结束,两个月时间,接待了西南各地的观众和志愿军归国代表共72万多人。

46年过去了,西南的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单是铁路,就陆续建成了成渝、宝成、川黔、贵昆、成昆和湘黔、襄渝等7条干线,直通沿海的南昆线也已铺通。这一切,无不凝聚着小平同志的心血,都是同他“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林秉祥

林秉祥

林秉祥

林秉祥

林秉祥

林秉祥

林秉祥

林秉祥

林秉祥

林秉祥

林秉祥

林秉祥

林秉祥

忆小平同志对工商界人士的关心和教导

吴昭辉

邓小平在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时,对重庆工商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十分关心,曾召见工商界代表人物胡子昂、温少鹤、肖松立等人,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为重庆工商周刊题词。

刚解放时,我和大家一样,由于不了解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终日惶惶不安,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情绪低落,等待观望。这时市商会及时传达邓小平同志讲话,小平说:“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爱护和保护正当经营的。工商业者要爱国守法,积极经营踊跃纳税。他对工商界提出四句话,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讲话在工商界传开后,个个拥护,人人精神振奋。我在民族路经营的祥生文具社,规模不算大,但在同行业中,信誉很好,业务也做得火红,听了传达,吊桶也没有了。我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积极经营,踊跃纳税,带动行业几次大的集体纳税、集体入库,被推选为重庆税务协进会主任,得到政府授予协税模范奖旗和奖状。

邓小平在重庆也曾召见老宝元通股份有限公司黄凉廬,肖则可,肖雨生,王进云等负责人,教育他们认清形势,掌握命运,鼓励他们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几位回到公司后,召开了董事会,带头响应号召,自愿把宝元通带头转入国营,成立了西南百货公司,即现在重庆百货站前身。重庆工商业,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与当时邓小平的教导,解除我们思想顾虑分不开的。

(张凤林整理)

贺龙、邓小平同志创办八一小学

郭翠芳、尹志厚

1952年,贺龙(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西南军区政委)为西南军区创办了干部子弟校八一小学。贺龙、邓小平同志亲自决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校政训大队、炮兵学校、军区战斗文工团抽调大批干部、人员组建学校。并将西南军区新闻处,战斗文工团驻地作为校址,派人到北京考察北京第十一小学等学校的建设。第一期拨款 70 亿人民币(旧币)修建校舍并亲自任命第一任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这就是现在的重庆市浮图关职业中学(重庆一一四中学)的前身。

学校位于渝中区风景胜地浮图关公园的至高点上,西北紧邻电视台,东南紧靠革命先烈杨闇公烈士英勇就义的纪念地,占地 44.3 亩,建筑面积 14027 平方米,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革命前辈选就的读书胜地。

学校建立后,邓小平同志曾托邓垦同志多次到学校视察和指导工作,贺龙同志也多次亲临学校视察指导。学校开办以来为党和国家、人民军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栋梁之才。

学校于 1965 年底划归地方管理,三十多年来,几经变迁,目前已成为初中与职高兼有的学校。根据经济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渝中区教委已将学校规划为具有国家级水平和规模的职业教育中心,并于今年开始逐步实施。

八一保育院院史简介

袁振翔、代素芬

座落在重庆市大坪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保育院,是建国后我军最早兴办的幼儿园之一,是敬爱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创建的幼儿园。

八一保育院原名西南军区托儿所,于一九五零年由西南军区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共同组建。原址在上清寺原国民党行政院内。

筹建小组的组长是西南局秘书长刘亚桥同志,副组长是西南军区政治部团职秘书袁振翔同志。组员是:薛明(贺龙同志夫人),王荣华(刘伯承同志夫人),卓琳(邓小平同志夫人),罗平(张际春同志夫人)。筹建时间半年左右,于一九五零年下半年正式招收入托儿童。招收的对象是西南军区团职以上的干部子女。

首任所长由袁振翔同志担任,副所长由鲍侃(原延安保育院工作人员)、罗平同志担任。

托儿所下设两个股,保教股和总务股。保教股股长由王天竹同志担任(陈鹤桥同志夫人),总务股长由宋在舟同志担任。下设保教干事,管理员、会计、出纳、卫生所长、医生、护士、司药、化验员、营养员、警卫班、护理班、洗衣班、缝衣班、炊事班、工作人员120人。人员的组成来自解放军后勤学校、护士学校、炮校的女兵和西南军区的干部。

托儿所为寄宿制,编有六个班,招收儿童一百余名,全部实行部队供给制。

西南军区的首长们非常关心托儿所的发展和建设。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首长们经常来托儿所指导工作,看望孩子们,关心

儿童的成长,还与孩子们一起联欢照像。

一九五零年下半年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首长们的关怀下,托儿所重新修建于大坪单巷子内,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是一所具有四合院式,平房结构特点,配套齐全的标准幼儿园,这种建筑风格保留至今。

园舍建成后,贺龙同志亲自为幼儿园题名为“西南军区八一保育院”,一九五八年与西南军区后勤第一幼儿园合并为“八一保育院”。

八一保育院从创建到今已走过了四十七年的历史,前后历任了袁振翔、陶锋、康瑞、刁乃俊、刘振海、苏明、孟昇、程丙月、邹守允、程琼玖、代素芬十二位院长。

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招收儿童由六个班增加到十二个班,幼儿人数达三百多人。八十年代招收 8 个班,幼儿人数二百多人。现设 6 个班,招幼儿人数二百人左右。

四十多年来,八一保育院在部队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园方向,加强幼儿园的科学管理,积极改善办园条件,坚持保教并重的原则,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幼教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军内外享有较好的声誉。曾多次获得了四川省、重庆市、成都军区,总后勤部“先进集体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幼教事业的发展,八一保育院认真贯彻实施《幼儿园工作规程》,积极参加幼教改革,抓住机遇,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以优质的服务态度,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水平,优美的教育环境,优良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地为部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儿童服务。在幼教行业中创造出了新的业绩。如今的八一保育院已发展为园舍、场地、保教设施、设备齐全,教玩具充足,环境优美的重庆市一级幼儿园。

老师关怀 殷切期望

——记学校的初创和刘邓首长对学校的教导

穰明德

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军胜利地进行了邯郸战役。晋冀鲁豫区党政军机关就迁到邯郸。祥云初开,一度出现了和平气氛。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批党政军干部集中邯郸,他们的家眷也来了,学龄前儿童有近百人。这些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急需入学。邯郸虽是古城重镇,但累遭兵火,学校所剩不多,当地儿童入学都感困难。

为了不影响军民关系,我们不能同地方争校舍。我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根据延安时期的办学经验,我计划办一所子弟学校,并把拟定的具体方案,向刘帅作了汇报。刘司令员日理万机,正和邓小平政委一起谋略中国的前途。然而他听了我的设想后非常重视,说道:“好嘛!你很有战略眼光嘛!现在是应该考虑办学校了。”刘司令员略停片刻后,又说:“我们要为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培养人才,他们必须有文化、有道德、爱劳动、爱祖国,具有创造精神和铁的纪律。这个办学宗旨一定要明确,千万不能培养特殊阶层和‘娇骄儿’。这方面要学习毛主席,主席把毛岸英送到莫斯科学习,回来后又让他参加生产劳动,跟普通人一样。又有知识,又能劳动。我们就要培养这样的人。”我连连点头。

“延安那件事你还记得吗?可不能再发生了。”刘司令又问道。这件事我还记得的,当时有一位领导同志有病长期住院,没有时间管教孩子,于是这孩子在延安城内胡作非为,买东西不给钱,还说:“我是某人的儿子,要钱找他去好了。”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记得,我们一定记取这个教训”我认真地回答。

接着刘帅又说道：“教育儿童，恐怕还要让教师学点教育学。我在苏联看过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和《父母必读》，这是很好的两本书。马卡连柯就是主张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这两本书让教师读一下有好处。总之，争取把学校办好。我们的孩子都交给学校管教。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教育他们，主要靠学校啦。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职务，避免他们产生优越感。‘苟不敢，生乃迁’、‘教不严，师之惰’呀，到时候我可找你们学校负责哦？”

几天后，刘邓首长千方百计给学校拨了简陋的校舍和设备。这在当时很难得到的，足见刘、邓首长对教育、对儿童的重视和关心。开学后，学生全部寄读。这是有意培养他们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能力和集体观念。只有星期六，才让孩子们回家去过周末。有的干部家离学校较远，都是步行或自己花钱租一辆人力车去接孩子，从没有人搞特殊化。刘帅更是以身作则，他爱人汪荣华也总是星期六才把自己的孩子“小太行”接回家，没有一次违反过学校制度。

不久，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包围了延安，占领了张家口。战云密布，刘、邓首长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挥戈南征，开辟新区。在离开邯郸前夕一次军事会议的间隙，刘司令员找到我说：“穰明德，我想起了一件事。培养儿童恐怕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培养他们的骨气和荣辱观。你记得不？三国时，刘备的儿子阿斗，就因为从小没有很好的在这方面启蒙施教，所以后来成了傀儡皇帝。结果被司马懿俘虏，还恬不知耻。刘备旧部曾准备里应外合搭救他，以便东山再起。可他却说这里生活很舒适，你们不必多此一举，搞不好倒丢了我的性命。你看这阿斗糊涂到了何等地步？我们不能培养阿斗这样的人呀！这个故事一定要让教师给孩子们讲一讲。”刘司令员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我听了深受感动。他在军务繁忙之中，仍站在历史和革命的高度关心儿童，是多么令人钦佩啊！

后来,这所子弟学校在战火的洗礼中不断发展扩大,在西南解放后,该校迁到重庆,正式定名为西南人民小学,邓小平同志的爱人卓琳同志亲任校长。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刘邓首长日理万机。但刘伯承同志在百忙之中仍然抽空去西南人民小学视察,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为建设新中国学好真本领。在一次大区省军级以上干部大会上,刘帅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我们现在进城了,广大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防止发生李自成的悲剧,最后落个前功尽弃,毁革命成果于一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教育好后代。我们的孩子在战火中经受了洗礼,进城后切记不要对他们过分溺爱,如果在舒适的环境中变成纨绔子弟,将来就不能接好父辈的班。我们的事业也就会受到损失。”

在这以后,刘帅又把我和其他几个同志找来,专门对我们讲:“给孩子们讲关公的故事,既要讲关公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也要讲关公最后走麦城、被斩首的悲剧。现在人们胜利了,孩子们很高兴,以为我们只是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好象我们革命成功都是从胜利中过来的。其实我们也有失败的时候。要把我们的失败,把革命的艰巨性告诉孩子,特别要告诫孩子不能学关公的骄傲自满。如果象关公那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会落得走麦城的悲剧。”

在刘帅的亲切关怀下,西南人民小学为祖国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

注:穰明德同志是一九三二年入党的长征老干部,他长期在刘伯承同志身边工作。曾任红二方面军总直政治部主任,抗大党务委员会副书记等职。解放后历任西南交通部副部长,国家公路总局负责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十年风雨创业艰,人才辈出兴校园

窦怀理

1949年学校从河北邯郸迁至重庆后,为了解决来自去解放区及南下干部(科处级以上)子女就学问题,1950年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西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夫人苏冬决定联合筹办西南局一级机关干部子弟学校。

筹办初期,人力、物力、财力极为困难,暂借西南局大院(现市委大院办公厅所在地)简陋平房作为教学用房,学生所用的课桌凳是国民党军子弟学校留下的,当时学校只有两个班,卓琳任校长、苏冬任政治协议员,黄裳、李仆任教员,外加一个工人,这就是当时的办学规模,卓琳请西南局第二书记刘伯承为学校命名,刘伯承题为人民小学,之后,卓琳、苏冬向西南局要求增加行政管理干部,西南局先派了窦怀理等三人分别担任学校总务科科长、会计及管理干部,紧接着,成立了校董会,贺龙任董事长、董事会成员有:刘仰峤(西南局秘书长)于江震(西南局组织部部长)孙志远(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刘岱峰(西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钱信忠(西南卫生部部长)陈鹤桥(西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廖苏华(西南妇联主任)。

由于西南局要在当时学校所在地修建办公厅,学校被迫另选校址,在西南局领导的指示,校董会及重庆市地政局的努力下,租借了私立教会学校(现六中所在地)的校舍,决定再扩大办学规模,加收西南军区的干部子女共预计300人左右,开设1-5年级,1950年10月迁校并改名为西南军区直属人民小学。接收了重庆交通银行子弟学校留下的办学设备,风琴是由当时空军子弟校捐助,万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部长)向军工厂要了一个炮弹壳作为上下课的课铃。学校的教职工队伍进一步扩大,聘请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为校务委员。叶虹为教导

处主任,王唤为医务室主任并设有医生、护士,教师增至近二十人,另外西南军区后勤部还派来一些总务管理人员协助学校的行政管理。学校实行寄宿制、学生全部住读,并享受供给制,西南局从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学校,学生的伙食标准为中灶待遇,床上用品及生活用品均由学校供给,此时,学校已初具规模。

开学之后,学校着手于扩建校舍的工作,预计用六十亿人民币(旧币)修建两幢能住宿 500 人的学生宿舍,卓琳请贺龙设法解决资金问题,在贺龙的努力下华北局支助了三十万斤小米,折合人民币(旧币)三十亿元,地方财政部捐资三十亿元于 1951 年下半年动工,1952 年下半年开始使用(现人民小学五星大楼),1952 年西南财政部投资 24 亿修建两幢教学楼(现南、北教学大楼),1953 年 9 月学生搬入新教学楼。紧接着,修建了食堂,风雨操场,圈地 60 多亩,至此,校园设施基本完善。

1952 年,西南军区兴办了八一小学(西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西南军区干部子女均转入该校就读,原校就只招收西南直属机关地方干部子女,则改名为西南一级机关人民小学,到 1954 年西南局撤走后,就和重庆小学合并为重庆市人民小学,沿至于今。

在 1951 - 1955 年期间,学校搞了不少有意义,有影响的活动。1951 年秋季开学,在刘南畦副校长的领导下,在重庆率先进行了学制改革将六年一贯制改为五年一贯制。为提高教学质量她又从北京买回一些教学仪器,在重庆首先搞起了直观教学的实验。1954 年春,学校第一次举办了校运会,全校师生积极参与,贺龙在刘南畦陪同下观看了校运会,亲自为运动会获奖学生颁奖,并提出要“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在此期间,人民小学和巴蜀小学、八一小学联合举行观摩教育活动,教育教研活动,相互取长补短,教育教学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同时学校发扬优良传统并设有理论教员对师生进行教育,如通过上党课、间周组织观看电影等形式不断提高师生的政治思想素质。

人民小学的创办史,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点滴积累到逐步完善的艰苦创业的过程,它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悠久的革命历史,为社会各界培养一批批有用之才,而今,人民小学正沿着老一辈创业者的足迹,以新时代的新面貌,奔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彭远萍整理)

彭远萍

我书取——人民小学(二)

彭远萍

在人民小学读书的日子里

(一)“小头领”——贺鹏飞

郭子慎

五十年代初,贺小龙(贺鹏飞原名贺小龙,现任海军副司令员)与我在一个班。他爱学习,最喜欢体育,他喜欢组织、指挥班上的同学们做群攻、群战的游戏。上体育课或是课间操以及课余时间,他都带领班上的男生们,做冲冲杀杀的游戏运动。

有一次在冲杀跑步时我被跌倒了,当时我心里想:小头领叫我们跟着他冲锋。我跌倒了没人管,就少一个卒子了,如果是都跌倒了的话,小龙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正当这时,突然一支肥胖粗壮的小手拉我起来了,我便抬头一看正是小龙同学,这样使我感到了咱们的小头领真不错。我便问他,你为什么对每一个小卒子都一样呢?他说:“我听大人(贺龙)这么说‘作为一个指挥官必须学会带兵、用兵、爱兵才行。’”

由于他对同学热心,所以在做游戏时我们都乐意听他的指挥。因此每次组织游戏时同学都是争先恐后的参加,冲杀时个个如似小老虎冲锋在前。同学们喜欢小头领,他能与小兵一条心,他是同学中一个合格的“小头领”。

(二)小小好朋友——邓朴方

郭子慎

五十年代初的邓朴方同学(现任全国残联主席)与我同班且同桌,他平时学习善于动脑,学习成绩比较好,

我当时算个“调皮生”，成绩在班上倒数第一名。

在校时朴方对我讲：“老师们真好，她们无私的将知识传授给我们。”我接着便说：“你也很好，能让我抄你的作业，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由于我贪玩、怕学习，不想动脑筋，因此经常抄看朴方的作业，以此完成作业任务。有一次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老师问：“小郭，你近来的作业为什么与朴方的作业一样呢？”开始我答复：“老师在课堂上教的一样嘛。”老师说：“我教的一样，可是并不意味着每个同学做的作业都写的一字不差呀？你是不是抄了朴方的作业？”当时我的脸如关公的脸，全都红了。老师说：“今后再发现你抄别人的作业，就罚你在办公室里抄一百遍，听到没有！？”“我……听到了。”

当我受到批评之后，朴方对我说：“我早就劝你不要抄别人的作业嘛，抄别人的作业自己什么也学不到，骗了老师，骗了同学，也骗了自己。”

由于我怕老师罚我写一百遍，又在朴方的经常帮助下，我的成绩由倒数第一名跃进到了班上的倒数第八位。

(三)绝不许沾染贵族子弟的恶习

赵峻岭 张国新

一次，学校为改善学生伙食，早餐时，大师傅特地给我们烤了一次面包吃。有个别同学不知是恶作剧还是吃不惯这“洋玩艺儿”，顺手丢了几块到一墙之隔的求精中学。谁知几块面包引起了求精中学部分师生的不满，一些学生到我们校门口提意见。这情况很快被校领导知道了。早餐后，全校学生紧急集合。我们看到校长和老师们严肃的面孔，同学们一下子紧张起来。张阴东主任一上台，他那军人的威严更使我们连大气也不敢出，二百多人的操

场上异常安静。张主任讲话了，他指着几块面包，从战争年代的艰苦讲到我军的光荣传统，从全国形势讲到国家的困难，人民生活的困苦，从人民军队和人民的血肉，鱼水关系讲到共产党的后代要做什么人……张主任的话还没讲完，几个丢面包的同学纷纷举手承认了错误，记得当时卓校长非常动情地拍着几个同学的头，表扬了他们做了错事勇于承认，教育我们人人都要做诚实的孩子。

会后，分班还进行了热烈讨论，每个同学都作了自我检查，纷纷表示：共产党人的后代绝不沾染贵族子弟的恶习。

“面包事件”后，听老师讲，卓校长还个人出钱（当时是供给制）请求精中学师生看了一场电影《棉桃》。

（四）学校不培养特殊学生

赵峻岭 张国新

我们许多同学的父母都是革命功臣，是治党、治军、治国、统帅一方的国家栋梁，也有一些资历不浅、才学平平的干部。尽管长辈们地位悬殊，但同学们——这批也经过战火洗礼的小伙伴们相处亲密无间，亲如弟兄。两任校长（卓琳校长和刘南畦校长）和老师都对同学们都如同自己的亲儿女，一视同仁。很注意教育我们树立平民意识。

记得那时候，同学们喜爱打克郎球，我们越打兴趣越浓，往往要排队轮流上场。邓朴方和我们其他男孩一样，争强好胜不服输，他有时输了不肯下庄，大同学为维护秩序，往往要强制拉下场。一次有些小点的同学输了不服气和大同学争了起来，正好碰上了卓校长经过，了解情况后，让在场的邓朴方和几个小同学立正站好，要他们遵守大家定下的规矩，不允许谁特殊。

还有一次食堂吃包子，有肉馅和豆沙馅，为哪种包子好吃我和贺鹏飞争执起来。争执中有点小拉扯，不料被值班老师看见了，双

方都被叫出了食堂,该周的品德分我们两个都只有4分。

在学校中,那些高干(这里指西南局主要首长)子女和其它同学没有任何区别,相反,学校男生穿草鞋的风气倒是邓、贺家小孩带头兴起的。

现在社会上对干部子女有许多非议,但我们那批同学中,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大部份受父辈们大起大落,几起几落的冲击,牵连者居多,而借势沾光,获名利者极少(至少我不知道)。他们都是在本职岗位上埋头实干,谦虚待人,凭能力,凭实绩获得相应工作的普通人。在成都就有一个兵团级干部的儿子,在那急风暴雨年代,这个年轻优秀的营级军官转业后下放到一个厂当普通工人,当全省到处贴打倒其父×××的标语时,唯独我这个当电工的同学所在的二千多人的大厂没一张标语,后来该厂的工人告诉我:“你那个同学在工厂待人谦和,干的是普通工作,不怕苦累、上班早来、下班晚走……,我们看他这样子,他老子肯定是好人,谁贴标语工人通不过……”,像这个同学类似情况和经历的大有人在。

四十年以来这批同学的经历证明,在我们世界观,人生观初步形成的小学阶段,学校教育为我们做一个正直,正派的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杨耀健

规划蓝图

新中国成立前，成渝铁路修修停停，40多年来始终是一场梦。四川民众翘首以待，血也流过泪也流过，见到的只有地图上的一条虚线。

1949年6月和7月，邓小平在上海市市长陈毅家中，两次见到了陈毅的堂兄陈修和，也两次与他谈到修筑成渝路的事。二野即将挺进大西南，邓小平一直在思考怎样使四川老乡多年的愿望变成现实。

学有专长的陈修和是曾留学法国的兵工专家，为完整保护沈阳兵工厂作出过贡献，他向邓小平介绍了抗战时期迁渝的大渡口钢铁厂的情况，说该厂至今仍然有着完好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可以年产4万多吨钢轨和钢梁，正好用于修铁路。

邓小平对陈修和说，将来西南、四川解放后接管、安置和恢复生产的任务很重，很需要技术人才，欢迎他回去参加接收和建设，但因陈修和已应邀出席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故只承担了撰写关于修建成渝铁路的意见书的任务，并向邓小平推荐了几十位兵工技术专家，其中有不少人是留法留德的高材生。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随后设立于此，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面对雄伟却又暮气沉沉的山城，邓小平心潮难平。他心里很清楚，西南局和军政委员会肩负着怎样的重担；沿海被国民党军舰

封锁,原料、器材和零配件进不来,工厂只得暂时停工。水电厂、煤矿曾遭军统特务破坏,供给生产还谈不上。由于经济停滞,重庆的物价好似断线的风筝,一个劲往上涨。薪水发不出,全市的学校也在无形中停了课。

当务之急是要发展生产,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也是这样想的,他说:“要建设人民的生的新重庆。”只有让工厂的烟囱冒烟,这座大城市才会充满活力。

经刘伯承、邓小平提议,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中共中央同意了西南局的报告。

1950年4月,第一批工程人员分赴工地沿线,开始实地勘测。6月,铁道部在重庆组建了西南铁路工程局,这时,有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表示怀疑说:“共产党是不是真要修路,他们能不能修好这条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他们还担心共产党又要来挨家挨户集资募捐,而过去年代发行的铁路股票至今尚未兑现。

这些人的怀疑当然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时代已经根本性地改变了。

6月15日一早,重庆菜园坝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上万群众在此隆重集会,举行成渝铁路的开工典礼。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都出席了典礼,身着军装的邓小平到会致词,高音喇叭里传出他爽朗的声音。他说,我们进军西南时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作起。我们今天建设成渝路,是在经济与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我们调出一部份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修起来,我们今天订出修路计划,开始动工,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真正的困难是在开工之后才能发现。所以今天不能盲目乐观,许多的困难必须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逐步地求得解决。求得克服,并防止官僚主义的倾向发生。

没有强迫集资募捐,更没有拉差派款,首批开赴工地的是

4000多名解放军官兵。以后，西南军区又抽调了3万多人，组成了5个军工筑路队，与铁路沿线的7万民工并肩劳动。

在大渡口钢铁厂，高炉内刮着火焰的风，流动着驭风的火，黑色的金属和灰色的焦炭，都在烈火中分解升华亲和，高唱着创造之歌。在天府煤矿，煤车滚滚轧碎了昨夜的恶梦，满载着希望飞出了十里窑洞。8月1日，中国民航首批开航5条航线，其中有4条通往重庆。9月12日，民生轮船公司的“沅江”号登陆艇，装载首批供应成渝铁路的蒸汽机车、货车车厢等物资43件，驶抵重庆九龙坡码头，随即投入支线使用。

萧条的重庆复苏了。

筑路歌

成渝路东端是丘陵区，西端是平原，地形地貌比较复杂，以往修铁路都有洋人作顾问，这次全靠自己，能行么？

邓小平说：“干得成，我们也有专家。”他提出要大胆使用旧工程技术人员，让他们有职有权，并相应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

选线专家蓝田就是被启用的旧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前他长期担任成渝铁路工程局工务处长和副总工程师，他曾目睹一个个计划化为泡影，心灰意懒，只得以诗画篆刻自娱，并从佛学中寻求精神寄托。共产党的尊重和信任，使他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虽已年逾花甲，仍然朝气蓬勃地接受了重任。

选线是铁路设计的先决课题。线路的走向、里程的长短，直接关系到工程造价，更与施工组织、劳动力调配、工期完成息息相关。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62岁的蓝田带领勘测队，在沿线各地作了一次精确的勘测。

成渝铁路西端成都至乱石滩的原定路线，是从成都北门起，经金堂赵家渡，淮州到乱石滩，全长72公里。此线路必须经过淮州

凉水井一带,那里地质不良,又是一个大塌方区,对今后的行车安全有很大影响。蓝田反复实测,多方搜集资料,与几种方案仔细比较,力排众议,提出经洪安乡越过柏树坳、沿石板河至沱江边与乱石滩相接的改线方案,新线不仅避开了塌方区,还缩短线路 23.8 公里,从长远看,每年可为国家节省大量的营运费。这个方案经铁道部审查后,被采纳实施。

筑路专家刘建熙早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曾受聘于美国波阿铁路公司,他参加设计的一座跨度长 426 英尺的花钢梁大桥,受到桥梁总工程师和公司总经理的赞赏,欲以重金挽留。但刘建熙却毅然归国,想以所学之技报效祖国,先后参加过湘鄂、平汉、粤汉线的设计和施工。他在旧中国的铁路部门整整干了 16 年,虽然参与过不少新建路段和旧线的修复工作,但没有修筑过一条大干线,中国的铁路交通还是那样落后。用他自己的话说:“这 16 年我没少费心血,但成果甚微,只是疲于奔命。”

新中国的建立为刘建熙施展才能开辟了广阔天地,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智全部用在西南铁路的建设中,作为西南铁路工程局的技术负责人,他总是事必躬亲,哪里出现难题,他就乘着吉普车赶到那里去“会诊”。就在简陋的帐篷里,他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面对器材短缺、施工机具落后的状况,他团结依靠广大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进行了多项技改,克服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施工进展到西端时,刘建熙因地制宜,提出将拟架设在资阳以西的几座由重庆生产的厂制水泥樑,改为就地依照厂制尺寸灌注,为保证成渝铁路按时铺轨起到积极作用。

当领导表扬刘建熙时,他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准确地讲,我是靠庚子赔款留学的,那是列强向清政府勒索的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每个中国人头上就要摊一两。这么多的银子别说铸造我这样一个人,就是铺一条纯银的成渝铁路也够了,花这么多钱学到的知识,能不用在建设祖国上么?”

朝鲜战争爆发后,部队组成的军工筑路队全部调走,成渝铁路的施工即主要由民工承担,他们满怀翻身做主人的豪情,意气风发,干劲冲天。

当年曾参加筑路的华荣、凌云柱回忆道:“民工们都拥挤在路边的茅草棚里,睡的是木板上下铺,生活和卫生条件很差。那时抗美援朝,别人捐飞机大炮,我们没钱,只有加快施工,劳动报国。大家约定下班后义务加班半小时,届时班头吼一声“捐献飞机大炮的时候到了”。我们就不仅不休息,反而干得更卖力,那半小时就像现在的自动传送带似的,工效比正常上班提高两倍。”

从沿线招募的临时工,干的多是平整路基的力气活,生活条件更差,但他们照样兢兢业业,准勤满勤。老民工冯德金回忆道:“我们都是从附近农村临时抽调来的,刚开始工地上没伙食团,大家就自带干粮,或是叫老婆孩子送饭。我们不懂什么大道理,只晓得修好成渝路可以造福乡梓,过上好日子,也可以气气洋鬼子,所以一天到晚脸朝黄土背朝天,干得挺欢。”

也正是带着这种朴素的感情,铁路沿线的老百姓都自觉自愿,竭尽全力支援筑路。铺轨需要大量枕木,他们二话不说,砍掉了老祖宗留下的烧柴林;铺路需要大量道渣,他们从不讨价还价,一锤一锤地砸碎了如山的鹅卵石;线路要穿过祖坟祖宅,他们说服亲友,忍痛搬迁;部队要盖木板房,勿需动员老人们就抬来珍藏已久的寿板寿材。

当年在筑路时开机车运送过轨梁的孙振华说:“新铺的路轨限速,每小时大约只有5公里,不时有老乡跑过来送吃的给我们。看到民工们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司机司炉都感动不已。当时我27岁,就与同事们相约,成渝铁路不通车,决不结婚。”他真是这样做的。

人心齐,泰山移。当人们为了实现祖祖辈辈的梦想,并在共同追求的事业中形成一股合力时,奇迹就会发生。清王朝、国民党政

府闹腾了几十年没办到的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眨眼工夫就变成了现实。

成渝铁路从1950年6月15日自重庆方向开工，当年底铺轨到江津，1951年7月通车到永川，1952年6月13日到成都，全长505公里，仅用了两年时间即告竣工。这是中国人独立设计、自行修筑的一条大干线，采用的全部都是国产器材，每公里成本为人民币31万元，系建国后在丘陵地区完工最快、最省的铁路，共节约投资737万元。

圆梦

历史会记住这一天；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典礼同时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成都北门火车站隆重举行，铁道部长滕代远、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分别在两地剪彩。

是日上午8点钟，重庆各界群众3万余人参加了通车典礼大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及重庆市党政军领导到场祝贺。

会上宣布由刘伯承主席签署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命令嘉奖西南工业部及其所属101厂（即大渡口钢铁厂）、重庆水泥公司、昆明电工厂等单位职工，嘉奖长江航务管理局重庆分局职工，嘉奖西南铁路工程局职工。邓小平副主席则当场挥毫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上午10点整，两列披红挂彩的火车从成渝两地同时相向开出。从重庆发车的专列由3895号机车牵引，一共挂了8节车厢，上面座满了各界代表、劳动模范和少先队员，还有一些担任警戒的解放军战士。火车头前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车厢两侧贴满了标语口号，打扮得如同盛妆而出的新娘。沿线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天还没亮就早早赶到铁路边，为的是亲眼看看“自己会跑的洋房子”。专列开到的内江站，与成都驶来的列车相交，站台上的鞭炮纸屑厚积盈尺。晚间23时许，专列抵达成都，只见灯光照

耀如同白昼,迎候的群众将列车围得水泄不通,车上的代表连门都出不去。

蜀道之难名不虚传,过去不仅入川出川重重险阻,就连省内的商贸交往也颇为不易。昔日自重庆沿东大路官道至成都,需经巴县、永川、内江、简阳等 11 个县境,每天乘轿或步行以 40 公里计,差不多要 13 天左右时间。民国时期虽然修建了成渝公路,但汽车跑完单程至少也要 2 天。铁路通车,只需 12 小时即可到达。更重要的是,以成渝铁路为起点,此后不断拓展铁路网,北修宝成线、南筑川黔线、西通成昆线、东衔襄渝线,沟通了整个大西南,为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作出了卓越贡献。

成渝铁路的兴建,不仅将四川省会成都与西南重镇重庆紧密联系在一起,沿线还形成了以电子、机械、建材、轻纺为主的成都工业区,以兵工、冶金、机械、化工、仪表为主的重庆综合工业区,以制糖、轻纺为主的内江轻工业区。与此同时,沿线的县区也发展成为全省重要的粮棉油和生猪生产基地。

成渝铁路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基本建设项目,举世瞩目,它的建成通车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望,凝结着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

记小平同志解放初期在重庆的几件事

魏仲云

(一)大溪别墅的灯光

重庆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住地在曾家岩现重庆市委机关,西南局办公厅在现重庆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那幢房子。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三位西南军政首长的住处安排在现重庆市委大院二号楼。这幢两楼一底的小楼,是抗战时期蒋介石迁都重庆后给宋美龄修建的公馆别墅,名叫“大溪别墅”。按现今的标准,这幢楼房,远够不上豪华,更没有什么设施,家具床桌都是接管时旧家具。两楼一底,大小一共十间,却住了邓刘贺三大家人。

重庆解放,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共产党人,解放军官兵和广大干部的优良作风,如一股清新的春风迅速吹遍巴渝大地。我党我军的廉洁艰苦的优良作风,感染吸引了人民群众的心;人们从新旧社会对比,从我们干部身上,认识了共产党,看到了国家前途,民族希望,焕发起自己主人翁的责任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时代和社会的风尚。

小平同志不仅谆谆教导军队和地方干部要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来发扬优良作风。

在进入机关住地,安排住房时,小平同志就对西南局办公厅机关管理处的同志说:“住在机关内便于工作,安排房子够住就行了,领导同志不要搞特殊照顾。”就定下来住这幢小楼房,三家人住一起。小平同志提出:按年纪大小安排。刘伯承司令员年岁最大,住底楼;贺龙司令员次之,住二楼,小平同志比两位司令员小,就住最窄小的三楼。就这样相互谦让,最后定了下来。

小平同志住下后,风趣的说:“我们三家十多口人住一起很好,像个大家庭。我们三个住一起还有个好处,就是相互了解,在党小组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增加内容,大家有话可说。好得很嘛!”

解放初期,生活艰苦,物资匮乏,为争取经济财政的好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机关特别强调节约水电和办公用品,将用过的信封拆开翻过来糊起再用。机关规定象军营一样晚上10点钟一到,宿舍全部关灯,西南局首长们日理万机,常常工作到深夜。小平说:我们不能例外、要带头执行,但晚上有会议,要处理急办公文,就给我们留下办公桌上的小台灯吧!就这样大溪别墅小楼一到晚上10点,除了刘邓贺三位首长办公桌上的小台灯还在亮之外,全楼其他的灯一律熄灭。首长以身作则,节约水电执行得很有成效。

大溪别墅小楼的台灯灯光,透过夜幕,在西南局机关大院闪烁。小平同志在不眠之夜,在处理着一件又一件紧迫的军政要务。

大溪别墅给我们留下的是永恒的怀念,留下的是深深的反思。

(二)位尊不忘故人情

1949年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冒雨入城,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

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领导机关进驻重庆市。

29年前,邓小平与几十名留法勤工俭学的四川学生一道,从重庆走出,从四川走出;29年后,邓小平率领浩浩荡荡的解放军又回到了重庆,回到了四川。在重庆朝天门码头,邓小平倾听着滔滔江水正伴着战士们的欢歌笑语在歌唱,听着市内处处可闻的亲切的家乡话,真是百感交集,益发兴奋。

29年间,绕山城重庆而过的长江没有改道,嘉陵江也没有改道,滔滔的江水依然日夜流淌。同样的山城,同样的江风拂拂、星月依依,然而,斗转星移,景象大变,邓小平看着已经回到人民手中

的山城，山格外青，水格外秀，重重叠叠的楼房瓦舍，从山脚镶嵌到山顶，美丽壮观。有一天晚上，刘邓大军的解放军战士和地下党的同志们联欢。地下党的一些同志，是从渣滓洞、“白公馆”里死里逃生出来的。参加联欢会的解放军战士和地下党的同志，放开歌喉，尽情地歌唱。歌声犹如长江水一样奔腾，倾吐他们诉不尽的兴奋；歌声打破了夜空的沉寂，震荡在长江两岸，盖过了江水声，响彻云霄，腾空向远方飞去。

邓小平听着歌声，那是雄浑激越、亢奋高昂、深沉悠远的歌声，那是时代捧给历史的动人诗章。他一面听着欢歌笑语，一面饱览山城的夜景，一个崭新的重庆、一个崭新的四川展现在他那坚定、深邃、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雄才大略的目光下。突然，他想到了一件事：“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作为30年前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一名学生，他必须要向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董事长汪云松表示谢意。

汪云松，字德薰，曾当过清朝的四品道台，后担任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早年曾目睹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变法自强的风气在内陆省份四川流行，数千名四川有志青年去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正是那些源源东渡，学成而归的四川人，带回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才使比较封闭的四川，时时发生革命风潮，涌现出大批革命党人。虽然汪云松当过清皇朝的四品道台，但四川保路风潮和辛亥革命，使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增强，他一直想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路子。当汪云松亲眼目睹了吴玉章组织的成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途经重庆赴法国的盛况后，便立即着手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并担任会长。他不辞辛劳，召集社会名流，募集数万元经费，选择重庆夫子祠作为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校址，从关心学校秩序、学生是否认真上课，到一年后举行毕业考试、法国驻重庆领事对学生的口试以及体格检查、确定合格人数，到办理签证，直至最后送

走毕业生,汪云松先生都是亲力亲为,极尽热心。汪云松的这一份热忱,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邓小平想到这里,便决定第二天派人到汪先生府上(现八一路歌剧团)登门拜望,并邀请汪云松先生来,请他吃一顿饭,叙叙旧。

第二天,去请汪云松的几个解放军战士由于没有讲清楚缘由,曾任过清皇朝四品道台和国民党重庆商会会长的汪云松不知是祸是福,连去的几个解放军战士的面都不敢见,就让人把他们给打发走了。第三天,邓小平又派人坐了军用吉普车去请汪云松。当汪云松知道这是当了“共产党大官”的邓小平“不忘故旧”请他时,十分兴奋地随车去到了邓小平住地。这时的汪云松,已是鬓发苍苍,垂垂老矣。当他见到当了“共产党大官”的邓小平的时候,难免有点拘谨,但一经发现邓小平没有丝毫架子,心里便感到热乎乎的,原来紧张的心情,顿时一扫而空。邓小平便与汪云松象拉家常一样,共同回忆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日子。邓小平还向汪老先生讲了他29年前到法国勤工俭学和后来从事革命斗争等情况。

这29年真可谓沧海桑田。听了邓小平的谈话,汪老先生真有痛快淋漓之感。

当汪云松向邓小平告别时,感动万分,他没有想到这位身居要职、为国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大人物竟这样“不忘故旧”。汪云松回家以后,激动万分,逢人便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

这以后,邓小平又向中央推荐,让汪云松到北京列席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宴会上,头一桌的主人是毛泽东,第二桌有邓小平和汪云松。后来,邓小平还和陈毅分工,由邓小平请客,宴会后则用陈毅的车子送汪云松回招待所。邓小平曾对人说:“汪云松老先生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指邓小平和聂荣臻)。”

汪云松先生是重庆城著名的商业巨子，有威望的“五老”之一。解放前夕，为维护重庆社会治安，防止国民党军队破坏，与温少鹤、蔡鹤年等各界人士组织了“重庆各界人民迎接解放委员会”。迎接解放大军入城。

得到了邓小平的热情款待和礼遇，汪云松不仅打消了顾虑，而且主动积极投入解放初期的各项民主改革，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向工商界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带头购买“胜利折实公债”为抗美援朝捐款购买飞机大炮。并将自己珍藏的珍贵文物 173 件（包括汉代青铜器、古今名人字画、各种玉器古玩）捐献给国家。汪老先生在毛泽东生辰，为给毛主席祝寿，将珍藏的一对心爱古瓷瓶，装在精制的楠木盒子里，在木盒上刻了“东方红”三个字，作为祝寿礼品，送到中南海为毛主席祝寿。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党的领导人是不祝寿，更不收寿礼的。邓小平同志对中央统战部领导同志说：“要理解汪老先生的盛情。”中央办公厅作为特殊情况，破例收了汪老先生的寿礼。

小平同志调中央工作后，一直保持同汪云松的联系。得知汪云松病重，从北京打来电话请汪去北京医院治疗。汪云松逝世，小平同志专门发来唁电，表示哀悼。

（三）抢救、保护文物古迹

在政治上，经济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在重庆解放后的一个月，就筹备就绪。1950 年 4 月初，第一批工程人员就分赴沿线开始实地勘察。小平政委历来办事就雷厉风行，这时，成都战役才刚刚结束，各地社会秩序尚未安定，沿线还有小股土匪。小平政委派出部队保护工程勘察人员，命令部队：边保卫勘察队，边剿匪，要保证工程勘察任务完成。

小平同志在铁路勘察人员实地勘察还未结束，就从西南军区各部队抽调 3 万多人，组成了 5 个军工筑路队开赴各路段，开始极

为艰苦紧张的筑路。6月，西南铁路工程局在两路口正式成立。整个工作一环扣一环，紧张有序。小平同志在筑路大军开工后，又在思考着一个重要问题：横贯川东川西12个县，全长505公里的成渝线，在这历史悠久的天府之国，有两千多年的巴蜀历史文化的土地上，从西汉到三国的刘备；从十六国的成汉到五代时期的前蜀后蜀的王朝都在巴蜀建过都城。五百多公里沿线地下一定埋藏着大批珍贵文物古墓；沿途更有不少巴蜀名胜古迹。地下的珍贵文物是国宝，一定要抢救。而我们参加筑路的部队战士和民工，没有历史文物知识，不懂得保护，如若在挖路基中损坏了文物，沿线名胜古迹受到了破坏，那将是无法换回的损失。

小平同志对自己故乡的历史文化十分熟悉，越想越感到，抢救和保护文物古迹，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他就派了秘书驱车前往沙坪坝重庆大学，持他亲笔信函去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张圣奘教授，请张教授来西南局办公厅，向张教授请教。

张圣奘、成都人，是我国著名的史学专家，其祖先张居正官居明朝宰相，他对自己故乡巴蜀历史文化很有研究。曾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史学、文学和历史学博士学位，熟悉巴蜀历史文物。

小平同志礼贤下士、特在办公厅会客室（现曾家岩市纪委）门前台阶前迎接。并设宴招待张教授。小平同志说：“成渝铁路已动工了，我们四川历史悠久，好几个皇朝在川建都，名胜古迹和地下的文物很丰富。参加筑路的多是部队战士和农村的民工，他们不识文物，缺少文物知识，要是损坏了文物，就是我们这辈人的罪过，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抢救和保护。今天请张教授来，想请张教授组织一个专家组，到铁路沿线工地寻宝，发现和鉴别出土文物，保护名胜古迹。

张圣奘是一位爱国进步的学者，在沙坪坝抗暴学生运动中，率

领教师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对邓小平的邀请和交付的任务,欣然接受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张圣奘回到沙坪坝很快邀请了一批学者组织了文物调查组,在邓小平同志的安排下出发到筑路工地。为了专家们的安全,小平同志调派一个连队和工作人员,保卫专家们安全。考虑到张圣奘几位老教授沿途辛劳,特意为他们每人配上一乘滑竿。学者们不负邓小平的重托,于1951年1月冒严寒,吃野餐,住工棚,艰苦的开展工作。3月9日,学者们在张圣奘率领下在天寒地冻的工地上,从资阳县九曲河大桥工地的泥泞基坑里,挖到了一个人头盖骨化石。上报给邓小平后,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专电给北京的郭沫若,并派专人将人头盖骨化石送请郭沫若,经我国著名的考古文物专家北京大学裴文中教授鉴定。出人意料,这个头盖骨化石是旧石器晚期的人类化石。是继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和中国山顶洞人化石后的又一考古重大发现。这一重大发现立即在世界考古界引起了轰动。被中外考古界将这在资阳县发现的人类化石定名为“资阳人”。对张教授们为我国考古这一重大发现,邓小平政委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致电祝贺,感激学者们的辛勤劳动和重大贡献。

张圣奘教授和同事在民工们协助下又在巴县冬笋坝筑路工地的路基泥坑中发现了20多座船棺墓葬,有的是用整段木头挖凿成独木舟形的木棺,并挖掘出一批青铜兵器剑、钺、戈、矛等文物。经专家学者鉴定,出土的船棺墓和兵器,是战国后期,巴国都城巴族官兵戍守都城的兵吏们的墓地,具有巴文化特征的珍贵历史文物引起史学界重视,是公元前316年前后巴国的历史文物。现船形棺和其他出土文物都陈列在重庆博物馆。这都反映了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在戎马倥偬中,高瞻远瞩,这么重视对祖国文化遗产、历史文物的抢救和保护。

(四)不准压制民主

1951年7月6日,西南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重庆市第三区(现沙坪坝区)沙坪坝小学徐秀英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注意。

这封来信,反映地方文教主管部门任意占用教师的时间,如拉教师去搞宣传和社会扫盲等工作,参加与教学无关的的会议等等,使教师没有时间认真备课和休息,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信中建议“文教部门应关心小学教师的疾苦,给教师以必需的休息和备课时间,以利抓好教育。”这封人民来信,真实地反映了基层文教主管部门忽视学校教学,乱抽调教师搞社会工作的混乱现象。信中写明,她怕打击报复,是用的化名,希望报社对她的真实姓名保密。来信刊出后,在解放不久的重庆教育界和读者中,反应强烈。报社又接连收到这所小学教师来信,认为徐秀英反映的问题符合事实,批评正确,表示支持。

这封人民来信之所以引起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领导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是因为在此之前,大中学校乱抽乱调师生的混乱现象已引起社会和教师的不满。邓小平十分重视学校存在的问题,亲自听取情况汇报后,亲笔修改了报社的社论稿《是结束学校教育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时候了》。还严肃而郑重地指示报社,对于“所有乱抽乱调的单位报纸都要公开点名,否则此风刹不住”。

出乎报社的意料,这封读者来信刊登后,就收到了一封以校长李若筠领衔的“沙坪坝小学全体教职员工”联名写来的“申明信”。信中指责徐秀英“捏造事实,损害学校名誉”,还郑重要求报社“予以更正,以正视听”。过了几天,报社又收到了第三区人民政府的信函。称“徐秀英反映的不是事实,”“经查该校无徐秀英此人”,也申明“要求报社予以更正”。接着,这所小学的教师寄来一封匿名信(声明怕打击报复,只有匿名),揭发那封全体教职员联名要求更

正的签字信,是李校长起草好后强制教职员们签的名。匿名信提出“绝大多数教职员都认为徐秀英信中反映情况属实。请求派记者到校调查。

事情变得复杂了,报社决定派记者深入调查核实、弄清事实真相。经记者深入调查,真相终于大白:“化名“徐秀英”的来信完全是事实,问题比信上写的还要严重。那封“联名信”出自校长之手,是校长多次动员强制教师联名的。李校长本人见到记者调查时也吐露真情,她说写联名信是区人民政府文教科领导事先指示她干的,她只有照办,其实她对文教科打乱教学秩序,强迫命令很有意见。

《新华日报》在澄清事实后,抓住这一典型的“压制民主、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公开予以揭露。8月25日起先后发表了这所学校教师的来信和李校长的“联名信是区政府指示我做的”申明信。编辑部在发表两封信的同时,加上《反对任何压制民主的作风》为题的编者按语。按语中指出,只要端正态度,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错误是不难改正的。

想不到,这个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讳疾忌医,居功自傲,认为一个小小教师冒犯了他的威严,报纸扫了他的面子,不仅不作自我批评和反省,反而指使文教科的干部到这所小学追查化名“徐秀英”的人,怀疑这化名信就是说真话的老校长写的;在学校查不到写信人,又派文教科的负责人潘某到新华日报,要求报社交出写信人的真实姓名。这种无理要求遭到报社严厉拒绝后,他竟大发雷霆,大闹报社编辑部。造成极坏的影响。

邓小平一直注意报上对这件事的报道,并在报社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上,亲笔批示重庆市委书记和市长:“霖之、荻秋二同志,请你们干涉此事。”

在邓小平批示和亲自过问下,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对坚持错误,压制民主,对抗批评的主要责任者和有关人员予以党纪政纪处分。

11月29日,《新华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有关责任人的处分决定。这样,小学中的混乱状况迅速得到了扭转,树立了以教学为中心,把小学教育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五)对一封匿名信的批示

195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收到了一封署名“重庆大学进步同学”的匿名信,信用的是重庆大学的信笺。用毛笔书写,字迹潦草,有意写的歪歪斜斜,从字里行间,可看到并非出于“学生”之手笔。内容是揭露重庆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鲁教授不称职,要求上级不要任命为校长。其中提到:邓与何鲁是广安同乡,任命何鲁为重庆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委是“有私心”。

时值西南重庆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处于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中的小平同志对这样一封普通的群众来信却十分重视。他敏锐地从这封简短的匿名信中觉察到当前我们干部队伍中存在一种错误思想倾向:就是一些人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抵触。对党外人士不信任、不服气、不团结。不能正确地对待和评价党外人士。存在着门户之见。中央文件中提的是“统战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小平同志认为。这种错误思想倾向,已严重影响我们同党外人士团结合作,对我们面临的艰巨复杂的任务。危害极大。

小平同志6月30日,提笔在这封匿名信上作了如下批示:“此件交楚张廖诸同志看。何系广安人。与我同乡。故有所谓“私心”之语。

邓

六月三十日

(注:楚张廖——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楚图南,西南局统战部张平江和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

小平同志并将此事郑重地在西南局常委会上提出。谈了他对

此事的看法：认为匿名信所反映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对何鲁一人不满的个人成见和矛盾。而是反映出我们有些干部中不能正确对待党外人士。不愿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一种错误思想的反映。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的警惕。采取有力措施来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小平同志说：因为是匿名信，要弄清写信人的身份和动机，是不是我们干部还是次要的。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信中反映出的问题。有必要在我们党员干部中进行统战观念，统战政策的教育，纠正统战工作中的关门主义错误倾向。

常委会上经过讨论决定：“嘱重庆市委转三区区委（现沙坪坝区区委）了解呈报西南局统战部”。市委于1951年7月11日发文附上匿名信转到重庆大学党组织关系所在的三区区委。

何鲁是何许人也？何鲁是西南局重点统战对象、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的中央委员、重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是我国著名的大数学家。

何鲁、四川广安县人，生于1894年。聪慧过人，10岁能诗。13岁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后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辛亥革命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与董必武、周恩来、吴玉章等同学在法国里昂大学主攻数学。他以阐明“由一种变数发展到多种变数”的理论而蜚声世界数学之林。成为我国一代数学泰斗。我国著名的学者华罗庚、严济慈、钱三强都是他的门生。他还以解答了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而享誉世界。据说英美西方国家对他的数学天才、他的头脑为什么会这么发达、产生极大兴趣，愿出十万美元买下他的脑袋，待他去世后用于解剖，为研究人类脑功能的增强提供线索。何鲁27岁时回国，先后在安徽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任教；抗战时期在唐家沱创办戴英中学为乡梓培育人才。长期在沙坪坝重庆大学任系主任等教职。何鲁爱憎分明，拥护共产党主张，参加“民革”。1948年在沙坪坝师生掀起的“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中带领教师走在大游行队伍的前列。不为反动

权势利诱。对反动军阀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敢于无情抨击。重庆解放后,重庆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时被西南军政委员会任命为主任委员领导职务。

按道理说象何鲁这样的党外人士。担任重庆大学领导职务是很恰当的。为什么有人写匿名信反对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何鲁生性孤傲,主观固执,人际关系不好,嗜酒善饮,人称之为“酒中仙”。旧文人习气重。工作懈怠领导无方等缺点。信中反映的问题也非都是诬蔑攻击,但其目的是反对何鲁主持校务。

经调查了解。匿名信并非出于党员干部之手,是重庆大学商学院一位姓罗的教授写的。此人属于以前重庆大学派系斗争中与何鲁对立一派的成员,为维护他们利益争夺校领导权,以匿名信手段向邓小平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连发三封攻击何鲁的匿名信,妄图取而代之。

匿名信是查清了,问题虽不是党内的人写的,但从另一角度,提醒我们要警惕党内干部中严重存在的不愿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排斥党外人士的错误倾向。小平同志在重庆市第二次党代会上,就这个问题严肃的指出:“有些同志对统一战线产生抵触,存在门户之见,以老资格功臣自居去压别人。认为革命胜利了,不要别人也行了,不尊重党外人士。硬要党外人士服从自己,不让人家有职有权。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在共产党员中不弄清这个问题,只有孤立自己。我们工作将受到很大损失。

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纠正统战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执行。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牢牢树立党的统战观念。

(六)批评“五里腿”

重庆解放后,大批干部入城,西南、川东和重庆三级党政机关都集中在重庆。机关用房特别紧缺,一些负责干部不顾大局,为本

单位和个人争房子、争汽车,使行政后勤部门十分为难。有些干部开始贪图享受,滋生了享乐腐化的不良思想,认为“革命胜利,战争打完了,进城掌权了,该好好地享受享受了”。除了争着抢占好房子,还要求配车子。他们说:“重庆城山高坡陡,爬坡上坎,走不上五里腿就走痛了,不配备小车怎行呢!”那时的所谓小车,就只有从蒋介石军队缴获的美国造吉普车。“僧多粥少”,不少机关配不到车,一些人就发牢骚,说怪话,发泄不满。

邓小平听了情况汇报后气愤地说:这些人思想变得多快,进城才几天,腿也变娇贵了。这种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的享乐腐化的歪风,一定要刹住。

1950年初春的一天,邓小平在西南局小礼堂召开了西南局和重庆市机关县团级以上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小平蓄着平头,身着部队发的白布衬衫,双臂自然放在桌面上,面前放着搪瓷口盅。他容光焕发,神气严肃,用他那颇具特色、精练而犀利的语言讲话。他针对进城后干部队伍中一些人滋生的居功自傲、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和追求名利等种种错误思想和表现,作了深刻的分析的批判。他说,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生产尚未恢复,大批工人失业,群众生活贫困,这些困难,都有待我们艰苦奋斗去战胜。说着说着,话锋一转,严厉地说:可是,我们有的人进了重庆城,不是忙工作,而是忙着铺摊子,争房子,要车子。房子要大的,车子要小的,说什么走上五里腿就痛了,进了重庆腿也变得娇贵,变成了“五里腿”了。进城才几天,变得这么快!过去在山沟里转,南征北战腿都不痛,一进了城腿就痛了,非坐车子不行。我看这是享乐腐化思想在作怪。“五里腿”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一刹,对各种不良倾向,必须作无情的批判和斗争,以保持党的纯洁性。

小平宣布,西南局已决定成立一个机关用房清理委员会,由他来担任主任,用房用车由委员会根据现有房屋和工作需要统一调

整分配。多占用的房子和汽车限期退出,逾期不退的将给以党纪政纪处分。邓小平的讲话传达下去后乱占房屋和争要小汽车的歪风,很快刹住了。

6月6日,小平亲临重庆市委,出席重庆市第二次党代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他根据中央5月作出的在全党进行整风指示的精神,联系重庆地区干部思想作风存在的问题,对入城后党员干部中表现突出的居功自傲,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享乐腐化等错误思想的严重危害作了精辟分析,再次批评了“五里腿”和腐化堕落的腐朽思想。号召全体党员积极投入整风运动。

小平在领导整风和进行党风建设中,很重视抓典型和舆论导向。他一再给《新华日报》领导同志打招呼,对干部中带有普遍性违法乱纪的典型问题要见报,不管他过去对革命有多大贡献,不管他现在身居何职,都应受到惩处。报社送小平审定的重要稿件,他都亲自审改。就在小平同志严厉批评“五里腿”后不久,又将严重官僚主义造成工厂工人变相罢工的重庆豫丰纱厂军代表和享乐腐化挪用公款为个人购置毛毯、被面和热水瓶的原中央医院(现西南医院前身)军代表等给予撤销军代表职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将处理结果在报纸上一一公布。这些,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

(七)平息金融风波

到重庆一个月后,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局财委主任的邓小平即把稳定金融作为入城后的当务之急,提出了“一手抓接管、一手抓金融”的指导方针。他在接管工作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从入城那天起,就应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

为取得金融战线斗争的胜利,有远见卓识的邓小平,早在向西南进军之前,就遵照中央部署,作了周密的安排。一支从老区抽调

的具有金融工作实践经验的银行干部,集中在南京培训,组建了西南服务团银行中队随军出征。在千军万马挺进大西南的战斗序列中,有一支装备特殊的车队,一辆辆密封的军用卡车上,戒备森严地架着机枪护卫,车里满载着在华北老区印钞厂印制的崭新的人民币。这支车队日夜兼程,随着解放重庆的先头部队入城后的第6天就开进了城。重庆解放后第11天,1949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川东和重庆分行正式宣告成立。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设立金融部,重庆城小什字原国民党中央银行大楼挂上了重庆市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的招牌,各区38个银行办事处、分理处先后建立并挂牌营业。街头与“入城守则”和“市军管会布告”同时张贴的“军金字第一号”石印布告十分引人瞩目,它正式宣布:国民党的货币银元券作废,禁止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明令禁止黄金、外币在市面上计价行使货币职能。这一系列决策和部署,快速简洁,一环扣一环,步步到位。所有这些部署,都是在邓小平直接筹划指挥下落实的。

未出邓小平的意料,金融形势一开始就显得十分严峻和尖锐。国民党的银元券和黄金外币被禁用了,但我们手中的人民币占领不了金融市场。由于形势发展快,二野进军神速,随军运进城的人民币总共只有一千亿(旧币),投入市场和各种支出后发现,至少要九千亿才能左右金融局势。由于缺口大,银根紧,筹码少,混乱和被动局面很快出现了。一场无法避免的交锋激烈地展开了。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缺少货币手段外,突出的原因是,人民政权初建,社会秩序尚处于混乱状态。群众对人民币还缺乏信任,潜伏的敌特伺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社会上投机倒把分子兴风作浪,城乡形成银元交易黑市,破坏了金融秩序,由于一些不法商人拒收人民币,市面上出现原始贸易形式的以物易物,多年不见的棉纱等实物又被当作货币在市场上流通,早已消失的不值钱的铜板又成了通货,银元更是身价百倍,比价直线上扬,为缓和矛盾和冲击,照

顾群众相信银元的习惯心理,重庆军管会采用应变措施,宣布允许银元以1比6000元人民币(旧币)的比价在市上流通,但仍没有抑制住。黑市银元贩子更加猖獗,物价陡涨,人心浮动,有如沉沉乌云笼罩着刚解放的山城的上空。西南局和市委召开的重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成了“诉苦会”,到会的资本家情绪激动,语言尖锐,争相诉说电厂无钱买煤发电,水厂无电抽水,企业无钱购进原料、濒临关厂倒闭的困境,异口同声呼吁“政府给以贷款输血,否则山城将变成一座死城了。形势严峻,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邓小平在西南局和财委会上强调:银元券是国民党掠夺人民的工具,随着反动政权的崩溃,自然已是废纸。按说,我们是可以不管的。但是,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对人民负责的,所以我们决定收兑,以减少人民的损失。这是关系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做好。不管群众手里有多少银元券,都要如数兑付。重庆市军管会发出安民告示:以1元人民币比100元银元券的比价,收兑群众手中的银元券。

想不到,这样大得人心的好事,却酿成一场挤兑风潮。公告贴出后,全市30个银行机构在短短的5天,就收兑了1400万元的银元券,共兑付了人民币10多亿元(旧币),由于库存量减少,收缩兑换点,重庆分行大门外出现了长蛇阵,并且越排越长。迅速形成人山人海之势,秩序越来越混乱,群众情绪越来越激动。深受国民党货币贬值钞票兑换之苦,而心存余悸的重庆市民群众,手持已成废纸的银元券,气势汹汹地拼命挤向银行大楼的铁栅门,势如潮涌。警卫战士举着铁筒喇叭维持秩序无济于事,宣传解释反而增加疑虑。分行一面向军管会告急,请求派部队来维持秩序,一面向市委和西南区行报告说:“挤兑风越刮越猛,挤兑的长龙有增无减,按照这几天兑换的数额,银行金库现存的人民币最多只能维持3天了。”库存人民币只有随军装运来的1千亿。各方面开支庞大,我们自己的部队60万人,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90万人,重庆旧人员和企业职工11

万,天天要吃饭,粮食靠钱买。工矿企业机器转动。市场启动,无处不等着要钱。市民手中究竟还有多少银元券?银行那点库存,眼看着在急剧减少,怎不令人心急如焚呢?下面各级领导人都焦急地期待兼任西南局财委主任的邓政委果断决策以摆脱困境,迅速平息金融风波。急如星火的告急报告呈放在邓小平的办公桌上。

大溪别墅会议室入夜灯火通明,西南局刘、邓首长召集的决策会议正在紧张进行,与会同志都把期望和信赖的目光投向坐在那张白木长条桌主持会议的邓政委。时年45岁的小平同志,神情自若,沉着从容,用他那宏亮而铿锵有力的四川乡音,精辟地分析面临的金融财经形势。同志们像在战争年代崇敬和信赖老首长胸中自有“锦囊妙计”那样,相信邓政委定有良策善谋。邓政委分析有关情况后,向着参加会议的重庆市长陈锡联、副市曹荻秋问道:“锡联、荻秋同志,银行库存还能应付几天?”曹荻秋回答说:“只能再维持兑换三天,过几天仍这样挤兑就难办了。”邓政委站了起来果断地说:“好,只要能维持三天就行。我已与刘司令员商定,立即调集部队所有的款子补充库存,再从邻近地区调动一些应急,问题可得到缓解。”与会同志中有人对只调集应急资金能否摆脱困境产生疑虑。邓小平最后才向大家交底说:“早在半个月前,已向中财委发出加急电,电请中财委急调一千至二千亿人民币空运重庆。估计这几天即可运到,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时,大家才明白邓政委运筹帷幄,早有良策。

实际上,邓小平对入城后金融可能出现的问题早有察觉,怎样弥补两个估计不足,在金融风波出现前曾急电中财委。1950年1月2日,他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们最感苦恼的是筹码太少,银行汇兑业务都不敢办,工商企业和出口商业均陷入停顿。我们已电中财委用飞机火速送一、二千亿来,如果办到,可以松一口气。

很快,重庆银行大楼前的挤兑人群惊奇地发现,铁门内兑换柜前的铁栅栏内奇迹般地堆着一捆捆堆起像座小山的崭新的人民币,

门前排起的长龙渐渐消失了。

兴风作浪猖獗一时，操纵银元黑市的银元贩子的老窝——较场口米亭子黑市市场，被武装部队扫荡取缔，银元贩子顿时销声匿迹。街上，取代前几天挤兑喧嚣的是声势浩大的“拒银运动”游行队伍和一队队的街头宣传队。

大溪别墅会议室西南局财委又一次扩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正在讲话，一位秘书急匆匆地走进来递上一份电文。邓小平看过后，眉毛一抬，喜形于色，举起电文，对大家高声笑着说：“好了，好了，中央给我们送钱来了。”这是重庆解放后第一架从北京直飞重庆的飞机，已在白市驿机场降落，真是‘及时雨’啊！他当即下达指示：速派一个营的队伍押送钱款去昆明、贵阳，其余全部速送西南区行入库，最后还交待：“所有运钞车，都要架起机枪护送。”会场顿时充满欢声笑语。

大西南的经济血脉通了，重庆的经济血脉通了。随着组织“人民币下乡”，流向乡镇。一通百通，百业启动，混乱的金融秩序迅速扭转。沉寂的朝天门码头又兴旺起来。

（八）稳定物价 保障人民生活

邓小平率领二野机关进入重庆市区这天是1949年12月8日，刚在曾家岩大溪别墅（现市委二号楼）住下来，第二天就召集市军管会主要领导人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部队正在向成都、昆明进军，大的战斗不会再有了。面临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留下这个烂摊子，百废待举，千头万绪，任务并不比淮海战役轻。怎么办，就是团结依靠重庆人民群众，去战胜困难。我们当前中心任务就是立即把领导的精力转向城市，迅速恢复被破坏的城市生活。

小平同志端起搪瓷口盅喝口水，眼望着到会同志接着说：眼前最最重要的是稳定物价，尽快恢复生产，关心人民群众的柴米油盐，组织好重庆市民的基本生活。民以食为天，首先是抓粮食供

应。老百姓吃饭是件大事,把物价稳住,首先是稳定粮食价格。这是一项头等政治任务。物价稳不住,粮食脱销,社会就要乱。我们干部大都是当兵出身,不懂就学嘛。

当时,重庆市场紊乱,物资奇缺,我们手中没有掌握粮食,物价不断上扬,形势极为严峻。1950年1月2日,小平同志致中央的电报中写道:“重庆解放已届一月,上上下下都在忙乱中度过。据初步接触,问题至为复杂。……首先是吃饭问题。西南吃饭人数,我们自己60万人,接收国民党的估计在70万以上。重庆接管的工人职员共95000人,估计吃饭人数约12万人。征粮工作刚开始,大部份县的干部还未派出,派出的数量也很小。重庆的部队、机关还在买粮吃,而地主、富农却在大批卖粮,土豪劣绅则大肆盗卖公粮。当务之急是拿到粮食,我们正督促部队迅速抽干部下乡征粮,能否完成预定任务,很难说有把握。”

此时,重庆市区(当时旧区划为一至七区)的不法商人乘机囤积粮食,哄抬物价,妄图在物价和粮食上同共产党进行较量。暗藏的特务也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一些不法资本家也在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说:“共产党军事是内行,搞经济不行。”

1950年1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大溪别墅小会议室里,小平同志正在召集市军管会领导同志研究平抑物价会议。从战场上刚转到接管工作的将领们张际春、陈锡联、谢富治、闫红彦、张霖之、曹荻秋、刘岱峰身着褪了色的军装,围着一张白木会议桌,聚精会神地聆听邓小平同志对重庆经济形势的分析。小平同志机敏地分析计算了货币投放量和重庆物价上涨指数,预测了物价可能涨到什么程度,何时才能稳得住。接着介绍了上海军管会控制物价,定时公布生活日用必需品米、布、煤、食油折实牌价的数字,有效的平抑物价的经验。他站了起来,举起双手,一一将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米、油、布、煤折实牌价讲了一遍。接着向到会同志说:“我

们重庆,这5种商品加上运费,每个折实单位应是多少。接着小平同志公布了西南财委制定的:以大河上熟米3市斤、双喜白布1市尺、熟菜油1市两、合槽煤3市斤,这5种实物的当日定额价格的总和来折成“折实单位”。老百姓存入银行储蓄的人民币要支取时均按当日5种实物的单位牌价支付。《新华日报》天天公布重庆的折实单位,让老百姓知道当天牌价,人心稳定了,《新华日报》逐日公布了折实牌价,市场的物价逐渐稳定下来了。不到两月,混乱的市场上物价稳定下来,1950年5月银行停办折实储蓄。但“树欲静风不止”,不法商人估计我们掌握粮食不多,在市场上掀起一股抢购囤积的妖风。各区我们开张不久的国营粮店都出现抢购。小平同志一面紧急部署邻近地区将征收的粮食加紧向重庆调运。下令必须按预征数保证完成,如巴县必须尽快完成40万公斤调运任务;一面亲自召集市粮食局局长胡伦、朱良同志到他办公室汇报,询问得很仔细。问市区有多少个门市,出粮多少?粮价多少和市场动态。并布置粮食局深入市场调查,随时掌握市场动向。

小平同志对这场斗争,早已胸有成竹,果断作了紧急安排,严阵以待。市粮食局发现市区大阳沟一带粮店出现抢购,粮店门前从凌晨就有人排队,轮子越来越长。经调查发现是白龙池(大阳沟附近)粮商秦洪泽和万金安等人花钱雇人来排队抢购的。不久,市区其他粮店也出现不法商人抢购囤积,企图抬高粮价,扰乱市场的现象发生。不久,粮价因粮商大量抢购,粮商以政府公布的牌价每担糙米7元购进,又以16元一担高价转手抛出,造成市场物价波动,各粮店脱销,人心浮动,排队抢购越来越多。不法粮商满以为政府粮库存粮不多,变本加厉地抢购;各面粉厂的厂商也抢购小麦囤积居奇。一时,粮食市场出现紧张。

小平同志召集市人民政府和粮食局的负责同志研究对策说:“要稳住,不要乱了阵脚。他们涨我们也涨嘛!让他们涨,到时间叫他们吃不了兜起走。这好有一比喻“牛已过河了,如拉牛尾巴牛

是回不来的；只有牵牛鼻子，牛才会跟着你走。”小平同志指示：由市人民政府对大阳沟不法粮商泰洪泽、万金安，依法进行查处，打击奸商的嚣张气焰；政府国营粮店也挂牌米价上调到16元一担，各区街基层干部出动向群众作宣传解释。不法粮商不知内情利令智昏，趁机大量抢购，囤积等候再涨获暴利。小平同志已急令川东、川南行署连夜调运大量粮食进重庆。仅10多天的时间，全市粮店统一挂牌：糙米每担价压降为7元原价，大量供应。这个“先放后收”的良策，使重庆物价很快稳定下来，群众拍手称快，投机粮商惊惶失措，赔尽老本，牛角沱富民面粉厂的老板鲜伯良惊叹说“这一来，叫我除了老本。共产党不仅会打仗，而且还会管理经济，这么快把物价稳住，是我们工商业界所料不及的。”

大国外交的艰难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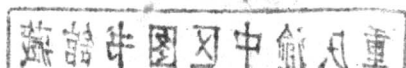
——记 1942 年关于中英新约的外交谈判

胡道修

1941 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成为仅次于美英苏的准大国,在战争期间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经势在必行。1942 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局势,凭借全民族的英勇抗战和国内人民的大力支持,在与英美两国的交涉中成功地废除了奴役中国人民达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从而显著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迈出了大国外交的第一步。

1942 年 6 月后,太平洋战场局势开始好转,美国国内要求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给与中国平等待遇的呼声日高,美国官方逐渐意识到放弃治外法权更有利于美国的对华战略。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是年 9 月初,美国向英国建议说,只有乘谈判的主动权还在美英手中之机,采取行动才会达到加强中国抗战的决心,改善中英、中美关系与“保证美英公民在其他友好国家所拥有的一般权利”这三个主要目的。10 月 10 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与中国官方谈判,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的条约。随之中美、中英间关于废约的外交交涉开始进行。中美双方主要在华盛顿进行谈判,中英双方的谈判则主要在重庆进行。

中国方面对谈判做了认真的准备。10 月 12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了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就废约问题作了初步交涉。蒋介石亦明确指示外交部长宋子文,“领事裁判权以外,尚有其他同样之特权,如租界及驻兵与内河航行、关税协定等特权,应务望同时取消,才得名实相符也”。外交部在准备的谈判方案要点



中强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接受局部之解决,暂时不提不平等条约以外之问题。

美国于10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条约草案的起草工作,并随之将其提供给英国参考。英国对美国的草案作了若干有利于西方在华利益的修正,大部为美国所拒绝,但接受了英国一再坚持的“国民待遇”这一项。10月下旬,美英两国先后将其条约草案送交中方。中英、中美间新约谈判分别进行,但由于英美之间经常协调行动,因而两谈判间的关联性很强。

10月30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将英方条约草案送交中国政府,以宋子文为一方、薛穆为另一方的签订中英新约的谈判在重庆正式开始。英方草案的主要内容有:

- 1、废除在华治外法权;
- 2、中止1901年辛丑条约;
- 3、将上海、厦门国际租界交还中国管理;
- 4、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交还中国;
- 5、保护英国现有在华不动产产权,给予英国在华公民以“贸易国民待遇”。

双方谈判中的一个重要的焦点即归还香港或新界地区,但英方草案中并未包括这个中方至为关心的内容。

11月13日,国民政府提出中方的修订草案。除了不同意给与英人以贸易国民待遇、要求结束英国在华的沿海贸易权及内河航行权外,还建议在条约中加上废止1898年在北京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收回新界的立场。

英国政府收到中国方面的“修订草案”后,对中方提出“修订草案”次要的能争则争,主要的地方则寸土必争,决不让步。双方围绕修正稿进行谈判,

关于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的问题,中国方面明确要求英美放弃。英国方面强烈要求把这个问题推迟到战后条约的谈判中再讨论;美国方面则决定采纳中方的建议,但提出要求中国继续开放通商口岸,在口岸地方及领水内,双方给予对方商船以本国船舶或最惠国待遇,中方接受了美方的建议,互予最惠国待遇,英方最终基本接受。

关于“国民待遇”问题,中国方面虽然以“不低于国民待遇”的提法以满足英美的要求,但取消了原有的“经商”字样。英国为能在将来条约中保证其在华的商业利益,则坚持要保留“经商”字样。美国方面以其国内司法制度特殊,不能给予中国以国民待遇为由,表示它除了接受中国方面的建议外别无他法。为了照顾英国的权益,美国又就沿岸贸易等权利向中国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中国方面基本接受了美国方面的修改稿,但在换文中仍然要求英美完全放弃沿岸贸易等权利。这一要求为英国方面拒绝,中国方面再一次对换文的内容作了改动,使其看上去更象是互惠互利。

关于九龙租借地,英方态度顽固,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英国内阁于11月30日决议:“拒绝放弃我们(即英国)在九龙(指新界)的地位”,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要求。早在中国提出要求归还香港新界的“修订草案”正式提出之前,11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在演说中宣称:对香港而言,“我们的意思是再坚持下去。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

12月5日,中方代表再度提出归还新界的要求,薛穆答以“尚未奉到政府训令。”数日后,英方代表正式通知中方代表,英国政府不准备谈新界问题,中方代表称,既然中英新约取消在华租界,而租借地与租界又属于同一范畴,理应谈判新界问题。此项条约如不解决新界问题,就不能消除中英之间的误解。稍后,蒋介石亦明确表示,条约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签字。12月14日,中方通过亲英派要员杭立武将蒋的上述意思转告英方代表。

英方再次拒绝考虑中方的正当要求。谈判陷入僵局。当时重庆舆论激昂,一致认为任何外国无权继续占有中国土地。国际舆论包括美国公众意见依然支持中国舆论,认为“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无辜的牺牲品”。形势对中国有利。

12月21日,英内阁会议决议以英国也把一些军事基地租借给美国,新界(九龙)为“保卫香港所必不可少”为由再次加以拒绝,并称“该租借地(指香港新界)不属本条约的范围”,“为了不致拖延条约的签字……我们应该声明我们准备于战后同中国讨论租借地的前途问题”,只同意战后同中国“讨论”新界的“租期”问题。12月25日英将上述立场正式通知中国。

随着时日流逝,中方代表的立场开始软化。12月26、27日中方代表两次要求英国发表一项表示今后归还新界意向的声明,同时中方保证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新界,否则中方将不在条约上签字。

12月27日,宋子文让已返回重庆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坚持在条约内写入归还新界的内容。顾对蒋说,中英新约是英国出于“友好”,“首先采取行动同我们磋商的”,又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该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在收礼时暗示一下我们在等待第二份礼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对中国来说“极为重要”。12月31日,宋子文又亲自前往对蒋劝说,如不签署中英新约,将使中美新约实际上毫无价值,苏联的态度总使中国人感到忧心忡忡,中国如与英国保持友好,战后可联合对付苏联;九龙目前并无重大的实际意义。宋、顾的劝说对国民政府内部在香港新界问题上的立场软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12月28日,英内阁会议再作决议,坚持对中方已作的答复,同时将原答复中“战后重新考虑新界的租期问题”改为“战后重新

考虑新界的问题”将这句话中的“租期”二字删去。12月30日英将决议通知中国国民政府,称英作此“让步”之后,决不再让。在英压力下和宋子文的劝说下,31日,蒋介石再三权衡,最后同意签约,但要宋子文向英国政府说明,只是考虑到盟国的团结,中国才决定签约。并要宋子文在中方的保留意见文本中加上一句:中国民众自然对英国拒绝讨论九龙问题感到不满。当天,国民政府正式表示不将新界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条约合并提出,在新界问题上对英国作了让步。

1943年1月11日,《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在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新厦(即通称外交部会议厅,今人民公园1-1号)签字。同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照会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对新界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在中国政府对香港新界问题作了让步之后,以中国政府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而结束了外交谈判。

中英、中美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基本上恢复了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平等和独立的法律地位,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显示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团结,增强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中英和中美新约的签订,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给了正在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也标志着中国大国外交开始起步。

纵观此次中英关于新约的外交谈判,中方在有利的形势下仍作了相当的让步,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实力作为坚强后盾。外交斗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国民政府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独裁和抗战不力,使得中国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和可与英国并驾齐驱的地位,在外交较量上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重大胜利,大国外交的第一步实在艰难。

宋子文、顾维钧等未能坚持不懈，据理力争，反而在英国的压力下委曲求全，以保持盟国“团结”为理由，在香港新界问题上作出根本性让步，坐失收回香港新界的大好时机，是一种半殖民地软弱心理的表现。只有真正独立自强的新中国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外交胜利，在1997年7月1日起恢复对香港地区行使主权。

具有传奇色彩的邵子南

朱俊

重庆市博物馆藏有一份近代诗人兼作家邵子南同志亲笔写的自传底稿。薄薄一页纸、廖廖数行字，折射出他或平淡如溪流，或光亮如电闪，或舒缓似流云，或飞腾似骏马的一生。

一

我是四川资阳人，生于一九一六年。六、七岁前，我记得父亲是进行着富农的生产。后来，父亲在大病之后，经济拮据。为了出嫁姐姐，他到成都行医。从此，我家过着自由职业者的生活。我父亲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医生，在十一、二岁前，尽教我读中国医书。后来听了叔叔的劝，才叫我准备进中学。十七岁初中毕业，我父亲已死，我不能读书了，我因为在初中时期听了一个先生的话，读了很多的文艺书，罗曼蒂克的情绪很浓厚，不愿教小学，我走上了流浪汉的道路。在四川岷江流域，我撑过船、要过饭、当过背包包的，当过和尚。当和尚，是以为拿度牒好到处走的意思。目的是要做一个诗人。我曾经到过松潘金矿，抗战前一年，我二十岁，到了上海。一个人天天钻在史量才图书馆，读高尔基，读肖洛霍夫的小说。经矛盾先生介绍，“中流”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春生”。后来又得到欧阳山、东平，草明的鼓励和帮助，在写作上获得了一些进步，连续写了几篇取自流浪生活中的题材的小说或报告。”（摘自《邵子南自传》）

二十年代的四川西北一带流行一句俗话，叫做“整滥就整滥，整滥跑灌县，搞翻就搞翻，搞翻到松潘。”因那里地处川藏两省交界之处，地广人稀，林茂山险，当政者鞭长莫及。一些城市贫民、破产

农民等出没其中，他们大都生活社会最底层，自认早已看破红尘，重义气而轻财富。刚从学校出来的邵子南，年轻气盛，心中弥漫着一种古典英雄主义的情结。他混迹于其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书生意气而引豪杰之举，他曾和人挥拳相争，也曾仗义救下被头人追捕的“娃子”。这种生活，既为他今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原始素材，也使他更加看清了旧中国腐朽，落后的一面。以后他又这样走出岷山到重庆，然后继续顺长江而下。最后，到了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他在那里继续承受着生活的磨难，他先在码头上扛包，后又在工厂做工……尽管生活十分艰难，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对真、善、美的追求。那时，在位于外滩的史量才图书馆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邵子南在那里静坐苦读的身影，听到他在那里高谈阔论的大嗓门。他曾经对欧阳山说过“光写一个人驯服地在受苦、受蹂躏，读起来不带劲，叫人难受……我绝不这样写。我要写一颗明珠从污泥中放出光芒来。”也许我们可以略带遗憾地想象，若不是全民抗战的爆发，邵子南说不定真会向世人捧出一部中国式的“人间”或“我的大学”。

二

“抗战开始，我到了北方，由乔木同志介绍我进了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学习游击战术和民主运动。学习期中，实地工作、组织了十二个游击队员。在这时，我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三八年，我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一直到一九四四年，这当中主要是在晋察冀边区活动。我的写作也转了形势。热衷于写诗和歌词。当时的一点客观原因是诗占的篇幅小，易于发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犯了艺术至上偏向。党帮助我进行检讨，组织我下乡，我在河北阜平县城郊当小学教员。是年（四三年），参加了反‘扫荡’工作，得了晋察冀边区模范工作者奖。四四年回到延安后，我即以四三年秋冬反‘扫荡’中自己的体验，开始了另一个写作上的变化，写作《李勇大摆地

雷阵》等小说。”(《摘自邵子南自传》)

邵子南在这里提到了五十多年前的一桩公案。背景是延安“整风运动”，当时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给他扣上一顶“艺术至上”的帽子，实际了却折射出一种教条主义思潮对文艺创作的桎梏。且抄录几句当时的小诗以便于我们体味一下邵子南当时的心情。“轻轻地从我的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对生活充满了梦想，充满了希望。”

无数次申辩毫无结果，他还是被一掳到底，背起铺盖去阜平县一个几十人的小学校当了一名普通教员。在一九四三年日寇“铁壁合围”的残酷日子里，他放下书本，同游击队员们一起出没于青纱帐中，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后来他据此写成“李勇大摆地雷阵”，发表后，深受边区军民喜爱。后又改编成电影《地雷战》更是名震遐迩。在边区群众大会上，邵子南和李勇、戎冠季等一起胸戴大红花，光荣地坐在主席台上，受到八路军总部首长的接见和表扬。邵子南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日英雄。

三

“日本投降后，我极想到蒋管区看一看反动统治的状态，并想参加四川人民的解放工作。我被派到重庆《新华日报》作采访主任。一九四九年，被迫撤回延安。抱着要打回四川的心里，和四川撤回的同志们一道工作……在向西南进军途中，我才又拿起笔来写作。重庆解放后，我到了重庆，现在重庆市文联。”

(《摘自邵子南自传》)

抗战胜利后的山城重庆，各阶层人士怀着不同的目的汇聚一起，各种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形势十分复杂。这时，邵子南以共产党新闻记者的“合法”身份跻身其中，为准确报道真实情况，宣传真理，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上进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下钻僻街陋巷贫民窟，凭着热情、诚恳的态度，结交了许多推心置腹的好友，他

良好的人际关系更使他轻易地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一次,他通过关系进入白市驿刑警局档案室调阅了所需资料,临行时,他掏出名片,值班警官才大梦方醒,认出眼前这位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新华日报》名记者,抗日英雄邵子南,吓得连连拱手告饶,求他千万笔下留情,否则性命难保。还有一次在国民党市党部内,大员们正聚在一起商议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喧哗之际,烟雾腾腾之中,不知谁突然发现邵子南不知什么时候溜了进来,面带嘲笑,敬陪未坐。

解放后,百废待兴。在重庆文联早期筹办阶段,邵子南身为副主席兼秘书长。在团结,教育,关心文艺工作者等诸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重庆有一大批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川剧艺人,虽然在艺术上各有专长并个个身怀绝技,但受社会习气影响甚深,从心理到生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荼毒。邵子南却以诚相待,毫不嫌弃,把贾培之、周慕莲、阳友鹤等名角邀到重庆各大剧院演出,极大地鼓舞起他们的自信心。有的川剧女伶不幸染上抽鸦片、赌博等恶习,甚至还患有较严重的性病,他就说服,敦促她们戒烟、戒赌,同时还重金延请宦世安、文仲宣等名医,为她们检查、治疗,使不少人重新获得健康并恢复了生育能力。

1955年,邵子南因患白血病,不得不住进医院,在医生、护士的悉心照料下,他的病情渐趋稳定。他感激那些为他付出辛劳的普通劳动者。为此,他抱病在病榻上写下一首赞美护士的小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当病的火焰燃烧着我,

当我的生命挨近死亡,

白衣人来到我的身旁。

我想了很多诗句。

也打了很多的比方。

总不能恰当地描写。

白衣人完整的形象。

说他是好心肠的亲兄弟，

亲兄弟又不能探测我的心脏。

说她是最可爱的亲姊妹。

亲姊妹又认不出我的血相

……

同年 12 月 24 日，终因医治无效，邵子南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许多人赶到医院同他做最后的告别，市文联的同志来了，新生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们来了，文艺界许多老艺人们来了……。人们怀念他，因为他是一个无愧于时代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对解放前南京国立政治大学的几段回忆

薛祚光

(作者任当时该校军训总队中将副总队长兼训导处副主任)

(一)所谓老教育长的陈果夫

解放前,一般人只要提到“中政校”三个字,就会意识到是蒋介石在重庆小温泉办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也就是1946年学校迁回南京以后,经过改制的“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凡是政校学生,他们也又会联想起所谓“老教育长”的陈果夫。

陈果夫、江苏人,国民党反动派四大家族头头之一,他是改制前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第一任教育长(校长由蒋介石兼)。他在政校有十足的权威,凡学校方面的一切重大决定与措施,除了必须由校长蒋介石核批以外,其他的就只有陈果夫说了才能算数,尽管他后来不兼教育长了,学校的一切大权,依然要由他掌握,由他裁夺,因而政校的教职员与学生,一般都习惯地尊称他为“老教育长”。

中央政治学校,起初是1927年在南京“红纸廊”开办的,学校开始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由蒋介石兼校长、陈果夫任教育长,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迁重庆小温泉以后,仍由蒋介石兼校长,教育长则由张道藩、程天放先后担任,陈果夫则以“老教育长”的名义住进学校里边的“蒋介石官邸”,那里紧靠小温泉花溪,景色优美,环境安静,陈果夫在那里除了为蒋介石主持“侍从室第三处”工作以外,同时就以他“老教育长”的地位,经常参与校内各种教育活动,有时还给学生作些所谓“精神讲话”。有时他也请约少数他

所信任的教职员与学生到他所住的“官邸”作“小型会议”或“个别谈话”，好牢牢掌握全校员生的思想动态与感情联系，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为蒋介石与“四大家族”的“独裁政权”打好人事基础。

(二)还都与改制

抗战胜利以后，中政校办了两件大事，一是“还都”，二是“改制”。

所谓“还都”就是1946年上半年学校教育长程天放，带着全校员生跟着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从重庆把学校迁回南京，在迁校还都以前，校方还郑重其事的和学校校舍的房东，原川军将领唐式遵的家属在南温泉一间餐馆里签字约定：“今后如果“中政校”再从南京迁回重庆时，仍应按“合同”约定，仍应给“中政校”有优先租用之权。从政校当局和唐式遵家属的这一“签字预约”，就可以看出当时蒋介石和他们四大家族从抗战胜利以后的全国形势上看，他们内心早已察觉全国人民都已心向毛主席和共产党，他们的独裁政权，是不会受到人民的欢迎和久坐南京的，所以他们老早就准备了这个必要时的逃跑打算，“迁回重庆”。

所谓“改制”，就是1946年，政校绝大多数学生，不满于政校隶属于中国国民党，而要把学校改为隶属于“教育部”，也就是要把政校原来的“党校性质”，改变成一个“国立的普通大学”性质，同时还要求取消蒋介石兼校长的名义，并废除“教育长”制度。学生们对这一合理要求闹了三天三夜，才得到校方与蒋介石的批准，同意改制。但这一“改制”的风潮平息以后，在继任校长人选方面，又发生了明争暗斗的浪潮，而且这浪潮，还闹得更为激烈，争夺的主要头头，是蒋经国派系的一方面，和二陈（即陈果夫与陈立夫）CC系的一方面，他们双方都来争夺改制为国立大学后的这一校长席位。据说政校准备改为“国立政治大学”这一原则决定以后，蒋介石的原意本来打算派蒋经国前来政校担任第一任校长的职位，不料这

一风声传到政校以后,所有 CC 系的学生在“二陈”头头们的暗中支持下,他们就在学校内外大贴其反对和“挡驾”的标语,因为“二陈”CC 系的愿望,是想保荐他们的派系人物顾毓秀来担任校长这个职位的,现在忽然听说蒋经国准备来校主持的消息,于是 CC 系和一些不满“蒋家王朝”的学生,就在校里一面开会表示反对,同时又在学校内外张贴标语,表示坚决反对蒋经国出任政校校长,学生们甚至还在学校大铁门的顶端贴出“我们欢迎宋美龄来当校长”,和“我们只欢迎蒋经国来当事务长”等讽刺戏弄的反对标语。当时这些门前标语、曾使得校门口的来往市民惊奇笑谈,议论纷纷。

这一场争夺“校长席位”的浪潮,结果是“二陈 CC 系”得到了胜利,由 CC 系的大弟子顾毓秀来担任改制后的第一任校长。

学校改制后的结果,可说是换汤不换药,名义上虽然改称为“国立政治大学”。但实际上依然是 CC 系与国民党的核心人物陈果夫、陈立夫,段锡朋、朱家骅等等所谓“党国元老”等人操纵把持,学校性质和其他普通大学相比较实质上是两回事,毫无相同之处。

(三)学校在“三反”运动中

一九四八年春夏间,全国学生由于不满蒋介石发动内战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三反”爱国运动,在这一宏伟运动中,各地学生纷纷走出学校进行宣传 and 示威大游行,南京各校学生也先后群起响应,于是这一“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声势浩大的学生爱国运动,就响遍了南京全市。

这时南京国立政治大学的学生,以及教授、训导,各级军训队长,除了校少数为 CC 系所控制的教职员学生以外,绝大多数员生对这一爱国运动,都是热烈响应或者深表同情,于是各班系的男女学生纷纷在校内开讨论会和张贴标语,并一再向学校当局要求上街参加游行。学校当局,对这一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三反示威游行”自然是绝不允许,拒绝请求。

校长顾毓秀为了想假借全校各教授、训导、军训队长的“公意”来压制学生的这一爱国要求与行动,于是在校本部召集以上人员开了一个貌似“民主”的公开讨论会,来决定政校学生是否应当参加这个“三反示威游行”?开会时已有不少男女学生暗地里围拥在会议室外面,静听会里的讨论情况。讨论开始后,就有两个教授训导先后秉承学校当局的意旨,认为学生不应当去参加游行,他们说:“学生以求学为重,应当在学校专心攻读,不涉外务”。有的还明白点出:“这学校开始是蒋委员长创办的,政校学生决不应当去参加这个‘三反示威游行’”。这时学校军训总队负责人起来发言,他是完全同意学生们的这一正义要求的,他很气愤的起来说:“我认为我们学校当局是应当准许学生去参加这一游行的,要知道我们政校学生一向在社会上受人冷眼和歧视,以及被人看作“特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校历来不与其他学校联系合作,行动也不与他校采取一致,为了政校学生的前途,也为了学校本身的前途,我们是应当接受学生这一要求的。这位军训总队负责人把话讲完,不等散会,他就气愤的走出了会议室,他的这番话,似乎放了一把火,原来在会议室外围听的学生,也都纷纷冲出了学校去参加街上的“三反游行”,去达到他们的正义要求与衷心的愿望。

事后,学校领导方面,如顾毓秀,段锡朋等对学生参加游行,为了顾全校方当局的威望,也不得不把学生集合拢来教训了一番,但对那位支持学生参加“三反游行”的军训总队长就曾先后由校长顾毓秀,校务委员段锡朋给以严加训斥,甚至给以拍案叫骂,同时还撤去了他所兼“训导副主任”的名义兼职,这位负责军训的总队长,他看到曙光行将到来,自己也应及时走出黑暗,于是他毅然脱离了政校和国民党反动派,时间是1948年10月。

(四)写后感想

从以上政大学生强烈要求政校“改制”与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三反游行”充分说明了我国青年，始终是坚持真理，主张正义，反对黑暗，追求光明的。所以过去政大学生尽管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他们绝大多数仍然向往民主，热爱祖国，在今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海内外爱国同胞都在渴望和呼吁“台湾早日回归”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时候，我相信今天还在台湾的政大后期同学，他们在一定的时候，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神圣事业，也一定会有所响应、行动和作出贡献的，我谨作此预料和预祝！

重庆的典当业

赵锐涛

所谓“典当”，也称“当铺”或“押店”。一般地说，是指以财物为抵押品的限期、有息借贷银钱的社会经济行为，是一种经营实物抵押贷款的金融组织。作为一种商业行业形态，通称典当业。其中以资本多少和业务大小的不同，分为典当、质店、押店等类。最早的典当为南朝时寺庙所经营的当铺。历代名称不同，有“质库”、“解库”、“长生库”等。

重庆的典当业是先有典当后有质押，其发展过程，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和商办三个时期。重庆最早的当铺出现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当时有官办当铺一家。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庆官办当铺发生经理人员挪用公款、贪污事件，于是四川总督阿尔泰下令将库银收回，官办当铺撤销。这时在重庆经商的部分陕西客商发现典当生意有利可图，于是向重庆地方政府申请经营执照，经批准后，允许开设典当，其管理性质属于官督商办。据巴县档案资料记载：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重庆有典当四家，历时甚久。直至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又新增一家，这五家是响水桥的“隆德”，小什字的“大有”，九尺坎的“日升”，十八梯的“永贞”，中华路的“荣盛”等。这些当行均系陕西帮客商所经营，他们的营运资本一部分由自己筹集，一部分由当地票号贷款，同时还可以向地方政府借贷。

陕帮典当行，组织比较严密，办事认真，注重信誉。加上当时物价平稳，典当的衣饰等物作价较低即使死当也较易出售，因此，当铺每年均能获利。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庆陕帮典当行又增添了“谦吉”、“谦祥”、“祥庆”三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即今永兴巷·巷名
即源于此。

新增的这三家,由于受店伙骗债的牵连,很快停业。重庆陕帮典当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仍只有五家。

1904年至1905年,一位姓陈的资州人,落职回川,联合想经营典当行业的本省商人,以“陕人领用川省藩库银两把持重庆典当行业,年获得厚利,致使川人生计困难,于情于理均有未合”为辞,上书藩署,请求按照陕帮典当事例开设当铺,获得批准,于是川帮商人纷纷募资开设当铺,这是四川人在重庆经营典当业的开始。从此,重庆典当行与陕帮典当行形成了川陕两帮对峙的局面。双方的业务竞争异常激烈。陕帮当行对当物的估价,历来只当原物价值的三分之一,川帮当行为了争取当户,把当价提高到原物价值的二分之一,陕帮当行业大受影响,客户日益渐少。再加上政府财政极度紧张,陕帮当行以前领借的藩库银两全部被收回,同时,平时所依赖的调济资金的票号正受到兴起的钱庄、银行的冲击,业务也不景气。在川陕两帮的激烈竞争中,陕帮当行资金明显短缺,典当业难以维持下去,陕帮当铺相继关闭。重庆的典当业,自陕帮当行相继关闭后,均由川帮当行取而代之,由此也进入了完全由商人自行集资经营的阶段即商办时期。川帮当铺的资本比以前陕帮当铺少,故经同业公议一律改为公质店。当时重庆的公质店共有十七家,多在市区内。另外在郊区和乡镇还有不少代质店和代押店。这些代质店或代押店资本较小,最多的不过千元,少的仅有数百元或一、二百元的。他们一般是与有关系的公质店挂勾,向质店领用一定的资金营业。所质押的衣物再转押于公质店,实际上等于公质店的分支机构,所不同的是自负盈亏。代质店或代押店,当时无需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立案,只要经过有关的公质店同意并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即可成立。重庆这类代质店或代押店最盛时,多达二十余家,经营活动扩大到市区以外。

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时期,重庆地区各路军队此进彼出,典当行业常遭抢劫。军阀割据时,又常成为驻军派款与勒索的对象。

由于时局动荡,人心浮动,当物者多,赎物者少,大部分资金都积压在当物上,当铺发生资金周转困难。接着,重庆又不断发生金融风潮,地方军阀发行的纸币一再贬值,一出一入之间,差异太大,公质店的亏损也很大。同时,有的公质店由于内部管理不严,营私舞弊、挪用公款的不轨行为时有发生,由此导致了三分之一的公质店停业关门。到1934年,重庆公质店还有十余家,1939年,重庆公质店又减少到八家。又由于抗日战争的恐怖,日机轰炸频繁,仅剩下的八家公质店,有的被炸毁,损失惨重,被迫倒闭;有的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经营不善、亏损严重而停业;再加各种寄卖行、委托行的兴起,代替了一部分典当业务。重庆的典当业逐渐衰落,有的当行也只能勉强维持,有的当行大放高利贷,杀鸡取卵,自损信义,不得人心,只好停业作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明令禁止经营典当行业,取消私人当铺。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全面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重庆的典当业又开始复兴起来,当铺数量较多,但规模不大,有名的户号屈指可数,典当性质有一些变化,经营方式与委托行有些相似。

合作五金制造厂入川始末

朱 俊

1942年元旦上午10时许,山城重庆仍笼罩在一片茫茫浓雾之中。位于上清寺牛角沱的“生生”花园里,冠盖云集,人声鼎沸,为期15天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正式开幕。这次展览会参观者达12万人次,在当时可算是盛况空前,参展厂矿都是抗战初期从上海迁来重庆的。共有二百多家工厂,产品有:煤矿、铁矿、轧钢、翻砂、机器、电器、仪器、铜器、锯木、车床、制版、营造、纺织、造船、造纸、印刷、铸字、食品、罐头、搪瓷、制药、肥皂、牙刷、磅秤、烟草、化工、卫生用具、消防器材……凡国计民生所需之物,无不具备。展览会使陪都人民看清了我国民族工业蕴藏的巨大潜力,重庆各报也纷纷以大量篇幅介绍展览会盛况,并发表评论,《新华日报》社论精辟地指出,这个出品展览会就是厂家和职员工人四年来奋斗的成果,就是他们用血汗滋培出来的好花。总之,这次展览是抗战大后方的创举,为抗战必将取得胜利透出了一线曙光。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林森、冯玉祥、居正、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各界人士都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观。参观中,人们对重庆合作五金制造厂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生产的医疗用品,日用五金及纺织机械等系列产品尤为称赞,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欣然应邀题词勉励,周恩来的题词是“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邓颖超的题词是,“合作奋斗,发扬生产”,董必武的题词是“在格外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

重庆合作五金制造厂创始人为我国著名的实业家胡厥文。他1895年生于江苏嘉定(今上海),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工业学校,

曾在上海等地创办了多家工厂,如新民机械厂,合作五金厂,黄渡电灯公司,长城机制砖瓦公司等。

抗战初期,合作五金厂从上海经武汉迁来重庆,安顿在位于小龙坎的几所破旧的民房里,虽然全厂人数不过百人,但其所拥有的机械设备完好率在所有内迁厂中却首屈一指,其中六十吨重型冲压机在全国亦属罕见,厂里还有一台电镀机,因当时重庆全市还没有电镀铬(克罗米)的设备,而该厂进川时带来的进口电镀机正好为各厂解决了在重庆就地电镀铜、铬的问题。

当全厂工人得知合作五金制造厂的产品在展览会上大受欢迎的消息,大伙儿都异常激动,不少老工人相对无言,喜极而泣。不禁回想起四年前从上海撤退的日日夜夜,那时上海全市炮火连天,上有日机呼啸而至,下有日军步步紧迫,职工们个个席不暇暖,为了及时将机器设备拆卸装箱运往内地,白天不便工作,他们便晚间工作通宵。敌机来临,就地隐蔽一下,敌机一走又继续搬运,机器拆完立马装箱运走,前面的同伴被炸死,大家含泪把尸体抬到一边,继续前进,“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染上热腾腾的血”。(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然而最困苦的时候还在运输途中,在战争年代,从宜昌到重庆这一段长约一千三百余里的三峡水路,令人谈虎色变,几艘载有工厂设备和人员的木壳船先后从宜昌出发,经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忠县、丰都、涪陵、长寿等数十个县,十分艰难,沿途险滩七十多处,在过湍激浪大的青滩和泄滩时,须由纤夫在岸上拉纤而行。全体员工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经过四十余天的苦难行程,方才抵达大后方——重庆。抵渝后,又在胡厥文、吴蕴初、庞赞臣等人为首的“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协助、调停下,工厂终于走出了人地生疏、势如散沙的局面,尽快恢复了生产,为神圣的抗日战争生产出各种急需的用品。

这次沿海工厂迁往内地,主观原因是因日军侵华造成的,但客观上为内地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重庆为例,民营工业只有一

座发电厂、一个造纸厂,另有玻璃厂一个、机器厂两个和一个筹建中的炼钢厂。当二百多家工厂迁入四川,就理所当然地填补了当地工业发展史上的许多空白,明显增强了后方支援战争的能力,成为重庆现代重工业发展之滥觞。许多工厂如:恒顺机器厂、顺昌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大鑫钢铁厂、中国炼油汽车制造厂、亚浦灯厂、华生机器厂、中华橡胶厂、天原化工厂、天厨味精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冠生园食品厂和豫丰、申新、裕华等诸家纱厂。无论从拥有的资金、声誉和生产规模来看在当时国内均名列前茅。这次较大规模的内迁结果,不仅重新规划了我国工业的整体布局,也在民营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为重庆合作五金制造厂的题词原件,原存于重庆市博物馆,1982年调往中央档案馆。重庆市博物馆现存复制件。

胡厥文先生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名誉主席等职。1989年在北京去世。

重庆合作五金制造厂现已更名为重庆轴承工业公司,为西南地区轴承专业制造厂。

川菜之都渝中区

谢向全

渝中区饮食业起源久远。清代重庆城区的商贸、金融、官衙大多集中在下半城长江沿码头附近，故饮食业也多数集中在这一带。其饭铺、酒馆、面店、糕饼小吃摊所经营的菜品主要为本地风味，并形成“川菜”风格的雏型。

重庆开埠以后，城区扩大，重心逐渐移向上半城，饮食经营网点渐渐增加，客栈旅店也包揽伙食，饭资算在宿资之内，大凡生丧嫁娶，迎送酬酢，也将厨师请到家中操办，并同时盛行“包席馆”。

当初“包席馆”不设座场门面，以一、二掌门厨师为首，联络率领红案、白案、墩子、炉子厨工和跑堂馆、水案杂工、打帕子、点水烟的等各色人员，挂牌招徕，遇有生意，视其大小，组成班子，届时自带工具及餐具上门服务。所用原铺材料，也可一并代办。时风崇尚礼教，讲究面子，每日各类大小宴请，非张即李，筵席不断。“包席馆”由此生意兴隆，不少烹调高手，皆出其中，并形成川菜的独具特色。

20年代以后，渝中区饮食业发展较大。随着工商贸易业的发展，全区人口增多，社会消费水平提高，从而崛起了一个个中型及大型的设堂餐馆。最早的餐馆是江家巷的“陶乐春”。餐馆坐场舒适、宽敞，陈设华丽考究，经营名贵山珍海味大菜，很适合军政商贾的宴请应酬。由此，“包席馆”很快消亡，一些名厨高手均转而受雇于大餐馆。少数有钱人则独立开店。当时川菜中较有名气的还有“适中楼”。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陪都”。渝中区饮食业发展达到了高潮，饮食行业呈现出多档次、多类型、多风味、各具经济特色的缤

纷景象。

据一九三九年统计,渝中区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餐馆有:燕市酒家(公园路 32 号)、新记永年春(第一模范市场)、湖北饭店(龙王庙 59 号)、久华园(复兴观 3 号)、小洞天(打铁街 25 号)、蜜香(武库街)、新记(下陕西街 128 号)、光利(小樑子 8 号)、乐露春(一牌坊)、上海社(县庙街 28 号)、卡尔登(上清寺)、一心饭店(二牌坊 29 号)、汇利大饭店(武库街 48 号)、九园(县庙街)、国际饭店(洪学街)、大都会(磁器街 31 号)、良友食品社(状元桥)、京都饭店(杂粮市 52 号)、冠生园(都邮街 25 号)、鸿运楼(中正路)、四美春(民族路)、白玫瑰(民族路)、天林春(五四路)、久华园(九尺坎)、新味腴(新生路)、广东酒家(民权路)、俄国餐厅(临江路)、粤香村(白龙池口)、永远长(木货街)、临江饭店(临江门丁口街)、三六九(中四路、中一路、民族路)、国泰(陕西路)、稀馐(保安路)、百龄餐厅(中正路)、味腴餐厅(民生路)、鸿宾楼(中二路)、觉性(长安寺 8 号)、味腴菜社(杂粮市 22 号)、王芳斋(县庙街)、暇娱楼(县庙街三忠祠)、大之元(县庙街)、国泰饭店(华光楼 1 号)、生生公司(牛角沱)、生生食堂(会仙桥)。到 1943 年,重庆市警察局统计:全区计有大小餐馆 1700 多家,川菜的格局形成相当规模。

据同年重庆餐食业同业公会记载:高档餐馆的资本金均在二十万元以上,这类餐馆既能摆大型宴席,亦设有单间雅间,一桌席花费数十银圆。中型餐馆资本金一般在二万以上,座场不十分豪华,但能经营各种烧烤海鲜之类大菜,一般宴请、便餐小酌均宜。食客多为普通市民,工人及下力汉的小饭铺,豆花馆又称“四六分饭铺”,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所在。一个烧白,二两白干,一碗豆花,一碗“帽儿头”(俗语:即盛的堆尖的大米饭),酒醉饭饱,花钱不多。如果手头松,还可炒盘素菜,烧个汤。至于设摊经营糕饼小吃、冷酒烧腊的小经营户,则多半属于本小利薄。但东西做得地道,人人过路均可购而食之。一些做得特别精致的小吃,还受到有身份人

的青睐。如老四川牛肉。还有连摊位也没有的饮食担子,穿街走巷,沿途叫买,深夜不绝。一头炉灶,一头碗筷佐料卖担担面、抄手、汤元、棒棒糕、炒米糖开水、荷包蛋之类。冷担子则无炉灶、卖凉粉、糍粑之类,花费不大。最小的生意是提提篮的游走于码头小巷,卖水八块、豆鱼、豆干之类,一个钱一块。

川菜的风格特点主要是:1.调味多变,善用麻辣,有鱼香、麻辣、怪味、家常、荔枝等二十多个常用味型,在不失川菜风格的前提下,还能因时、因地、因人变化,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赞誉;虽用麻辣,但能做到辣而不燥。2.味重清鲜,突出本味;川菜讲究吊汤,以高汤制菜,能除尽异味,突出食物本身之鲜味,例如清蒸江团。3.收浓滋味,油而不腻;川菜擅长干烧、干煸,烧菜做到自然收汁,滋味浓厚,入口不腻,例如干烧岩鲤、干煸鳝鱼。4.小煎小炒,鲜嫩味美:川菜在使用炒、熘、爆的烹法上,是用急火短炒,一锅成菜,并且成菜鲜嫩,营养丰富,例如宫爆鸡丁、鱼香肉丝等。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各界要人和商贾云集于此,各种地方风味的名店、名厨也随之涌来。例如苏州的“陆稿荐”、北平的“丘二馆”、“丘三馆”、“湖北的“四象村”等。但专营川菜的大型餐馆也相继开业,并且越来越多。由于饮食店的增加和厨师技艺的提高,涌现了一大批饮誉全城的特殊风味菜点,使川菜一族更加丰富多姿。例如“小洞天”的清蒸肥头、“大乐天”的梅花火锅、“久华源”的清蒸火腿、“老四川”的灯影牛肉、“一四一”的毛肚火锅、“陆稿荐”的麻雀熏鱼。这些菜品做工精细,用料考究,色、形、香、味俱佳,赢得广大消费者的赞赏和喜爱。

解放初期,饮食业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景象。1956年底,经过公私合营后,全区纯饮食店摊仍有2000多户。后来由于“左”的影响,饮食店急剧减少。特别是“文革”十年,饮食业更是一蹶不振,仅剩下为数不多的饮食店又大兴改名换姓,例如将“陆稿荐”改为“勤俭”,“九园”改为“红星”,“上清寺餐厅”改为“向阳餐厅”……同

时一批传统的菜品名称也被改取,如“宫保鸡丁”改为“火爆鸡丁”等。由于大批青年工人脱产参加了运动,大小餐馆食店主要由老工人及没有资格“造反”的群众撑持营业。这个时期,供应品种一律“大众化”。

1978年后,饮食业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从1979年开始,饮食店摊以平均每年增加2000多个(全市)的速度发展。1979年和1980年,饮食业分别在建设公寓和大田湾体育馆举办了大规模的“名师名小吃”展销和“烹饪技艺”大赛,许多年不见的风味小吃重新与群众而见,一些品种被安排定点经营,恢复供应。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专程赴渝拍摄大型纪录片《川菜》,并将此片向国外发行。著名的特技厨师李跃华、陈志刚、曾亚光、张国栋、陈清云、徐德章等在镜头前表演的高超绝妙的技艺,为重庆川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1984年9月,饮食业在重庆饭店再度举办“名特小吃”展销会,在审定的数十个名特小吃中,市中区有53个品种取得证书,并在今后向各店推广,进一步丰富了川菜品种。

回忆旧日的天主教重庆教 区主教府——真原堂

陈仲伦

现在的重庆市公安局所在地(渝中区临江门1号)就是解放前重庆教区(又称川东教区)的主教府,但当时的大门是在五四路(又名蹇家桥)92号,而非临江门1号。

在未建主教府前,法籍神父刘马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分期购买了蹇家桥部分房屋及其附近石板街、江家巷一带房屋,之后法籍神父石保禄最先在此处传教,取名“真原堂”。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法籍主教范若瑟将上述房屋进行统筹规划,建立了主教府,但在1863年第一次重庆教案时,主教府被毁,范若瑟随即重建复原,以“永爱殿”匾悬于门上。1886年第二次重庆教案时,房屋又受严重破坏,由法籍副主教白德里于1891年修复,以“真原堂”三字悬于门上。

真原堂曾显赫一时,罗马教廷公使刚恒毅于1930年和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红衣主教史培尔曼以及1938年南京教区主教于斌均住过真原堂。尤其是在国民党以重庆为陪都时,于斌与国民党要员和社会名流频繁往来,熙熙攘攘。

重庆教区除原重庆市辖区21个区(市)县外,还含下川东26个县市,教务活动十分繁忙,又因1946年罗马教廷成立中华教会圣统制,以川康八个教区成立川康教省,委任重庆教区为总主教区,于是省内、国内和国际天主教人士来重庆教区联系磋商教务的,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当时我作为南岸慈母山培德中修院的学生,每到城里购买日用品和文房四宝时,必到真原堂小憩,上述情

景,司空见惯。使我记忆犹新的是 1945 年 9 月的一天,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在真原堂举行了隆重的国际感恩大弥撒,由意大利籍蔡宁总主教主礼并讲道,于斌主教任翻译,重庆大修院及中修院修生辅祭,我当时参加唱弥撒的修生合唱队。参与弥撒的有驻陪都重庆的英、美、法等国大使,国民政府要员孙科和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出席。弥撒合唱队以大小提琴和法国大风琴伴奏,由三部分人组成:南岸白沙沱大修院院长沙路(法籍神职人员)奏风琴,曾家岩明诚中学修士数人(原该校教师)奏大小提琴,白沙沱大修院及南岸慈母山培德中修院修生合唱。弥撒礼仪结束后,当即由国民政府派员主持签名纪念。

真原堂原有房屋 9 栋 3 层 88 间,面积达一万平方米,1941 年被日机轰炸,损失严重,部分房屋未修复。

自 1852 年至 1951 年驻真原堂主教均为法籍,共四任,即范若瑟、顾巴德、舒福龙、尚惟善。

1948 年随着解放战争向南挺进,势不可挡,重庆教区主教尚惟善及全部法国神职人员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将不可能立足中国,因此将重庆教区的黄金、白银,存款悉数寄运香港,以至 1950 年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将上述法籍神职人员及修女分别集中看管时,真原堂所有中国神职人员及全体员工无米可炊,在此极端艰难的时刻,原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借与教会人民币二千元以济燃眉之急。当时重庆天主教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并提出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然而尚惟善却冷笑说:“独立自主”?意思是说重庆教区的中国神职人员腰无半文,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能办到吗?

解放前真原堂在城里四处买地,建了很多街房,人们认为真原堂房产在全城所占比重较大,所以称为“真半城”;又在郊区买了许多田土租给农民收租,例如在南岸鸡冠石和白沙沱买地 148 老担,现在尚有当年种过这些田土的老农健在。1951 年随着土地改革

运动的深入,在减租退押阶段,农民到真原堂坚决要教会赔偿损失,可是如前所述,中国的神职人员连吃饭都成问题,那有钱赔偿农民的损失,只好把真原堂的土地和房屋全部卖给了重庆市公安局,教会所有人员全部迁磁器街迴园办公,1952年又迁至民生路若瑟堂。尚惟善和所有法籍宗教教职人员也全部押送出境,真原堂就这样走到了它的尽头。

从川东联合县立甲种工业 学校到四川省立重庆高级 工业职业学校

吴光夏

在重庆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历史上,有一所曾具相当规模,在当时的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学校。这就是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在当时,一般习惯简称它为高工校。学校于1917年创办,最初定名为川东联合县立甲种工业学校,到1935年时,奉令改为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其间的18年中,学校为重庆培养了一批实用中等工业技术人才。历届毕业学生,除少数到大学深造或到教育机构服务外,大多数都到了当时的公私营工业机构去服务,如华西兴业公司、重庆市电力厂、公路局等,且毕业生在社会上常常是供不应求。工校创办距今,已整整八十年了,就以1935年改为省立的时间算起,距今也逾六十年。知道重庆曾有一所高工校的人虽不少,但知道高工校历史的恐怕不多。笔者在此简略地介绍一下高工校的历史,尤其是从创办到改为省立这一早期的办学历史,或许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重庆开始出现职业技术性质的学校,一般认为大约是在1905年。最初称这类学校为实业学堂,分高、中、初三级。进入民国时期后,自1912年起,按照蔡元培先生主持制定的《壬子学制》,这类学校已改称实业学校,分为甲种和乙种,也即以后的高级和初级。1922年以后,这些学校多数又陆续改称为职业学校,分为高级和初级。如果按所属关系分,又有国立、省立、县立和私立四类。

20世纪之初的川东重镇重庆,在教育方面不仅在四川,就是整个西南,都算是发达的,学校较多。但在这众多学校当中,职

业技术性质的学校很少,而培养工业类人才的专门学校更是没有。因而当时的巡按史陈廷杰,鉴于这种情况,便委派冉献璞筹建工业学校,任工业学校筹备员,时间是1916年。冉受命后,即着于经费拨划,校地勘定,校舍建筑,拟具简章,购置图书仪器,招考新生等事项。经过一年时间筹备,学校初具规模。1917年,冉献璞被委任为学校第一任校长,校名定为川东联合县立甲种工业学校。校长冉献璞,四川江津县人,由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冉除担任校长一职外,还兼任化学教员。

自1917年学校正式开办到1935年7月的18年中,学校4次更名。第一次是在1925年8月,因学校开办高中,学制发生变更,因而校名改为川东联合县立高级工科学学校。第二次更名是在1931年,学校奉令更名为川东共立高级工科学学校。1934年又奉令改为川东联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这是学校的第三次更名。第四次更名是在1935年7月,学校奉令改为省立,定名为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这个校名使用的时间最长,直到重庆解放后的1950年止。

校址

筹建学校时,冉献璞为学校勘定校址在大溪沟与曾家岩之间,即现在的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地,面积约17亩地。这块地方原先是巴县劝学所的学产,筹建工校时,双方议定,由工校出备押金40元,每年交地租140元。到1917年9月,工校因感觉这种缴租金的方式不方便,因而采取在建筑费项目下拨银1000两,呈准存放巴县劝学所,订一份行息,永远抵扣租金。这是学校最早租地的情况。到1928年9月,一方面因巴县教育局教育经费不够开支,另一方面,当时又正值地价高涨,因而向工校提出增加租金。双方商议后决定,除原来用于抵租生息的银两仍然照旧办理外,工校再每年增缴租银200元,以后地价即使再涨,也不再增加租金;在划定

的界限内,工校任何时候可根据需要在校内添造校舍,巴县教育局不得干涉制止;对已经租定的校址,如果工校在建筑房舍不够用时,可在附近学田续租纵横各 15 丈土地,租金按原来的租金比例增加。这是工校租地变更的开始。1934 年 8 月,巴县教育科变卖不合经济原则的地皮,将租给工校的地皮卖出。从此,土地纠纷经常发生。直到 1936 年工校改为省立后,才由省府决定,依照从前租约所定的界址,由工校备价收回。直到这时候,工校的校地问题才算完全得到解决。

校舍

学校建造平房校舍,由前向后共分三排,由冉献璞负责组织建造。第一排和第二排分别用作办公室、仪器室、药品室及各班学生教室。第一排和第二排于 1916 年 7 月动工,1917 年 11 月先后完成。第三排为教职员宿舍,于 1918 年落成。1922 年,学校修建了制革工场及肥皂工场,供学生生产实习用。1927 年 2 月,根据校董会决议,在校门外建造高中班学生寝室,以后因经费不够而停止。1933 年,学校建成机械工场,1934 年又修建造纸工场及土木工场,因经费不继,仅具粗型,直到学校改为省立后才完全修好。另外,在建立工校前有两幢房屋,开办工校后用作学生宿舍,但此房屋条件很差,且有坍塌的危险。1936 年 3 月,经呈准省府,另行筹款修建学生宿舍。

专业设置

在甲种工业学校时代,根据当时学制,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原定分别设置染织、应化、窑业、图案四科,后来因经费不够分配,仅设了染织、应化两科。以后,染织科又因学生人数太少且无实习设备,于 1920 年停办。1925 年,学校开办高中,并同时招收初中学生。实际上,这时的工校,既是一所工业类职业学校,又是一所普

通中学校,或者说成是在一所学校内设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1923年,学校设置有土木工程科和应用化学科两个专业。1929年增设采矿冶金科,1932年增设机械工程科。1934年又增设造纸专修科,属短期培训性质。到工校改为省立之前,已开设了5个专业。1935年,工校改为省立后,停办了采矿冶金科,专办应用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3科,每科分三班,每年招收一个班。

经 费

工校的办学经费,在学校筹建之初的1916年4月就确定下来,由川东道署将收存的重庆已经停办的8所学校的学款实际约54700两银,用作开办经费。1917年,又由重庆综核所划拨重属二厘契底作为常经费,这是二厘契底的开始。1918年,夔绥忠西石5县,又仿照重属办法征收二厘契底,一并作为工校的常经费。1925年7月,工校因为筹办高中,由校董会决议呈由省道两署备案,增加契底一厘作为工场设备费。这是川东各县承担三厘契底的底案。但当时的四川,战争连年,政令分歧,各县契底不能按期申解,积欠累累,无法追收。又因战争破坏,税收不旺,收入不多,加之工校所设专业班次逐渐扩充增多,于是工校的办学经费逐渐感到不够开支。1934年,又呈准二十一军军部增收契底一厘,这是四厘契底的开始。但因川战连年,各县解款,每每被挪作他用,因而使工校的办学受到很大影响,以致陷于毫无办法的境地。1935年8月,工校奉令改为省立,经常费改由省府拨发,同时指定原有的三厘契底作为工校的建筑设备费。到这时,工校的办学经费,才有了稳定的来源。

各科设备

1917年8月,工校开办时,招收预科学生第一班,原打算设置染织、应化、窑业、图案4科。到1920年,染织科因学生人数太少,

且因该科没有实习设备,学生请求转往其他学校就读,学校因而出资,将他们送往杭州、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和南通纺织学校继续学业。1921年4月,曾筹办电碱、漂白粉工厂,但因筹款困难,转而打算按照公司组织条例,由川东所属各县摊认股款,既作为一种营业,也作为学生实习的场所,并拟有计划书呈由东川道尹交四川善后会议认可,并在省署定案。但是,川东所属各县所认摊的股款,分文未交。这一议案也就无形之中被取消了。1922年设置肥皂、制革两工场。1926年,学校又购置电机一部,既供学校照明,也作学生实习之用。这期间,学校开办了高中,并分别设有土木工程及应用化学两科,因此,除增加普通物理仪器和化学仪器、药品之外,还为土木工程科的学生购买了水平仪、经纬仪等,供学生实习之用。1929年开办采矿冶金科时,增购矿石、地质标本颇多。直到采矿冶金科停办,所有的采矿冶金科设备,大部分赠与陶业讲习所。1932年开办机械工程科时,增设了机械工场,同时增加了应化科肥皂工场中的香粧皂设备。1934年新建了土木工场及应化科造纸工场。1935年又增设了应化科酿造工场,同时充实了土木及造纸两工场的设备。

维持会、校董会及理事会。

1913年,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召请各县视学开过维持会。因此,川东联合县立甲种工业学校开办后,由巴县视学建议,按川东师范学校成例组织维持会。因各县视学的意见没有能够统一,因而作罢。到1919年,因为要向省署报预算,奉令召集会议表决。于是,于7月23日召开了第一次维持会。这次会议不研究校务行政,专门研究预算问题。1920年夏季,又召开了第二次维持会,会议除研究讨论预决算问题,并商议决定停办染织科、增设图书馆、阅报室及应化科工场等重要议案。1921年8月,召开了第三次维持会。1922年夏天又召开了第四次维持会。在这次会上,由工校

提议组织校董会,各县正式选举校董1名,规定了任期及年限;有关组织大纲,由该次维持会起草并通过,报由省、道各署备案。大纲中,十分注意对校长一职人选产生的方法,规定由校董会严格票选,呈请官厅委任,避免校长一职随政潮转移。1923年7月,即依照上年维持会的决议,停止了维持会,改而召开了第一次校董会。这是工校成立校董会之始。1924年7月召开了第二次校董会。1925年7月召开第三次校董会。这时,正值工校筹办高中,因而决议增加契底一厘,作为经费。1926年7月召开第四次校董会。以后按惯例召开校董会,直到1935年7月奉令撤销校董会,由各县教育科长另行成立理事会。这是工校成立理事会之始。同年7月31日,工校奉令改为省立。

校长更替

1917年2月,省署正式委任冉献璞为学校第一任校长。于此可见,建校之初,学校虽为川东道署所办,为川东36县联合县立,但校长一职却是由省署委任的。冉任校长虽然仅仅只有一年时间,但是,对于工校来说,实有创始之功。1918年1月,省署委任卢融为校长。卢融是长寿人,毕业于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卢于当年10月请假到上海,为学校购买药品仪器,校务呈准由当时担任学校文牍工作并兼任管理员的向克刚代理。1919年4月,卢赴沪逾期未归,而向代校长又因事离校到绥定去了,因而呈请道署委任主任教习陈尔炽代理校长。直到1920年1月,省署因卢校长久假不归,改而委任陶文瑞为校长。陶文瑞是四川叙永人,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任校长职仅约一年。道署又改而委任唐鸣皋为校长。唐为江北人,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系。唐于1921年1月到职。那时,学校正值校务棘手,加之四川军阀战争正起。这一切都影响到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唐校长深感时事多艰,学校难办,因而于当年5月呈请辞去校长职,但未获批

准。8月,再度请求辞职,仍未获得批准。不得已,便定下心来,下定决心整顿校务。他为学校新建了制革工场和肥皂工场,改组校董会,增设阅报室。他是几任校长中任职最长的一位校长,在任期间,学校增添的设施也是最多的。1926年11月,唐校长因考查课程标准而离校外出,将校务委托给教员陶文瑞代理。以后,经教职员会议票选教员聂云龙代理校长。在聂的代理期满后,又经呈准道署召集临时校董会于1927年4月票选曾德钰为校长。曾是四川永川人,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电机科毕业生。曾在任5年,不但对学校的教学设施的添制方面毫无进展,反而将前任校长积存下来的学校校舍建筑费用1万余元挪用,且使学校负债万余元。曾本人于1932年在任职期间去世。他所经管的学校经费,一塌糊涂。学校的图书仪器也在学校无人主持期间多有损失。同年7月,由校董会改选殷世泽继任校长。殷为长寿人,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科。其任职期为1932年8月至1934年7月,前后恰好两年。这期间,因收入不旺,经费不够开支,而辞去校长职务。1934年7月,校董会选举顾升骥继任校长,在职仅一年,也因经费困难无法解决而辞职。顾是四川铜梁县人,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历任重庆各中学教员。同时,校董会及以后的理事会均呈省府将学校改为省立。省府另委任李克孝继任校长。李克孝是巴县人,由国立北京工业大学工学院应化科毕业,1935年8月起接任。

学校改为省立时,也是社会各界提倡推行职业教育呼声很高的时候。以往的教育,除少数学生能升入大学进一步深造外,一般的中学毕业生毕业后没有多少出路。提倡职业教育,就是企图避免一般普通中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缺点。当时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就是以为社会培养实用中等工业技术人才为目的。实用中等工业技术人才,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在四川,确实急需。这是当时社会各方面较为一致的认识。加之,日本正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国民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内地的四川,认为是复兴民族和复兴国

家的根据地。各种国防工业、基本工业,陆续兴办,一般的实用中等工业人才,大为需要。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改组成立的。仅管如此,重庆高工校在办学经费和专业设备方面,仍远不能与沿海省份的同类学校相比。

学校的几次搬迁

1937年,四川省教育厅转教育部令,将省立高级陶瓷工业职业学校并入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但以陶瓷学校为校址,重庆高工校的原校址供国民政府迁渝作办公用。于是,高工校迁至牛角沱原陶瓷学校校址(今重庆市广播电视局所在地)。1938年又迁到南温泉。1939年6月,学校已迁到泸县弥陀场。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市政府呈蒋介石,请求将国民政府还都后所留下的房产家俱拨重庆市政府接收,将重庆高工校迁重庆市杨公桥,以兵工大学作高工校的永久校址,以李子坝花纱布管制局旧址为临时校址。于是,高工校于1946年迁李子坝,又于1947年迁桂花园。由于时局变化,高工校最终未能迁到杨公桥去,重庆就解放了。1950年,学校为重庆市文教局接管,更名为重庆市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因当时重庆为直辖市,因而学校名称前去掉“四川省立”4个字。1952年7月,学校移交重庆市企业局管。1953年起,学校所设专业作了调整、合并,学校名称也作了更改,重庆市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校名也不复存在了。

冯玉祥的职业教育歌

欧阳昭华

1940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张家花园举行职教社成立二十三周年纪念活动。展览各项图表,历年出版的书籍杂志,500余件制品。宣传抗战,访问抗属,募集寒衣,向前方将士发致敬电。

上午开纪念会,到会祝贺的有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穆藕初先生及社友冯玉祥先生、张岳军先生、冷禦秋先生、邹韬奋先生、各机关代表共700余人。会上首先由主席江问渔报告开会意义,继由常务董事黄炎培报告职教社创立经过,总干事杨卫玉报告社务,穆藕初等相继致词。冯玉祥致词时朗诵了他撰写的职业教育歌、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极为热烈。

职业教育歌

职业教育,教人职业;

什么职业?要制钢铁!

机器炼钢,造炮造枪

这样我们才不是那「软不叮当」

民族自然就强壮!

职业教育,教人职业;

什么职业?织布制鞋!

前线士兵,衣物不缺;

这样才能赶走那日本小鬼子,

民族的生机才不会断绝。

职业教育，教人职业；

什么职业，栽秧割麦！

有了饭吃，一切好说，

吃得饱饱的打鬼子，

民族的战士，才越打越热！

职业教育，教人职业；

不为「混饭」，为民为国；

人人生产，安居乐业。

分不出什么是五谷，什么是皂白，

那种教育，真正要不得！

抗战时期重庆城区的 职业补习学校和训练班

欧阳昭华

1933年9月,教育部公布《职业补习学校规程》;1937年2月公布《各省市推行职业补习学校办法大纲》。1941年8月颁发《公私营工厂矿场农场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办法纲要》;要求各大学、专科学校、职业学校、乡村师范学校,均应利用原有设备、人才、尽力办理与学校设科相同性质的职业补习学校或补习班;要求职业团体均应与职业学校合作,利用设备举办与本业务有关的职业补习学校或补习班。规定职业补习学校除每日,每星期指定日间或夜间一部分时间授课外,得于任何季节、寒暑假、业余时间,或特定时间办理;公立职业补习学习不收学费,私立职业补习学校经主管教育机关核准,酌量收费;职业补习学校之设立、变更、停办,在省行政区域内,应呈主管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核准,转教育厅备案。

随着社会的进步,重庆教育界,实业界的有识之士,日益感到单一的中小学教育不能适应各业发展的需要,遂按教育部规定着手办理职业补习学校和职业训练班。特别是抗战军兴,各行各业急需各类中、初级技术人才,在职职工急需更新知识,提高技能。教育部令饬重庆市教育局在战时首都大规模推行补习教育,以加强抗建力量。自此,重庆市的职业补习学校和职业训练班如雨后春笋,成倍增长。市中区的补习学校和职业训练班数量及在学人数,名列榜首,1946年初统计,全市有补习学校98所,在学人数超过1万人,市中区占了55%。职业补习学校和训练班遍布市中区的大街小巷,提高了国民素质,向战时前方后方输送了有用之材,给失学失业青年带来了希望和力量。

附：

职业补习学校
市中区职业训练班简况表

职业补习学校名称	科目设置	开办年月	校 址	主办单位或创办人
重庆商业夜校	商业	1935 年	陕西街	重庆钱业公会
重庆会计人员训练所	会计	1936 年	下迴水沟	张必果
商业职业训练班	商业	1936 年	机房街	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商业职业学校
重庆市立商人速成学校	商业	1936 年	仓坝子	
重庆药剂生讲习所	药剂	1936 年	林森路 40 号附 1 号	重庆市新药商业同业公会
立信会计分校	会计、簿记	1937 年	姜家巷、筷子街	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土木职业训练班	土木	1937 年	大溪沟	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私立会计专修馆	会计	1937 年	蜈蚣岭半月院劝工局若瑟堂 14 号	何鲁、古铎
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	电化教育	1938 年	曾家岩求精中学	教育部
会计人员训练班	会计	1938 年	曾家岩求精中学	教育部
中华职业补习学校	高初级会计, 簿记、速记实用英文, 俄文, 文书, 写作	1939 年 10 月	张家花园	中华职业教育社
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	机工、机务、有线、无线报务、工务、汽车驾驶	1940 年	曾家岩	交通部
敬业会计专修班	会计	1940 年	临江门杨家花园	潘昌猷
私立成成职业补习学校	商业簿记、中文、英文、银行、邮政、海关、打字	1940 年	桂花街温家院	连雅各

职业补习学校名称	科目设置	开办年月	校 址	主办单位或创办人
立信高级会计补习学校	高级簿记、商业簿记、珠算、会计学、银行会计、成本会计、政府会计、审计学	1940 年	大樑子青年会 内民众小学	重庆基督教青年会 重庆立信会计补习学校 合办
外事人员训练班	外交事务	1941 年	第三模范市场	外交部
国际语言学校	外语	1942 年	枣子岚垭	国际反侵略会附设
国医讲习班	中医	1943 年 9 月	中山三路 196 号	神农医社
止善高级会计职业补习学校		1943 年	陪都新运模范区	止善会计师事务所
青年就业补习班	英语、速记、会计	1943 年 3 月 8 日		重庆市社会局附设
私立群益职业补习学校	华文速记、会计、簿记、机务报务	1943 年	朝天门信义街 23 号	
私立复兴补习学校	高初级会计、应用化学、缝纫、刺绣、速记	1941 年	两路口南区公园	
会计补习学校		1943 年 2 月 16 日	兴隆街 72 号	中国会计学社附设
中信会计专修学校	会计速成 会计专修	1943 年 4 月 7 日	中华路 168 号 江北邓家花园	费诚安
友诚会计专修补习学校	会计、簿记、珠算、审计、计政法规、银行会计、成本会计、公司会计	1943 年	过街楼马王庙 中心小学内	吴永襄
明信会计职业补习学校	高初级簿记、改良中式簿记、普通会计、所得税会计、审计、工商管理、政府会计	1942 年 2 月	纯阳洞街 明达慈善会	重庆明信会计事务所
财政会计补习学校		1944 年	春森路 1 号	中国财政学会附设

职业补习学校名称	科目设置	开办年月	校 址	主办单位或创办人
铅笔厂职业补习学校		1944 后	菜园坝正街 15 号	中国标准铅笔厂附设
国术训年班		1944 年	大樑子青年会	重庆青年会附设
文信会计补习学校		1944 后	冉家巷 17 号	
国药药剂生补习班	制药技术 医药常识 防毒救护 珠算、簿记	1944 年	保安路 155 号	重庆市国 药商业同业公会
陪都速成国术馆		1944 年	长安寺	长安寺佛学社
求精商业补习学校		1944 年	曾家岩	求精商业专科学校
中医训练所	中医实用技术	1944 年 9 月	大阳沟中心校	重庆市中医公会
私立中华国画函授学校	花卉翎毛科 山水人物科	1944 年	民生路 64 号	郑明虹
重庆大溪沟工人职业补习学校		1944 年	大溪沟中心学校	大溪沟各工厂联合创办
圣心女子高级补习学校	文科、理科 医科	1944 年	通远门领事巷	圣心堂修道院附设
佛化尼众补习学校		1944 年		重庆市十方能仁寺附设
私立工商高级职业补习学校	工商管理	1944 年		重庆商会附设
重庆市立陪都补习学校	高、初级会计、中文速记英文	1944 年	中央公园	重庆市教育局
重庆市立实验补习学校	档案管理	1944 年 10 月 27 日	大阳沟中心小学	重庆市教育局
曼龄英语补习学校	英语	1944 年	上清寺	
俄文补习学校	俄文	1944 年	九道门 7 号	中华文化协会附设
私立民治补习学校	簿记、会计	1944 年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劳工职业补习学校		1944 年	桂花园联保小学	中国劳动协会附设

职业补习学校名称	科目设置	开办年月	校 址	主办单位或创办人
私立精才补习学校	高级会计簿记、会计学、国文、英文	1945 年	民生路韦家院坝 16 号 中山一路 213 号	
私立业余补习学校	商业、初级会计、初级会计簿记	1945 年	陕西路赣江街 赣江中学内	叶宗高
镶牙业务人员训练班	镶牙	1945 年	夫子池	重庆镶牙同业公会
诚信补习学校		1945 年	夫子池	
启明高级补习学校		1945 年	保安路 214 号	
聋哑补习学校		1945 年	陪都新运模范区新范小学	中国聋哑协会附设
崇实档案函授学校		1945 年	上清寺桂花园 4 号	
三余补习学校	会计、英文	1945 年	筷子街文德小学	
女青年会补习学校		1945 年	金汤街 17 号	重庆女青年会
私立文华补习学校		1945	夫子池	
暑期补习学校		1945 年	张家花园	中华职业教育社

抗战时期作家的贫困与 援助贫病作家运动

唐维华

抗战时期,许多作家无不过着贫困的生活。著名作家张恨水1938年1月从汉口到重庆,不久即任《新民报》主笔兼副刊主编。他在重庆生活了八年,写下了《八十一梦》、《水浒新传》《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等中、长篇及各种散文共800万字,但却生活贫苦。他住在南温泉建文峰麓桃子沟边一简陋的“夹壁”茅屋中,外面下雨,屋里也滴滴嗒嗒地下小雨,每当将下雨时,他便忙得不亦乐乎地在屋中摆了大小瓦盆接雨水,便自嘲地将所居之屋取名“待漏斋”。他已年逾50,还得生火自炊,常常扛着几十斤米从城里步行40多华里回南温泉。当时稿酬微薄,手头拮据,南温泉虽有一小电厂,但“待漏斋”的主人却无资格安电灯,只有秉烛笔耕。他曾填词写了自己生活的窘困:“入蜀三年未作衣。近来天暖也愁眉。破衫已不象东西。袜子跟通嘲鸭蛋。布鞋絮断象鸡皮。派成名士我何疑”。

抗战后期的陪都重庆,经济衰败,物价飞涨,1944年6月重庆零售物价指数较1937年上涨450倍,许多作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动笔不能,有文难发,生活困窘,贫病交加。老舍当时在《新蜀报》上以《文与贫》为题,撰文揭露说:“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报纸上的文艺副刊似有若无,有时候文章写好而无从发表,作家们就只好对着文章发愣。这么一来,有的人便没法不去另找职业,而在公余之暇写点文章。人既不是铁打的,白天办公或教书,夜间写文章,怎能吃得消。于是因劳成疾,人文两败。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文人们乃陷于苦海中”。

著名剧作家洪深在贫病中，曾于1941年2月5日举家三口服毒自杀，经抢救脱险后贫困如旧，而在此时他又患胃出血病。早年中国文坛上著名的女作家白薇，由于战时生活的不安定和穷困，身体健康状况一直欠佳，八年抗战中，穷病几乎没有离开过她，此时，白薇又卧病于重庆乡下。

作家王鲁彦一生清贫，从未脱离经济的困境。1942年在桂林主持《文艺杂志》时，即患痔行动不便。他住在桂林郊外小楼里，屋里堆放的是破烂杂物和桌上的一堆堆稿件，几个孩子葡萄在地望着他那枯瘦的身影。以后他喉头患了结核，说话非常困难，遂回湘养病，因生活困难，病势加重。1944年2月初，桂林文化界的柳亚子，端木蕻良、田汉、熊佛西等特发出启事，代筹医药费。

作家张天翼1943年初，在湖南宁乡陷于贫病交加的困境。“北平民国学院”同学发起募捐“张天翼氏医药费”，重庆立即响应，学生、教师、公务员在自己拮据生活中捐助微薄之资，就连黄包车夫也省吃一个馒头积极相助，由《新华日报》代理转寄，因此，每天报上公布捐赠者名单，却遭到政府当局的横加干涉，不许刊登。5月7日，《新华日报》刊出启事“读者援助张天翼款奉命不得发表”。足见政府当局是不管作家的死活的。

对贫病作家寄予同情和慷慨援助的仍然是文化工作者。永安联合周报为援助贫病作家，于1944年3月20日至21日两天，举办的时事照片展览，各界人士也积极捐赠，该社写慰问信4件，将所募集的2万元，分别寄赠贫病作家王鲁彦、张天翼、蔡楚生和已故木刻家万湜思的遗孤。

1944年4月16日，在有邵力子、老舍、茅盾、胡风、曹禺、阳翰笙、张恨水、赵清阁等150人参加的纪念文协成立六周年的大会上，决定将《大公报》所捐赠的1万元，分送给贫病作家王鲁彦，张天翼各3千元，卢鸿基、白薇各2千元。

以上的援助解决了几个贫病作家的暂时急需，但仍有很多作

家忍饥挨饿,重病待医;湘桂战局紧张,还有大批湘桂作家急需路费疏散到重庆。文协总会“看到了若干作家病不能医,贫无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惨事实”,于1944年7月,决定在重庆发动“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向社会发出呼吁。7月15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筹募基金缘由:

敬启者:抗战七年,文艺界同人坚守岗位,为抗建之宣传,勛军民从忠勇,曾未少懈。近三年来,生活倍加艰苦,稿酬日益低微,于是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或呻吟于病榻,或惨死于异乡,卧病则全家断炊,死亡则妻小同弃,政府当局虽屡屡垂念,时赐援助,而一时之计,未克转死为生,且粥少僧多,亦难广厦尽庇。苟仍任其自生自灭,则文艺种子渐绝,而民族精神之损失或且大于个人之毁灭,特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由本会组织委员会妥为保管,专作会员福利设施之用。一元不薄,百万非奢,爱好文艺者必乐为输将!捐款祈交重庆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本会,或重庆各报换取收据,自即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截止。

文协总会组织了由老舍、孙伏园、华林三人为委员的“基金保管委员会”;在10月20日召开的协会理事会议上又决定增加茅盾、胡风、蓬子、梅林、以群、王平陵六人为委员。

文协总会的呼吁,首先得到《新华日报》的响应,于7月15日就向贫病作家捐款1万元,后开明书店亦捐款1万元。沈钧儒先生捐款1万元,指定救济从桂林疏散出来的作家之用;黄炎培亦将“卖文酬金”795元慰劳贫病作家。以群、臧克家、梅林等把自己一次所得稿酬捐给贫病同行。募集运动日渐扩大,各方面、各乡村、各小城市也不断传来响应的呼声和同情的义举,特别是许多敬爱作家的青年,以“心里充满了最大的同情”,从自己困难的生活中,勉力筹出三百、二百数目捐款,还附上热情的慰问信送给“文化工程师,光明的使者与艰辛的耕耘者”。如陪都青年1401人,共捐款14060元慰问西南的文化工作者;绵阳的青年罗成基和他的伙伴

们,从自己拮据的生活费中筹集了 1100 元捐赠给他们所爱戴的“坚贞不拔,战斗不息”的作家,信中还痛苦地感到:“这种向人求援的耻辱不是作家朋友们,而是国家的无确切办法与社会漠然视之的心理”。

运动初期,仍然是“无力者出力,无钱者出钱”,收效不大。对抗战进步文艺事业一贯给予支持和关怀的宋庆龄同志知道这些情况后,她不顾政府当局的种种干扰,于 9 月 29 日,30 在胜利大厦(今重庆宾馆)主办援助贫病作家的晚会,文协总会也赠送郭沫若、茅盾、老舍、孙伏园、曹禺、巴金、雪峰等人的著作,作为晚会的奖品。两天晚会所得捐款 80 万元,由郭沫若、茅盾、老舍三人代表文协总会接受并致函感谢。

宋庆龄同志的有力支持,使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声势越来越大,引起了整个国统区人民的关注。原定 10 月底结束的募集基金运动,一直延续到年底,12 月 31 日文协总会发表公启,正式宣布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结束,但消息隔绝的远地或者间有自动延长以及个别的热心人士仍有自动寄赠。11 月 8 日,贵阳文化界联谊会举行招待从湘桂到达贵阳的文化工作者邵荃麟、熊佛西、金仲华等 20 多人的茶会上,当场就捐献慰劳金 6 万元。在北碚的复旦大学 11 月下旬专门成立了援助贫病作家委员会,并聘请了靳以、方令孺等为顾问。画家沈叔羊将他在画展中卖画的收入。捐出 1 万元帮助贫病作家,1 万元捐给育才学校。

为响应文协总会的号召,成都各报于“九一”记者节举行联合义卖捐款;文协成都分会全体会员,积极进行集体卖稿运动及分头向各方面募捐,共募集基金 100 万元汇交文协总会。文协昆明分会 10 月 17 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具体决定了募集基金的 11 项办法。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用代刻图章 10 个,每个 1 千元所得援助贫病作家;吴晗教授“谨以最近稿费所得 1 千元,献给正在艰苦挣扎中的贫病作家”,并建议云南日报能广大深入的发展援助贫病作

家运动,首先发动昆明文化工作者献助“一天”所得,蚂蚁运粮,各尽各的心,同时用舆论的力量来请有钱的人拿出一点来。西南联大中文系、国文学会、新诗社共募集90万元(滇省主席龙云捐款20万元由该校转寄),总计昆明分会先后汇交文协总会捐款110万元。

文协总会将所募得的第一批捐款,由会员集议决定,于7月31日首先寄给张天翼、艾芜各1万元,王鲁彦1.5万元。张天翼在病中从宁乡逃出,衣物全部丢光,一路十分困苦。艾芜一家五口,家累重,且无工作,桂林一疏散,连版税也拿不到;他计划到重庆,用卖了两头猪的钱作路费才到达柳州,穷困万状。王鲁彦重病,因湘北战局紧张,他又从茶陵逃出到桂林,沿途劳累,所患喉肠结核日益恶化,8月17日病势危急,18日已不能言语,身体瘦得皮包骨头,宛如骷髅,惨不忍睹,于21日病逝,年仅40岁。他死后在文协总会援助汇款未到之时,连换身襯衫、袜子都没钱买,棺材更买不起。他生前好友们临时向各方募捐得2万元,才草草埋葬。

9月中旬,文协总会给已疏散到柳州的文艺作家汇去5万元暂作旅费,并筹集第二批汇款。洪深患胃出血病,文协总会在“援助基金”中发送1万元;田汉的老太太停留在独山,文协总会也托人汇去1万元。

10月20日,文协总会常务理事会商讨了援助贫病作家的原则办法及开展文艺工作等问题。决议援助作家分紧急援助和通常援助两种,紧急援助指桂柳后移文艺作家,通常援助指在疾病中的作家。同时商讨了努力推动文艺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使文艺作家们能更有力地为民族、为人民服务,能更快地受到应有的待遇等问题,如拟盖建作家宿舍,提高稿酬、举办文艺奖金、翻译文艺作品介绍到国外和文学顾问会等,开展文艺事业。

根据援助原则,得到通常援助的作家有:王鲁彦5.5万元,罗××2.3万元,艾芜2万元,田汉1.8万元,荃麟和××各1.5万

元,余××1.2万元;黄药眠、杨晦、郑延毅、吴似鸿、孟昌、张煌等各1万元。

得到紧急援助的文艺作家有:曹伯韩、张治安、尹瘦石、张白山、陈迺冬、端木蕻良、许幸之、芦荻、伍禾、新波、宋云彬、熊佛西、李九仙、徐德华各5千元,华嘉、安娥、黄宁婴、洪道、瞿白音、胡危舟、司马文森、甦夫、于逢、易巩、周钢鸣、陈残云、孟超、何家槐等各3千元。他们从桂柳已抵达到六寨、独山、贵阳一带,该三地区尚有文协总会已汇去的三十万元作旅费,委托何家槐、宋云彬、熊佛西、谢六逸妥为分配。他们到重庆后,每人尚有5千元的补助。画家沈振黄在独山从车顶跌下殒命,文协总会捐赠3万元作为家属救济费用。

在文协总会的紧急援助下,桂柳作家于12月中旬至年底,先后分三批到达重庆的有200余人。他们到达陪都重庆后,受到文协总会、有关文化机关团体的热情欢迎,由文协总会安排在陕西路77号文化界招待所暂住。

这次历时半年之久的“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共募集基金700多万元。“这笔数目不大但却凝集着广大同情的赠金”,到年底为止,已发出紧急援助、通常援助及逝世者遗属援助款达总数款的三分之一。所余之款,将作为“援助境况确系窘迫的贫病作家的基金,也作为对于本会职权可及,能力可到的若干文艺事业的推动之资”。这次运动“各界各地先后响应,热烈的情况远超过预期”,这种伟大的同情,足见“人民对民族的灵魂的工程师”的爱护,正如老舍在文协会务报告中所说:“这证明作家的血汗没有白流,没有洒到沙漠里,社会上各阶层的人民在关心着我们”。

重庆文博事业六十年

胡昌健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是1905年由实业家、前清状元张謇创建的。25年后，1930年3月，四川合川籍实业家、身为嘉陵江峡防局长和川江航务管理处长的卢作孚，在他的“北碚实验区”下令拆除北碚火焰山“东岳庙”中的神像，在此建起一座小型的博物馆（在今北碚公园内），陈列有少量的自然标本和历史文物。这座诞生在旧神庙中的博物馆，就成了重庆地区公共博物馆事业的开端。同年9月，卢作孚创建的“中国西部科学院”诞生，卢作孚为院长，院址在北碚文星湾“惠宇”楼（杨森捐建。杨森，字子惠，故名。）前述博物馆成为科学院的组成部分，当时，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动植物标本和西南少数民族文物。科学院成立之始，即出版有《博物专刊》，1932年又出版有《博物馆概况》。截止1936年，西部科学院下属事业部门有7个——理化研究所、农林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博物馆、图书馆和一所中学“兼善中学”。1936年4月，科学院将博物馆和图书馆移交给“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接办，博物馆改名“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改名“民众图书馆”。民众教育馆仍在北碚火焰山。

1935年春，有47位政界、商界、学界名人有过一次集会，旨在创建一座“嘉陵三峡博物馆”，参加人有方旭、陈国栋、刘豫波、向楚、龚熙春等，集会时人人有在签到簿上签了名（今重庆市博物馆藏有当年的《发起嘉陵三峡博物馆题名》一纸，笔者曾在《重庆文史资料》第四十一辑内作过介绍，但误作1931年）。但这次集会后就没了下文。目前也未发现有关此次集会的其他史料。会不会与1936年科学院将博物馆移交给“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

一事有关呢？

1937年底，杨家骆主持的中国学典馆由宁迁渝，驻重庆北碚旋移北泉公园。1938年，时任北泉公园主任的邓少琴与杨家骆共同创建北泉历史博物馆，“为汇聚西南文物之所”（《大足石刻图征》杨家骆序）。同年，蜀中著名经学家刘咸荣（字豫波，双流人）为该馆绘兰花图一幅，题识为“北泉历史博物馆补壁，八十一叟刘咸荣（今此图藏重庆市博物馆）”。

“1937年，抗日战起，国内公私学术研究机关多迁来北碚，以继续开展工作，因使北碚成为国内学术中心。1943年夏，中国科学社等六学术团体开联合年会于北碚，除宣读论文、作科学讲演之外，并举办科学展览，集合在北碚各学术机关之研究成绩，分门别类，布置周详，以供众览。展览三日，观众拥塞，极一时之盛，于科学教育之推广收效甚宏。会毕，各机关集会在北碚，设立联合陈列处所，数经商讨，于10月14日由中国西部科学院邀请各机关主持人会商，乃决定由各机关代表组织筹备委员会主持其事。12月14日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正式定名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地点即利用中国西部科学院大楼（今北碚“自然博物馆”陈列大楼。即“惠宇”楼。）（材料引自《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概况》）筹委会主任为翁文灏（翁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卢作孚。当时正值抗战，经费极其困难，主要靠捐款，但捐款也应不了急，只有靠借债，工作人员仅十余人，创业维艰。经一年筹备，1944年圣诞节举行了“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开馆典礼，来宾500余人，为抗战期间国内学术界之一大盛会。博物馆的名称，在筹委会组成之前曾拟定为“北碚科学陈列馆”。1944年7月曾更名为“北碚科学博物馆”。这个科学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自然标本，也有少量历史文物。

1938年，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部迁渝，驻海棠溪百子桥（现为民居，尚存），称为临时院部，工作人员主要是行政人员，马衡院长主

持工作。故宫数十万件珍贵文物自1933年起南迁,继而又西迁后,终于在贵州的安顺、四川的乐山、峨眉山三处找到了安身之处,在重庆的马衡经常往返于这三个办事处,国宝的安全是马衡心中的第一位大事。

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1937年西迁至云南昆明,所藏部分精品运至重庆,后又转运至乐山。1940年4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存于长沙的珍贵出土文物(主要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文物和长沙出土汉代漆器)运至重庆。是年冬天,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前者驻月亮田,后者驻板栗坳。

1939年,马衡、朱希祖、常任侠等考察江北盘溪汉阙。

1940年4月,郭沫若、常任侠、卫聚贤等人在重庆江北试掘、清理了几座汉墓,得到“延光四年”纪年汉砖及陶器、铁器、五铢钱等,并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文章。这次非正式发掘汉墓工作,是考古学者在重庆发掘古代墓葬的开端。同年,杨家骆在合川南津街一带亦发现汉砖数千块。

1939年,渠县人杨枝高撰就《四川崖墓略考》一文;1940年,卫聚贤撰就《汉代的重庆》一文。两篇文章都使用了大量的古墓葬材料,是重庆地区早期的考古学论著。(杨、卫二文皆为毛笔书就,原稿今存重庆市博物馆)。

1942年7月,曾昭桢(女,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研究员)、李济(考古学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所著《博物馆》一书在重庆由正中书局出版。

1942年12月25日,“全国第三届美术展览”在重庆两路口中央图书馆开幕。故宫博物院临时院部为美展提供文物展品,其中宋代《清明上河图》卷最为引人注目。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为美展提供了殷墟出土甲骨及长沙汉墓漆器等珍贵文物。提供古代文物展品的单位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说文

月刊社等。展品共 274 件,观众达 14 万以上。

1943 年 1 月 16 日,“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在前述展址举办了“敦煌艺术展览”,展出魏、唐文物和临摹壁画 200 余件。

1943 年 10 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溪李庄举办史前石器及商周青铜器展览;11 月,将展品移往重庆再次展出。

1943 年 12 月 25 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开幕,地点仍在中央图书馆。这批书画是 1935 年在英国展出后运回的展品,是故宫藏品中的宝中之宝。先运回至上海,转运南京,又转运至长沙、贵阳,最后在贵州安顺藏身 4 年。1943 年下半年,为参加雾季展览,由马衡先生提出申请,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由庄严先生押运,从安顺运至重庆。展前及展毕,这批文物皆藏于巴县石油沟飞仙岩。

1944 年 4 月,李济先生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讲《博物馆与科学教育》专题讲座。

1944 年冬,杨家骆商于大足临时参议会议长陈习删,“久拟一探大足石刻之实况”(同前杨家骆序)。陈习删遂与大足县长郭鸿厚(卓吾)邀杨家骆组织“大足石刻考察团”。1945 年 4 月,考察团到达大足,团员有杨家骆、马衡、何遂、顾颉刚、张静秋、朱锦江、冯四知、庄尚严(即庄严)、傅振伦、梅健鹰、雷震、何康、苏鸿恩、程春蔚、吴显齐。返渝后,杨家骆、朱锦江在渝作考察报告大足石刻遂引起世人注目。“大足石刻沉没千载,此次考察团的成就,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吴显齐《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10 月,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原称“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委员及工作人员有朱家骅、马衡、李济、曾昭桢、梁思成、张政烺、唐兰、傅振伦、王世襄、储安平、徐鸿宝、顾廷龙、张继、沈兼士等(有些人不在重庆,为外地代表身份)。委员会的任务“为调查收复重要文化建筑、美术、古迹、古物被劫及被毁实况,并设法保护之”。

胜利后,故宫临时院部迁往重庆南岸向家坡原贸易委员会的房舍内。1946年1月,存于巴县的文物运至向家坡;5月至年底,全部西迁文物陆续船运至南京,后又运往台湾。随着西迁文物的东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临时院部分别返回南京、北平。

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工作过的文物、考古学家有郭沫若、裘善元、马衡、庄严、卫聚贤、曾昭燏、邓少琴、常任侠、林名均、朱家晋、朱家济、王世襄、傅振伦、张德恒等。

1946年10月1日,“北碚科学博物馆”更名为“中国西部博物馆”,此馆名一直延用到新中国诞生。到解放前夕,中国西部博物馆的“自然科学”部分的陈列馆有工矿、地理、地质、生物、医药、卫生、农林六个馆;“社会历史”部分只有“人文馆”一个馆,陈列有陶器、瓷器、铜器、钱币、珐琅器、民族服饰及著名的“铜洗”。(前述“民众教育馆”、“北泉历史博物馆”所藏文物后皆归入西部博物馆)。

“中国西部科学院”和“中国西部博物馆”是两个单位,“二者成立有先后,乃各自独立之机构。惟因发展上之历史关系,事业主持人同工作人员及房屋设备亦大多共同,为节省开支及便利工作,故分工合作关系密切,形同一家,外间每误认科学院与博物馆两者为一或以为有隶属关系,实则二者乃兄弟事业,一重学术研究,一司科学普及。”(同前,《概况》)

1949年底,重庆解放。1950年下半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设在重庆凯旋路,部长楚图南,副部长任白戈、李长路)拟在重庆创建“西南人民博物院”(简称“西南博物院”)。同年,王缙绪、卫聚贤、申砚丞、曾禹钦等人向文教部捐献了大量珍贵文物。由于凯旋路的文化部办公室无处存放文物,于是这些文物暂存在两路口图书馆。

1951年3月7日,“西南博物院筹备处”成立,楚图南主持成立

会议,33名筹委会委员出席,有李长路、朱丹南、徐中舒、冯汉骥、颜实甫、施白南、孙培良、马耕渔、邓少琴等。会议在文教部举行,会后全体委员合影留念(原照今存四川省档案馆)。博物院院址最初拟选在长安寺,后考虑到不合适,复选定在中华路商检局内(29中附近)。10月,文教部任命徐中舒为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周素园(周末到职),为副院长,邓少琴为秘书。建院伊始,即举办“西南区文物展览”。同年,北碚的“中国西部博物馆”更名为“西南人民科学馆”。这样,重庆就有了社会历史类的“西南人民博物院”和自然科学类的“西南人民科学馆”。

由于中华路院址房舍有限,1952年7月在桂花园160号(即状元府,当时在此开办工农干部扫盲班,现为重庆教育研究所)建新院址,并修建文物库房。同年,郭沫若为西南博物院题院名。

1953年10月,西南博物院自然博物馆筹备处与“西南人民科学馆”合并,建立西南博物馆自然馆(仍在北碚原址)。原科学馆所藏的历史类文物及中华路所存放文物,陆续搬往桂花园新库房。

1950年下半年,重庆市委在枇杷山“王园”开始新建办公大楼。1954年底,西南大区撤销,市委机关由枇杷山迁至上清寺,“当时的市委在曹获秋主持下,经过研究,仍然按照小平同志原来的意见,把‘王园’分别交给了重庆市博物馆(西南博物院)和枇杷山公园管理处”。(张文澄《中共重庆市委在枇杷山的时候》,载《重庆文史资料》三十二辑)1955年2月,西南博物院改由重庆市文化局领导(此前,曾一度改名为“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分馆”,由省文化厅领导)。6月12日,西南博物院改组为重庆市博物馆,北碚的自然馆改称为“重庆市博物馆北碚自然陈列馆”。这一年,桂花园的文物,再一次搬家,住进枇杷山,直至今天。

1955年,由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筹建并由重庆市博物馆管理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革命纪念馆”(即“红岩村”)筹建工作开始,包括曾家岩的“周公馆”和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在内。

1958年5月1日正式开放,此前陆续非正式接待过数批参观者。1959年,馆名改为“红岩革命纪念馆”。1961年,被国务院宣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9年筹建、1962年10月建成的“邱少云烈士纪念馆”在铜梁县开馆,烈士纪念碑被列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61年“大足石刻”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3年10月,由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筹建,并由重庆市博物馆管理的“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旧址建成,11月27日正式开放。歌乐山烈士墓和“中美合作所”旧址,1956年6月18日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64年,红岩革命纪念馆和“美蒋罪行展览馆”从重庆市博物馆分离出来,行政独立。

1965年9月24日,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和“美蒋罪行展览馆”。周总理指示红岩馆的陈列内容要多宣传毛主席,展览馆要恢复原貌,以利群众参观。

此后便是十年浩劫,此间没有新的博物馆、纪念馆诞生。“文革”结束后,百废俱兴,拨乱反正,重庆的文博事业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谈判时住过的地方也是“双十协定”的签定处——桂园(即张治中公馆),复原陈列,于1977年对外开放,它属于红岩革命纪念馆的组成部分。

1980年,重庆市文物商店成立,1981年上半年正式营业。1981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在重庆市博物馆另挂“四川省重庆自然博物馆”馆牌,并规定其与重庆市博物馆的关系是“一个班子、一个机构、一笔经费、两块牌子”。

1984年2月,合川“钓鱼城管理处筹备领导小组”成立,1985年6月21日“钓鱼城管理处”正式成立。1987年11月23日“钓鱼

城博物馆筹备处”成立,直至现在。该处管理钓鱼城遗址,并辟有简易陈列室,陈列钓鱼城出土文物。

1984年8月25日,“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诞生。此前,大足石刻由大足县文管所管理。文管所成立于1952年,名为“大足石刻保管所”,1953年更名为“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博物馆成立后,与文管所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1991年10月14日,“四川省社科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成立,受省社科院、大足县政府双重领导,与博物馆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1984年,“美蒋罪行展览馆”更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同时挂牌“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1985年,“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成立,该馆的前身是该校“历史系文物陈列室”,创办于五十年代,收藏有陶瓷器、铜器、书画等珍贵文物。

1987年9月,江北区“明玉珍墓——睿陵”及陈列室对外开放。明玉珍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曾在重庆建立“大夏”农民政权。该墓是目前所发现的古代农民政权领袖的唯一墓葬,1982年发掘。

1989年10月1日,江津“聂荣臻元帅故居陈列馆”开馆,江泽民同志题写馆名。

1990年4月,重庆市博物馆受市文化局委托,着手抗战博物馆的可行性论证,并研究筹建方案。同年,楚图南副委员长为重庆市博物馆题写馆名。

1991年3月,潼南“杨闇公旧居”陈列馆开馆。

1991年5月,经上级批准,四川省重庆自然博物馆从重庆市博物馆划分出去,独立建馆,暂借重庆市博物馆办公楼(在枇杷山公园内)和一间陈列厅进行工作,北碚的陈列馆属自然博物馆管理。目前,选新址、筹建新自然博物馆大楼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1992年9月,渝北区(当时为江北县)“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

对外开放,该馆的雕花古床、神龛及婚俗器物陈列在重庆地区独具特色。该馆与文管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1993年4月29日,两路口的“重庆宋庆龄旧居”陈列馆开馆。5月15日,南岸黄山“陪都遗址陈列馆”开馆,目前该馆有“重庆大轰炸”的图片资料展览。“宋居”与黄山陈列馆皆由重庆市博物馆管理。

1995年9月,“韩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开馆。位于市中区莲花池正街38号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是抗日战争期间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流亡26年后的最后一处公开办公地点,也是目前在中国境内保存最好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该旧址是1989年文博工作者在研究这一课题时,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发现的,现已列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有复原陈列,展牌是由韩国方面制作的。

1995年11月30日,“铜梁县博物馆”开馆。该馆陈列有“铜梁文化”打制石器、历代陶瓷器及明代石刻仪仗俑等珍贵文物。博物馆与铜梁县文管所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以上介绍的是博物馆、纪念馆等的发展情况。至于文物管理保护所,到目前为止,除了双桥区、大渡口区外,各区、县(市)都建有文管所,其中建立最早的是潼南县文管所,建于1950年,当时叫“文物管理委员会”。其次是大足石刻保管所,建于1952年(1945年曾建立大足石刻“文物保存委员会”)。其余的文管所,全部是八十年代中建立起来的。这些文管所内或多或少都收藏有文物,其中永川市、合川市、綦江县的文管所还辟有文物陈列室,供观众欣赏文物。各文管所还担负着本地区的文物普查和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等工作。

为了加强对馆藏文物的保护、对文物市场的管理、打击文物犯罪活动和对出境文物鉴定,1989年1月5日,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市文化局组建了“重庆市文物鉴定组”组员由市文化局

领导、文博专家学者组成，第一任组长是董其祥研究员，董其祥去世后，由徐文彬研究员担任组长。

1990年6月6日，“重庆市文物委员会”成立，委员由市委、市府各有关部、委、局负责人和文博学者组成，主任为肖祖修。同时，召开重庆市第一次文物工作会议。

1987年4月，受市文化局委托，重庆市博物馆负责组成全市文物普查。第二年11月，举办《重庆市文物普查成果汇报展览》。1996年，由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编的《重庆文物总目》出版。同年，由市文物志办公室编的《重庆地方志：文物志》卷出版。

到1995年底为止，全市共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4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12个，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00个。全市文博单位藏品总计在20万件以上。

重庆文博事业的“开山人”是卢作孚，他在六十年前，就高出时人一筹的眼光，在文化事业欠发达的重庆北碚建起了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平民公园等，现代重庆的文博事业也就从北碚发祥，毛泽东同志曾说：近代史上有四个人我们不能忘记，讲到交通、航运时，“不能忘记卢作孚”。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讲到现代重庆文博事业时，也不能忘记卢作孚。为纪念这位近代工业巨子，重庆市文化局、北碚区人民政府和民生轮船公司正着手筹建“卢作孚先生纪念馆”。抗战期间，国内各科研、文化机关的迁渝，对于重庆文博事业的发展来说，是一次机遇，“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的诞生就是例证。另外，“两院”（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和其他单位在渝的数次文物展出以及著名文博学者在重庆的活动，也为山城民众留下了浓厚的文博意识。新中国的诞生，使文博事业有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天地，而重庆文博事业的健康全面发展期则是从八十年代初至今。目前，“重庆市博物馆学会”、巴南区“重庆巴文化博物馆”等亦在规划筹

晚清川东兵备道中的三个文化人

胡昌健

清代,做过川东兵备道的有 85 人。自同治起,先后有 3 位文化人在重庆做过川东兵备道,他们是姚觐元、黎庶昌和方旭。道署衙门即今渝中区道门口。

姚觐元,字彦侍,浙江归安(今吴兴县)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举人,曾官户部郎中。他的祖父就是清代著名学者姚文田。姚觐元于同治八年来渝,光绪三年离渝,在重庆为官七年。他的主要政绩,一是振兴文化教育,二是倡导种桑养蚕。(笔者曾撰文在《重庆地方志》1990 年第 2 期上介绍过,兹不赘述。)光绪元年,姚觐元听说涪陵白鹤梁“石鱼”出水,他即请在渝做客的著名金石学家缪荃孙速往涪陵,将梁上的历代题刻全部拓下。他得到拓本后,自己做了数条考证,然后将全部拓本携至成都,交与学者钱保塘。嘱其考订、刊行“石鱼”文字。后来,钱保塘编辑成书,取名《涪州石鱼题名记》(又作《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石鱼”文字著录成书,对我们今天研究长江枯水规律、为三峡工程和水利建设服务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此事的肇始之功,要推姚觐元。他家中藏书丰富,他自己刊行过《咫进斋丛书》,这套丛书至今仍是文史学者有用的文献史料。在清代的重庆地方史上,姚觐元是第一个学者型的“兵备道”。

黎庶昌(1837-1897)字莼斋,贵州遵义人。他与郑珍、莫友芝是近代史上的“贵州三杰”。入曾国藩幕府后,他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被称为“曾门四弟子”。光绪十七年(1891 年),黎庶昌被李鸿章任命为川东兵备道。他在重庆兴办学堂、抵制洋货,颇有政绩(见拙文《黎庶昌在重庆》,载于《重庆地方志》1991 年第 4 期)。此

前,1876年,黎氏曾随郭嵩焘出使欧洲,任驻英、法参赞。1879年他在法国旅行,曾到过图卢兹(当时译作《都鲁司》)。黎氏所撰《西洋杂志》中记录了这段经过。1983年,重庆与法国图卢兹市结为友好城市。在重庆任川东兵备道的黎庶昌到过图卢兹,而该市百年后又与重庆结为友好城市,这也算是两市友谊上的一段趣闻。

方旭(1852-1936)字鹤斋,安徽桐城人。以乙酉科朝考一等,选授四川蓬州知州,调署梁山、达县、华阳等县知县。后被清廷派出洋考察教育,回川后,任学务公所总办、擢四川提学使。宣统元年,署理川东兵备道。方氏能诗、书、画,有诗集《鹤斋诗存》,今重庆市博物馆等单位藏有其书画作品。民国成立之后,方旭寓居成都,以书画自娱,往来无白丁,是蜀中有名的“五老七贤”之一(另为吴之英、林思进、赵熙、刘咸荣、汪石壶、陈衍)。1935年春,方旭与40多位社会名流一起,在成都聚会,倡议在重庆建立“嘉陵三峡博物馆”,当时方旭84岁,是与会者中最长者。60年前,能有这样一项文化事业上的倡议之举,的确是难得的。当年《发起嘉陵三峡博物馆题名》簿,今存重庆市博物馆。

章太炎在重庆

胡昌健

章太炎一生中只到过重庆一次，是在 1918 年 1 月。章氏来渝，有两件事，一是与熊克武商讨军事问题，二是凭吊邹容祠堂、看望邹容族人。当时正值“护法战争”，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等为元帅，以恢复《临时约法》，北伐讨逆（冯国璋、段祺瑞）。熊克武刚刚在重庆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并通电拥护广东军政府。身为广东军政府（又称大元帅府）秘书长的章太炎受唐继尧之请（时唐为云贵川联军总帅），由贵州赴渝与熊克武商讨讨伐刘存厚等事宜。

1903 年，章太炎、邹容因“苏报案”在上海入狱，当时章 36 岁，邹 19 岁。狱中，章太炎赠诗邹容，有“邹容吾小弟”之句；邹容赠章诗中有“我兄章枚叔”之句，后二人又联吟七绝二首，结下了生死患难之交。1905 年 4 月 3 日，邹容惨死狱中，章太炎抚尸痛哭。出狱后，章氏作《邹容传》，以广流传。

邹容生在今渝中区夫子池洪家院子（已拆除），后邹容父亲在小较场买下一栋房子安居，族人谓此为“邹家祠堂”。章太炎来渝，距邹容去世已 13 年。年过半百的章太炎来到邹容的家乡，尤为激动。1 月 10 日到重庆的当天，章氏即去邹家祠堂凭吊亡灵。面对邹容牌位，他深深鞠躬。此事，他记入《自定年谱》中：“一月十日至巴县，礼威丹（邹容字威丹）祠。南府（指大元帅府）尝赠威丹大将军，故巴人直称邹大将军也。其家无恙。”既凭吊了邹容，又看到“其家无恙”，章氏了却一桩夙愿。后来，1924 年，章太炎将《邹容传》略改文字，成为《赠大将军邹容墓表》，请于右任书写，刻碑立于上海华泾。

国学大师在渝，除与军政要人谈军政外，不忘讲学。他综观四川古今，曾有一番感慨：“余观四川文化，通儒特起能名其家者，不下如江，然人尽读书，鲜有不识文字之子，亦视下江为优。近世棒客横行，略及军旅，行商大吏，多受攻讦，然爱慕儒先，相戒勿劫教员，化亦美矣。乃所以不竞者，其性轻易淫佚，贵慕权势，至今如汉志所云也。”于是，在一次重庆文化人士向他“求开示”的讲演会上，他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四川重江复关，自为区域，先后割据者七矣，公孙述、刘备、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张献忠皆自外来，而乡土无作者。杨、马、陈、李，文学为最高，盖得召南江沱之化。功名著者乃甚鲜。宋世二苏，善为章奏。范镇、张浚，则忠正之士，皆不能有大就。可数者，虞允文、杨廷和耳。清世岳、杨诸将，因主威而立功，非经纬之才也。文高而实不副，得非先俘华后器识之过欤？但习《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方輿纪要》三书，斯为切要，不烦求高远也。”

章氏在渝居留时间较长，“五月，道万县之利川”（见《自定年谱》）。在渝其间作有《巴歛》歌一首，实际上是以五言小诗对四川数千年历史作了一番概述和“史评”，诗云：“金鼓且勿喧，听我歌巴歛。人皇既荒昧，方志传鱼鳧。自从嬴秦来，梁雍糅同区。天险固可恃，乘乱资泉渠。公孙早跃马，章武从后驱。狂狡逮诸李、王孟相乘除。明夏犹小埜，张公荡无余。七豪彼何人，及尔无葭莩。剑碧地斗绝，瞿唐铁不逾。胡为行绝迹，郁然构皇居。哀哉江沱上，百县鲜完郭。守险一失道，良士皆成俘。族望无宋明，转徙僵路衢。同室勿相斗，相斗利豺豕”

关于章氏来渝之事，熊克武在《十年军政工作回忆录》中略有提及（参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章氏在渝，是由熊克武出面试接待的。由于章氏名气甚大，对川人影响也深，故1936年章氏去世时，成都、重庆等地皆有隆重的悼念活动，这是后话。

“听、跟、走”的楷模杨受白

龙明桥

杨受百是重庆市工商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重庆市商会名誉会长，于1994年8月4日病故，离开我们已快两年了，然而，他乐和大方的音容笑貌，尤其是他几十年来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风范，令人敬佩，难以忘怀。

(一)

杨受百，又名杨禄，祖籍江西，1908年生于四川省江北县宝盖厢（即今重庆江北区高脚土地）一个祖辈经商的商业世家，他祖父杨文光，系清末有名的“杨百万”，民国初年在重庆创建四川最大的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其父杨粲三自1924年担任聚兴诚银行总经理后，惨淡经营三十多年，使聚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川帮大银行。杨受百是杨粲三的长子，杨氏家族财团第三代。青年时期，杨受百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30年奉父命返渝结婚，并考入其父经营的聚兴诚银行作见习员。不久，他又担任了出纳员、会计员、营业员和聚兴诚银行汉口分行襄理等职务。1937年，他辞去聚行职务，自行经商。他在重庆创办复华漂鬃公司，自任经理，专做猪鬃漂白及猪鬃刷子出口贸易。1946年，他重回聚兴诚银行任总行董事、聚兴诚重庆分行副经理、经理。同时，他还担任新丰保险公司副经理、重庆上江猪鬃公司董事长。重庆解放之初，杨受百任聚兴诚银行代总经理。

(二)

1949年,正当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中共重庆地下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开展对工商界著名人士的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以消除其顾虑,不要抽资、逃资。据杨受百回忆,当时重庆地下党通过三条渠道对杨聚三、杨受百作工作,大讲革命要消灭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工商业实行的是保护政策。杨受百因而有机会秘密阅读了毛主席的光辉文献《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新民主主义论》油印本。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才能救中国?杨受百从毛主席著作里找到了答案,深受教育和启迪。1949年下半年,杨受百因行务去香港,有人提出要他以董事身份抽调一百万美金在香港开行。杨受百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这是抽资、逃资的丑恶行为,拒绝签字,毅然返回重庆,坚守山城,迎接解放。

解放初期,我国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实行财经统一,私营银行、私营钱莊纳入公私合营势在必行。杨受百对这一形势看得准,认识足,衷心拥护党和政府的这一重大举措。他率先向党和政府表示:“聚兴诚要在公私合营中走在前头”的心愿。并耐心细致地规劝其父,早日申请参加公私合营。父子俩促膝谈心好几个日日夜夜,共同回顾了解放前聚兴诚银行生存发展之艰辛,展看现实,深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好,终于使他父亲消除疑虑,同儿子一道向政府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1951年10月,聚兴诚银行最早实行了公私合营。后来杨受百曾回忆说:“聚兴诚银行解放后能尽早纳入公私合营,比别人先走一步,这和解放前党的同志的引导以及有关朋友的帮助分不开的。”

(三)

杨受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老朋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亲

睹国土沦陷,生灵涂炭,更加激发了爱国之心。他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下,慷慨捐资支持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重庆解放后,他积极拥护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带头减租退押、带头捐献飞机大炮。1951年,邓小平同志曾约集重庆市工商界知名人士座谈,开诚布公地提出捐献飞机大炮、支持抗美援朝号召时,杨受百当场表示拥护,愿与另一家银行一起共同捐献一架飞机。同时,他以卫国才能保家的道理,说服全家人支持他的爱国行动。

(四)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杨受百极为关心和重视,曾安排他担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西南办事处副主任、重庆市公私合营银行经理职务。他先后还担任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重庆市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市市中区政协第一届副主席、民建重庆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名誉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常委、顾问、四川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重庆市商会名誉会长。

杨受百对党和政府的几十年来对他的关心重视十分感激,对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十分钦佩、拥护。他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教育、领导,也不会有我杨受百的今天。”他还说:“共产党对我真诚,我也应对党真诚,对人民真诚。”他多次向党表示:“我要一辈子做到听、跟、走,而且要走到底。”每逢大会小会请他发言,发言的中心内容,总离不了听、跟、走。杨受百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四十多年来身体力行,执行诺言。在“文化大革命”中,杨受百受到较大的冲击,身处逆境,仍然坚信党、坚信社会主义、坚信党的政策。党中央粉碎“四人邦”后,实行拨乱反正,

使他心情更加舒畅。1978年,他在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下,成立重庆市工商联临时领导小组,建立机构,逐渐恢复重庆市工商联工作。他积极组织 and 推动原工商业者开展工商咨询、工商专业培训等为四化作贡献的活动。在改革开放中,他与市工商联几位老资格副主委一起倡导重新组建宝元通百货公司、重新组建民生轮船公司,为搞活重庆经济、振兴重庆经济服务,并亲自牵线搭桥引进外资、技术成效颇著。

杨受百长期担任人大、政协、民建、工商联领导职务,积极努力工作,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诚合作,积极参与爱国统一战线各项活动,主动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积极参政、议政,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日夜操劳,作出了重要贡献。

“面粉大王”鲜伯良走上幸福路

龙明桥

原重庆复兴面粉厂厂长鲜伯良，在重庆工商界中颇有名气。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以银行雄厚的资金作后盾，在重庆开办工厂、公司，经营面粉工业，财壮势大，人缘广泛，价格起落全凭他说，确有“惟我马首是瞻”之气派，被誉为“面粉大王”。

重庆解放后，鲜伯良在党和政府关怀教育下，坚持“听、跟、走”，政治上进步很快，被批准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从一个原工商业者逐步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先后当选为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第2至8届执行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第1届至8届委员。他所经营的重庆复兴面粉厂，也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的过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鲜伯良的进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有过忧虑、烦恼、也有过喜悦、欢乐”。然而，他终于走过来了，走上了光明、幸福之路。

除“怕”字 加工订货有甜头

在旧社会，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国家灾难深重，我国民族工商业也被严重窒息。鲜伯良经营的复兴面粉厂，在抗战后方的虚假繁荣中，虽也曾兴旺过一阵子，不仅有复兴一厂，还建立了复兴二厂和南充面粉厂，在重庆面粉市场，价格上扬下移，全凭他说，被人称为“面粉大王”。但是，好景不长，抗战胜利后不久，时局动荡，物价一天数番地暴涨，金元券、银元券贬

值,加上特务敲榨,贪官勒索,复兴厂步履艰难。鲜伯良虽曾两次增资,竭力挣扎,又卖掉南充面粉厂,集中资金办复兴,仍摆脱不了困境。至解放前夕,复兴厂债台高筑,累计亏损了3万多元(新人民币),企业濒于破产境地。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人民重见光明。那时,鲜伯良既高兴又忧虑,怕共产、复兴保不住。党和人民政府为了解除民族工商业者的怀疑和顾虑,派干部组织各行各业工商业者学习时事政策,学习《共同纲领》,使鲜伯良等工商业者初步了解了党的政策,消除了“怕共产”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党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更使鲜伯良等体会到是对民族工商业者有利的保护政策。鲜伯良说:“这样的政策好,我举双手赞同,决心听党的话,尽快恢复生产”。

1949年12月,市人民政府派代表来到复兴面粉厂,洽谈收购存货和委托加工面粉。并向厂方说明:这是支援解放战争、稳定人民生活的光荣任务。鲜伯良很乐意接受这一任务。当时他想,“重庆解放才几天,党和政府就这样器重我,相信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委托加工,又解决了厂里缺资金、缺原料的困难,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因此,鲜伯良二话没说,欣然答应。为这件事他特地邀约了职工代表开会,通报喜讯,征求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并随即成立了“劳资协商会”,劳资双方同心协力搞好生产。

1950年,复兴面粉厂既有国家委托的加工任务,又有企业自产自销部分,生产恢复很快。加上全国财经统一后,物价稳定,人民币信誉高,该厂一年就扭亏为盈,偿还了解放前债务3万多元。

1951年,该厂由部分加工过渡到全部为国家加工,业务单纯,产销平衡,劳资关系更趋正常。生产管理方面开始建立原始记录,统一操作规程,建立了安全生产、财务开支等规章制度,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加工费由每袋1.12元,下降为0.49元。耗麦量由每袋63斤,下降为53斤。1951年年终结算,盈利3万多元,厂里第

一次张灯结彩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分得了股息（红利），职工分得了奖金（红酬）。余下的 2 万多元，经厂劳资协商会研究，决定新建车间，增添设备，扩大再生产。这两年，鲜伯良尝到了加工订货的甜头，提高了经营信心和积极性，劲头更大了。

破“五毒”积极经营面貌新

1952 年初，“五反”运动开始，复兴厂的扩建工作中途停顿，鲜伯良被留厂隔离反省，交待“五毒”。当时在重庆《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文章，认定复兴厂有暴利，盗走资金 50 万元。鲜伯良看后大吃一惊，思想上想不通，一时间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这时，市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第十队高队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几次找鲜伯良谈话，帮助他正确认识“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移风易俗，把工商业纳入正当经营轨道上去，耐心地开导、启发他以《共同纲领》对照检查自己的经营思想、经营作风上存在的问题。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实事求是政策。高队长的一席话，使鲜伯良逐步端正了态度，消除了抵触情绪，在运动中老老实实交待了近两年在接受加工订货业务上所犯的错误，并提出保证，决心按照《共同纲领》的经济原则，爱国守法，积极经营。运动后期，鲜伯良得到宽大处理，第二天，鲜伯良即办理了退赃手续，1.5 万元的赃款一次退清，受到市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的表扬。

1952 年 6 月，“五反”运动结束。厂里召开了团结大会，劳资协作搞好生产。鲜伯良又积极投入到厂的扩建工作中去——请西南建委设计新厂房，向人民银行贷款 5 万元作扩建费，找商业界的新民盐号、新纪油行将资金 6 万元投入复兴厂，转作生产周转资金。他整天整天的奔波，操劳，一个心眼搞扩建、搞再生产，受到职工的称赞和好评。新厂房于是年 9 月动工，次年 4 月竣工投产。工人们更是热情高涨，生产中找窍门提合理化建议，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该厂面粉产量由“五反”前每小时 30 袋，逐渐提高到 50

袋、70袋,最高时还达到每小时86袋的新纪录。面粉质量符合标准,成本也大大下降,每月盈余数千元。并逐步改善了企业的安全卫生设备,增加了职工宿舍,制发了工作服,搞好了职工福利。职工满意,资方高兴,劳资关系大大改善。“五反”运动后,复兴面粉厂旧貌换新貌,曾被评为西南面粉行业之冠(第一名),四川省粮食厅还组织其他面粉厂来复兴厂参观。鲜伯良本人也第一次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委员。

跟党走 踏上幸福路

1953年下半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鲜伯良经过学习后深有体会地说:“我觉得党制订的路线政策好,没有把我们当外人。”他一再表示很拥护党的总路线。

1955年底至1956年初,重庆市工商联举行第三届九次执监委员联席(扩大)会议上,传达学习毛主席对工商界的重要指示和陈云、陈毅两位副总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大家一致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看清国家的远大前途,认清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放弃剥削,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北京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消息传来,重庆工商界深受鼓舞,各行业主副委员连夜开会酝酿,联名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鲜伯良作为重庆市工商联的执行委员,参加了会议,听了传达学习,也深受教育、鼓舞。他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也坚决拥护”。并同大家一道签名申请公私合营。

复兴面粉厂实行公私合营后,鲜伯良被任命为厂长,公方代表任副厂长。

浩劫过 耄耋之年逢盛世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把一个好端

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弄得乌烟瘴气,黑白颠倒,是非不分,连老红军、老革命都在劫难逃,原工商业者更是难逃厄运。鲜伯良在“文革”中尽管受到严重冲击,但他仍然坚信党、坚信党的正确路线,经受了考验,终于熬过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原工商业者也脱帽加冕,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鲜伯良倍感心情舒畅。1977年,他告老退休后,曾两次到全国各地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充分享受晚年生活的幸福。他先后到过华中、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大中城市、行程万余里,周游了大半个中国,欣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游览了各地名胜古迹,亲睹了武汉长江大桥现代化建设项目。他很感慨地说:“我这个耄耋老翁,躬逢盛世,深感生活之幸福美满,越活越有意思”。

1990年5月25日,鲜伯良病逝于重庆,享年87岁。

双惺相惜

厉慧森

1992年1月,我二哥厉慧良应邀参加上海“92迎春文艺展演”,他与私弟子王平、奚中路同演《长坂坡》赵云,最后慧良以《汉津口》关羽收场,上海观众为之叫绝。慧良于排练、授艺、演出的百忙中曾去上海第六医院和华东医院探视正在住院的迟世恭和俞振飞两位京昆名老艺术家,不仅探病而且论艺,使得两位老人于病痛中感到欣慰。

俞老对慧良、厉家班、山城重庆有着深厚的情感,他曾三次莅临山城献艺。1936年曾与程砚秋先生合作到过古老的渝州。1946年5月应邀参加蚕业公司建立十周年盛典,于“银社”演出了《醉写》和《跪池》等剧,由在该公司任教的“传习所”名宿姚传芾、倪传钺等人助演。后转至厉家班演出的场地“一川大戏院”演出两天,剧目为《贩马记》和《群英会》,由厉家班助演,我大哥慧斌原演曹操,因俞老之请而改演黄盖,我饰蒋干,俞老精湛的表演艺术给山城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6年5月俞老率上海昆剧团再次来到巴山,以85岁高龄演出了《八阳》,亲临重庆市京剧团与夫人李蔷华示范表演了一折《写状》,使演员们大开眼界,李蔷华早于抗战时期就与厉氏兄妹建立了友谊。慧良多次到上海演出,俞老只要健康状况允许都要亲临剧场观看。

俞老南北驰名,京昆兼长,他以典雅隽秀的风格和高深的文化艺术素养,创建了“俞派”,艺苑飘香,桃李门墙;厉慧良走南闯北,蜚声艺坛,他以娴熟的技艺、独特新颖的构思,创立了“厉派”,他们同为南北贯通,兼收并蓄,京昆皆长,他们同为京昆艺术和建立自己的流派而倍受艰辛,两位怎能不惺惺相惜!

俞老出于对慧良艺术的厚爱,于85岁时展卷挥毫为慧良题写扇面,以隽秀流畅飘逸的行书,写下了“诲人不倦”熠熠闪光的四个大字,落款处写着:“慧良同志对京昆艺术善于汲取前人之长,而又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乃当前南北剧坛之一代宗师也!”慧良得此墨宝,欣喜万分,并以此为鞭策自己继续前进的动力。有人曾以“大师”称颂慧良,他则幽默而又诚恳地说:“不错,我是艺术大失!”

慧良舞台生活数十年,演出的剧目达200余出,他文武兼长,南北兼容,唱念做打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头牌领衔位置保持数十年之久,尚感自己为“艺术大失”,可见他对京剧艺术的忠贞和永不满足的精神境界。俞老和慧良两颗巨星虽双双陨落,但他们精心创建的“俞派”、“厉派”艺术将与世长存!

回顾重庆《抗建堂》

唐维华

抗建堂座落在重庆市渝中区纯阳洞街13号,它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为上演进步话剧和进步文艺界集会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中心。当时在重庆的不仅有五大剧团——中华剧艺社、中电剧团、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而且还有孩子剧团、怒吼剧社、中国业余剧社、戏剧工作社、国立戏剧学校、中国胜利剧社、留渝剧人、新中国剧社、育才学校戏剧组等专业和业余剧团;一大批知名的老作家,名导演,名演员,舞美大师云集重庆,话剧运动在重庆形成了空前的高潮。话剧发展了,但可供演出的剧场却奇缺。1940年4月,郭沫若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的中国万岁剧团团长后,针对当时只有国泰大戏院可演话剧的情况,决定兴建一所话剧剧场,以解决当时重庆戏剧界名家荟萃,而剧场奇缺的困难。中国电影制片厂第二摄影棚地处中山一路马路边,市声嘈杂,不利于拍摄电影,于是就把该处改建为剧场,由史东山的夫人华巨妮具体负责改建。剧场在1940年年底建成,以“抗战建国”口号取名为抗建堂。

抗建堂总占地面积为1321平方米,建筑面积为817.22平方米,剧场占地面积为543.28平方米。剧场坐北朝南,为中西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有堂厢、楼厢和工作室。建成后的剧场,音响效果很好,大小适中,是演话剧的理想场地,1941年4月,中国万岁剧团就在新落成的抗建堂,公演了四幕话剧《国贼汪精卫》。

抗建堂从1941年4月至1945年,共上演了33出大型话剧。除马彦祥编导的《国贼汪精卫》外,有郭沫若编剧,分别由石凌鹤、王瑞麟导演的《棠棣之花》、《虎符》;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天

国春秋》；陈白尘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大地回春》；曹禺编剧，分别由张骏祥、金山、史东山导演的《北京人》、《雷雨》、《蜕变》；吴祖光编剧，分别由贺孟斧、张骏祥导演的《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张天翼原著，石凌鹤、张莺、吴晓邦改编，石凌鹤导演的《猴儿大王》；由杨村彬编导的《清宫外史》；徐昌霖编剧，史东山导演的《重庆屋檐下》；安特列夫著，师陀，于伶改编，陈鲤庭导演的《大马戏团》；夏衍编剧，金山导演的《芳草天涯》等等。这些话剧的演出，都以其在政治上、艺术上各有其令人难忘的成功之处和特色而轰动山城，在话剧运动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当时，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都很重视这些演出，他们常常爬坡上坎到抗建堂观看演出。1941年11月，为庆祝郭沫若50寿辰和纪念他创作25周年演出的《棠棣之花》，周恩来同志不仅多次到抗建堂观看演出，他还组织评论，并为《新华日报》出版的演出特刊刊头题字。1942年2月，周恩来同志在阳翰笙的陪同下，在抗建堂观看《北京人》的演出，并接见了导演张骏祥。1943年3月，《风雪夜归人》在抗建堂首次公演，观众就为其进步的内容和感人的艺术魅力所倾倒，贺孟斧精湛的导演艺术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而这出轰动山城的话剧最后为当局下令禁演，但《新华日报》却坚决支持这出话剧，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也不止一次地到抗建堂观看演出，给予该剧的演职员们以很大的支持和鼓励。1945年12月19日，《天国春秋》由戏剧工作社在抗建堂再度演出时，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等20余人观看了演出，当演到末尾，洪宣娇说：“大敌当前，我们不应该自相残杀”时，观众席上仍然响起了赞赏这句话的掌声。

抗建堂建成后，老一辈的戏剧家，名导演郭沫若、阳翰笙、马彦祥、曹禺、焦菊隐、吴祖光、史东山、陈白尘、应云卫，张骏祥、陈鲤庭、石凌鹤、杨村彬、贺孟斧、金山等及著名演员舒绣文、张瑞芳、蓝马、陶金、章曼频、施超、江村、项堃、耿震、路曦、谢添、吴茵、石羽、

秦怡、吕恩等，都曾在这里洒下了辛勤的汗水，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因而对抗建堂怀有深厚之情。在 80 年代，这些戏剧名家当中的健在者，每与重庆戏剧界人士见面，或在信函往来中，都要问一声：抗建堂现在怎样了？还在演话剧吗？

当时抗建堂除了作演出外，同时也是进步文化界人士集会的场所。1940 年 11 月 1 日，曾由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造一个声势，以显示我们的力量，于 11 月 7 日就假座刚落成场内尚未安设座椅的抗建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晚会，以庆祝文工会的成立。以政治部的名义发出请帖，陪都文化界，新闻界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部分著名人物孙科，于右任、张治中、黄少谷、谷正纲、曾虚白、张道藩等及我党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章汉夫、徐冰、陈家康、石西民等，宾主共 400 余人莅会。张治中、孙科、沈钧儒和郭沫若先后在会上讲话；张治中、周恩来代表政治部，郭沫若代表新成立的文工会，频频举杯敬酒。田汉、老舍、洪深、马彦祥等先后登台慷慨高歌，最后又演出了一个独幕话剧，放映了一场电影。

夜阑人静，晚会才宣告结束，这次盛会的大型横幅《签名轴》，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于重庆市博物馆。以后，文工会还在抗建堂举行过两次文艺演讲会，郭沫若、郑伯奇、阳翰笙、应云卫、叶浅予等，都在这里作了专题演讲。10 月 19 日，文艺界名流云集抗建堂，参加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晚会，晚会主持人是冯玉祥将军。此处，有些重要活动也在抗建堂举行。如 1943 年 1 月 1 日，在抗建堂举行了慰劳荣誉军人大会，张治中代表蒋介石出席了会议。1945 年 4 月 15 日，苏联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悼念会也在抗建堂举行，到会者 1500 余人，由邵力子任主席并致词。

重庆解放后，抗建堂于 1950 年交给重庆市文工团。市文工团在抗建堂首演话剧《红旗歌》，因此，抗建堂改名为红旗剧场，由当时重庆市市长曹荻秋题名。在这个剧场，重庆市话剧团演出过卓

有影响的《四十年的愿望》、《保尔·柯察金》、《尤利斯·伏契克》、《雷雨》、《日出》、《雾重庆》等话剧。1957年周总理来重庆,于2月10日、11日两次到他所熟悉的原抗建堂,观看市话剧团演出的话剧《日出》。在这座曾经培养过一代战士和艺术家的抗建堂舞台上,周总理对市话剧团的同志们说:“你们剧团老演员多,以往的剧团还是培养了不少人才的。”

1983年,田伯萍、田广才等同志在四川省人代会上,提议将红旗剧场恢复原名抗建堂,并将该剧场作为抗战时期的纪念遗址予以保留。1984年,红旗剧场划归文化开发公司;1986年,红旗剧场恢复原名抗建堂,剧场改名为抗建堂俱乐部,剧场内部则改建成舞池,旧貌无存。

1987年1月23日,重庆人民政府将抗建堂旧址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90年代改造旧城的大拆迁中,抗建堂将按原貌进行修复,矗立于纯阳洞街,以资纪念。

再谈《陪都跳伞塔》

唐维华

在重庆市渝中区大田湾体育场内，仍矗立着一座完好的跳伞塔——陪都跳伞塔，尽管年代久远，它已经不能适应跳伞运动的发展，但它作为中国和亚洲第一座跳伞塔，又培养过众多的优秀运动员，其功绩将永载我国体育运动的史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1940年9月又定为陪都，重庆迅速发展成为战时大后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而闻名于世，因此，也就成为日机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中国空军经过淞沪作战、武汉会战的厮杀后，损失惨重，1940年中国空军飞机只剩下100余架，而驻守重庆的空军仅占四分之一，积极防空力量薄弱，因而在重庆组建跳伞队伍，加强空军建设成为紧迫的任务。为强化空防，推行滑翔运动以补助空军，1941年4月4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滑翔总会，蒋介石亲自兼任会长，典礼当天举行了滑翔表演。中国滑翔总会成立后，以培养空军干部，促进航空建设，发展国民体育，普及青年教育为宗旨。为促进民众航空兴趣，增强国防意识，滑翔总会于6月在北碚即开始勘测修建第一个滑翔机场。1942年2月15日，北碚滑翔机场举行了隆重的落成暨滑翔机捐献典礼，2万多人观看了滑翔飞行表演。与此同时，滑翔总会常务理事、航委会副主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负责筹建陪都跳伞塔。

陪都跳伞塔由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时在重庆基泰建筑工程公司任职，同时也在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建筑设计和建筑学初步概论的杨廷宝先生设计建造。

1942年4月4日，我国第一座跳伞塔在重庆两路口建成，并隆

重地举行了庆祝跳伞塔落成暨“开塔盛典”。落成典礼与中国滑翔总会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于下午3时在两路口合并举行,到会的有白崇禧、张治中,谷正纲及特邀到会开启塔门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500余人。虽然由于狂风骤起,原定的特邀几名经过训练的少年进行专场跳伞表演等项目只好取消,但大会的组织者决定,三天之内,全市市民均可免费上塔参观和尝试跳伞。

陪都跳伞塔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呈圆锥形,通高38米,实际跳距28米,地平至钢臂处35米,底部直径3.35米,顶部直径1.52米,下部周长为13米。三个跳伞钢支架互为120度,可同时进行训练。当三个跳伞钢支架向外张开时,象钢铁巨人,拥抱蓝天,十分壮观。在当时,陪都跳伞塔的高度和建筑材料之精美,可与世界各国有数之跳伞塔相媲美,因而它不仅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跳伞塔。

为庆祝跳伞塔落成,在塔下立石碑镌刻了陈立夫亲笔题写的《陪都跳伞塔记》。石碑高117厘米,宽57厘米,厚13厘米,竖行,楷书阴刻碑文如下:

孙子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斯官也自有空军降落伞兵种而邻于事实储经武卫国之能者所不可忽也本会用是创建跳伞塔于陪都以谋普及此新战术之基本训练且以激励国民之志气他日风行四方鹰扬八表庶以此为初也欤

陈立夫敬书

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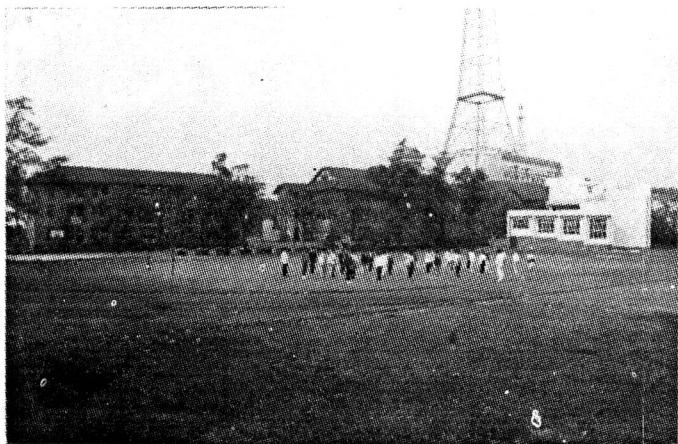
立

陪都跳伞塔建成后,为抗战时期培养飞行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训练场所,但以后由于每次跳伞收大洋一元,票价昂贵,一般青少年望而却步,因此,跳伞运动并没有得到普及。

解放后,在贺龙同志的亲切关怀下,重庆的跳伞运动蓬勃发展,有关部门对跳伞塔也进行了多次维修。从1954年以来,除十年浩劫中停止训练外,每年都有约上万名青少年在此接受跳伞训

练,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和世界级的跳伞运动员。在第一届全运会上,重庆市选手夺得脱钩跳伞金牌;在世界锦标赛和重大国际比赛中,重庆市有12名运动员,31次打破世界记录,夺得金牌。世界著名的优秀跳伞运动员张建中、王素珍、赵成英等等,都曾在重庆跳伞塔接受过训练。

现该塔在大田湾体育场内,保存完好,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竖立在跳伞塔前的《陪都跳伞塔记》石碑,六十年代被人挖出扔在一旁,后被一居民捡去作了搓衣板。七十年代为重庆市博物馆发现后运回馆内珍藏,石碑基本完好,但碑文在第三行至第六行的上半部有19个字被磨平已不能见。1987年11月,远在台北已87岁高龄的陈立夫先生得知这块石碑尚在,就托附在重庆的亲属觅寻石碑照片,当他收到由亲属寄去的重庆市博物馆拍摄的石碑照片时,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重庆亲属,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尊重历史,保存石碑表示致谢和敬意。



重庆浮图关职业中学(原八一小学)校园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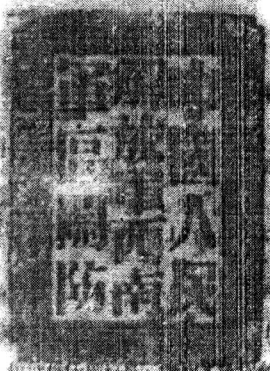
八一保育院儿童用房

022

入
卷
一
二

中 華 人 民
解 放 軍

第 000 號



駐 紮 西 南 軍 區

部 隊 公 佈 如 下：

- 一、符 陶 鼎 任 任 務：原 任 第 二 師 院 長，
原 任 教 務 科 科 長，現 任 任 務 科 科 長，現 任 任 務 科 科 長，王 大
科 任 第 二 師 院 長。
- 二、符 陶 鼎 任 任 務：原 任 第 二 師 院 長，
原 任 教 務 科 科 長，現 任 任 務 科 科 長，現 任 任 務 科 科 長，王 大
科 任 第 二 師 院 長。

備 註

此 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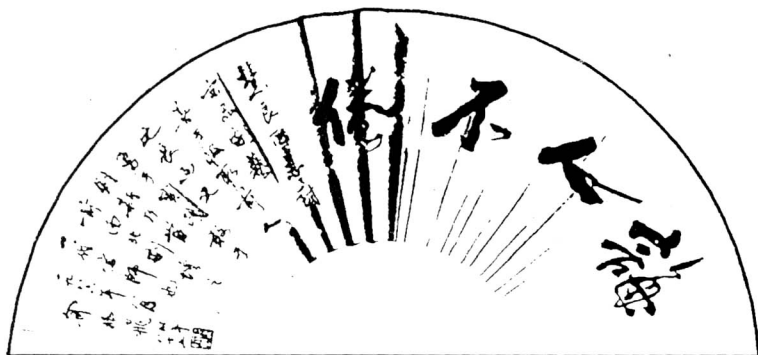
司 令 員 符 陶 鼎

政 治 委 員 鄧 小 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命令文件



俞振飞(右)与厉慧良



俞振飞为厉慧良题写的扇面

发起嘉陵三峡 博物馆题名

六朝金石造像场诗者

周采池

陈少樵

刘滕波

赵蔚村

陈博风

余楠厚

向仙禽

朱良甫

商耀昌

杨伯敏

彭雪生

桂光烈

李澄波

林石玉

余翔光

杨三南

李昭良

冉慶之

李善日

何仲等

随公張

幼荃

魏时珍

羅芳正

龔聚台

秦奇宇

修逢友

吕子彬

方點皮

程石奎

羅伯達

傅道漢

楊葆生

吳中海

李瑞庭

周瑞輝

李重熙

姚經樵

何德初

文以章

寇華早

1935年《发起嘉陵三峡博物馆题名》



西南军区后勤部第一托儿所 1953 年 6 月 1 日国际儿童节合照片